

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大发展服务

为广东综合改革试验区研究服务

为广东社会科学的繁荣服务

4/88

# 学术研究

- 评“国际大循环”理论
- 我国特区发展的新阶段及其目标模式
- 论市场经济的规律系统
- 认同与融洽：闻一多的文化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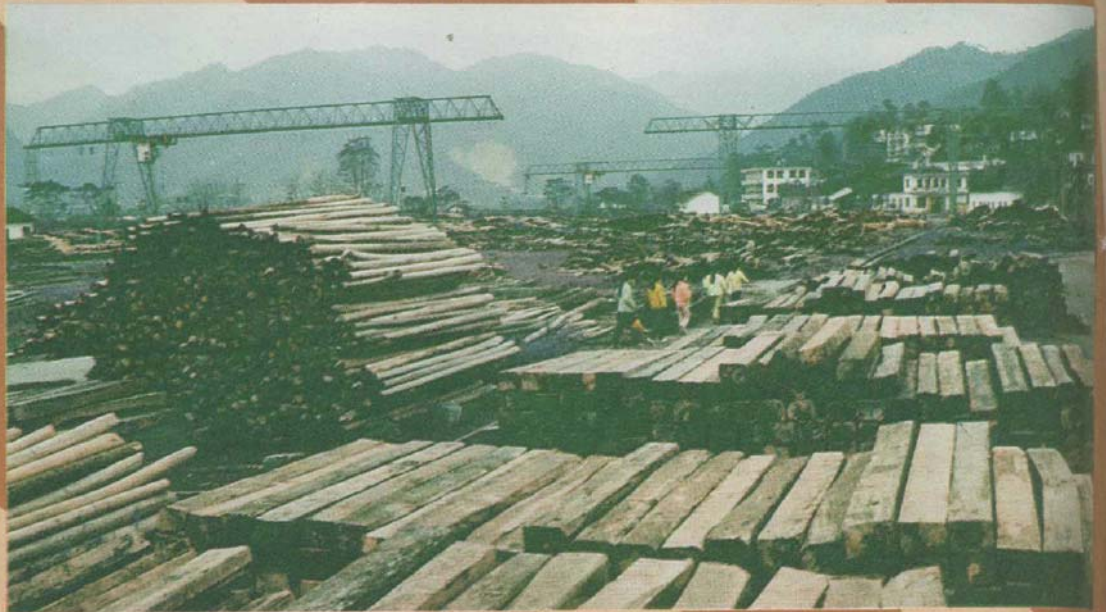
国务院总理李鹏在乐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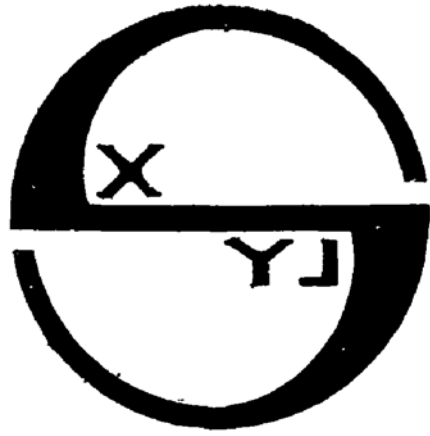


乐昌县棉纺厂是目前广东最大规模的棉纺企业。产品60%出口，质量达到国际标准，在香港市场是质量免检商品。

乐昌县有材面积135万亩，林木蓄积量达400万立方米。



乐昌县境内有色金属、黑色金属、稀有金属和非金属矿藏齐备。



# 学 术 研 究

编 辑 者      学 术 研 究 编 辑 部

广州市越秀北路222号

邮政编码： 510050

出 版 者      广 东 人 民 出 版 社

印 刷 者      广 东 新 华 印 刷 厂

发 行 者      广 州 市 邮 局

订 阅 处      全 国 各 地 邮 局 ( 所 )

国外总发行      中 国 国 际 图 书 贸 易 总 公 司

国外代号： BM268

北京2820信箱

---

代号： 46—64

国内定价： 每册 0.50 元

国内统一书号： CN44—1070

ISSN 1000—7326

本刊每逢双月 25 日出版



# 学术研究

双月刊

1988年 第四期

刘轲生平及著述考略

《清诗纪事》小议

岭南文学形成的条件

岭南文学的基本特征：融合

## · 微型调查 ·

镇村企业发展的新形态：集体与个体联营

——南海县调查

## · 编 译 ·

巨大的变化

## · 专 访 ·

美国系统工程学者依·拉兹洛谈中国改革与哲学

## · 小 品 ·

漫话诺贝尔的一项设想

《余热》小议

## · 书海酌蠡 ·

徐干附曹在建安十一年

枢密院始于晚唐

梁红玉籍贯小考

## · 学术动态 ·

关于所有制、产权与企业改革讨论会综述

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封面设计

总校对

汤擎民

陈永正

黄伟宗

李树政

邹灿华

丁锦和

张硕城

（苏）口·布洛夫

李尚德编译

张硕城

陶原珂

秦牧

杨浩泉

熊清元

齐辛

钟士和

王定坤

金建

林亚杰

陈学兵

黄荣显

95

93

48

38

24

92

90

87

83

80

77

75

73

68



# 目 录

ISSN 1000—7326

(总第八十九期)

在改革中前进·····	编者	6
·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物质利益矛盾及其调整·····	袁惠民 舒日中	8
· 发展战略研究·		
· 评「国际大循环」理论·····	何小锋	13
· 不合国情的「国际大循环」构想		
——兼论开放的多元优势次阶跃推进战略·····	梁桂全	19
· 特区发展新阶段·		
· 我国特区发展的新阶段及其目标模式·····	苏彦汉	25
· 经济理论·		
· 论市场经济的规律系统·····	董小麟	33
· 试谈经济波动与经济结构的关系·····	马留虎	39
· 国情·省情·县(市)情研究·		
· 山区工业发展的五个并重·····	汤彤海	43
· 乐昌建设苎麻基地的对策·····	陈 权	46
· 文化教育·		
· 认同与融合：闻一多的文化观·····	吴宏聪	49
· 亚洲「四小龙」经济起飞的教育背景·····	杨移贻	55
· 岭南文史·		
· 近代广东开放与粤人文化心理·····	丁旭光	59
· 清初迁海时期澳门考略(一六六一——一六八三)·····	郑德华	63

**CONTENTS**

Go Forward in the Course of Carrying Out Reforms  
..... The Editors ( 6 )

The Contradictions of Material Benefits in the Primary Stage of  
Socialism and the Ways to Readjust Them  
.....Yuan Huimin and Shu Rizhong ( 8 )

Comments on the Theory of the "Great International Cycle"  
..... He Xiaofeng ( 13 )

The "Great International Cycle"  
—A Concept Not in Conformity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China.....Liang Guiquan ( 19 )

The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 of the Special Economic Zones in  
Our Country and Its Target Model.....Su Yanhan ( 25 )

On the System of Laws that Governs Market Economy  
.....Dong Xiaolin ( 33 )

Tentative Remark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Fluctua-  
tion and Economic Structure.....Ma LiuHu ( 39 )

Equal Emphasis to be Laid on the Five Sets of Relations in the In-  
dustrial Development of Mountainous Areas.....Tang Tonghai ( 43 )

Tactic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Ramie Base in Lechang County  
.....Chen Quan ( 46 )

Assimilation and Merging---Wen Yido's Cultural Outlook  
..... Wu Hongcong ( 49 )

The Educational Background for the Economic "Take-off" of the  
"Four Small Dragons" in Asia..... Yang Yiyi ( 55 )



- Modern History of Guangdong's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and the Cultural Mentality of the Guangdong People  
..... Ding Xuguang (59)
- A Historical Survey of Macao during the Period of Migration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Qing Dynasty (1661—1683)  
..... Zheng Dehua (68)
- A Cursory Research on the Life and Works of Liu Ke  
..... Tang Qingmin (68)
- A Short Comment on the Series "Accounts of Qing Dynasty  
Poems"..... Chen Yongzheng (78)
- The Conditions for the Formation of Ling Nan Literature  
..... Huang Weizong (75)
- Assimilation—the Basic Feature of Ling Nan Literature  
..... Li Shuzheng (77)
- Joint Management by Collective and Individual Enterprises  
—A New Form of the Development of Township and Village En-  
terprises..... Zou Canhua, Ding Jinhe and Zhang Shuocheng (80)
- Great Changes  
.....Translated by Li Shangde from B. Bulov (a Soviet writer) (88)
- E. Laszlo, American Scholar in Systematic Engineering, Talks  
about Reform and the Philosophy in China  
..... Zhang Shuocheng and Tao Yuanke, reporters of This Journal (87)
- A Rambling Account about a Tentative Idea Conceived by Nobel  
.....Qin Mu (90)
- A Slight Comment on "Remaining Heat".....Yang Haoquan (92)

# 在改革中前进

编者

当您读到这一期的《学术研究》，可能已经敏感地发现，她从内容到形式，与过去的《学术研究》有所不同。是的，《学术研究》正在探索一条学术性刊物改革的路子，这一期，可以说是一次改革的尝试。

《学术研究》办刊30年，是从风风雨雨之中闯过来的。现在，开放改革的春风吹拂中华大地，广东更是得天独厚，成为综合改革的试验区；要在国务院给予更加优越的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前提下继续先走一步，为开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提供新的经验。要实现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全省所有的地区和部门都要为之作出自己的贡献。《学术研究》作为一个地方性的学术理论刊物更要自觉地进行自身的改革，以适应当前新形势给刊物提出的新任务。

《学术研究》改革的出发点，从总体来说是贯彻十三大对理论研究提出的新任

务。十三大报告指出：“马克思主义需要新的大发展，这是现时代的大趋势。”“当前，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的状况，同我们正在进行的伟大事业相比，是很不相称的。改革开放已进行多年，改革开放的理论研究和宣传教育，仍然是一个相当薄弱的环节。”根据这个要求，结合《学术研究》的具体情况，我们认为，《学术研究》的改革，应当努力实现下列的具体任务：一，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发展服务；二，为广东综合改革试验区理论研究服务；三，为广东社会科学各学科、特别是优长学科研究的繁荣服务。

要有效地保证这种服务的质量，学风的改革是当务之急。《学术研究》提倡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反对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的学风；提倡实事求是，言之有物，反对不着边际，夸夸其谈的学风；提倡短而精，反对“高、大、空”的学风；提倡语言生动，



反对“党八股”的学风。总之，要努力做到既让理论家、思想家读了有兴趣，也要使实际工作者、决策者、企业家、管理者感到有效用，从原来只与学术界打交道，走向更广阔的天地，与实干家们做朋友。学风的问题，讲了几十年，是一个积重难返的问题，作为编者，我们希望与作者共同努力，更希望读者给我们严格监督。

改革是个探索的过程，这一过程中时时可能有一些新的内容和形式出现，但《学术研究》始终仍然是一个学术性的刊物，所要改变的只是过去流行的那种“与现实保持远距离”、“离开现实越远就越具有学术性”的偏见，让刊物从切入现实，反映时代的活动中来保持和加强其学术性。我们还要继续坚持从创刊以来就遵循的“双百”方针，展开各种学术争鸣。广大学

者将可以更广泛、更大胆地在这个园地上驰骋；同样，广大实际工作者也可以在这里与学者们一道高谈纵论。我们不应向任何一个真理的探索者提出只许成功，不许失误的苛求，正确对待社会科学研究中可能出现的失误，乃是探索真理，发现真理的必要的条件。

改革是一场深刻的革命。我们知道即使是一个小小的刊物的改革，也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包括我们自身的旧观念、旧习惯、旧势力的抵抗，但既然改革的潮流势不可挡，《学术研究》的改革，只要沿着正确的流向前进，一定可以达到预期的目的。

我们把作为改革尝试的这一期《学术研究》摆到亲爱的读者面前，就象把初生的婴儿捧给自己的亲人，请大家都来评头品足，给我们提出宝贵的意见吧！

※

※

※

## 长春举行“关键时刻的关键会议”

关键时刻的一次关键性会议，近期在长春召开。专家学者、实际工作者、企业家等三百多人参加。会议的热点是两个问题：一、价格改革是对前一阶段普遍推行承包的否定，还是体制改革的合乎逻辑的发展？二、怎样实现承包制与价格改革的衔接？

研讨会将对目前问题的客观形势、涉及方面及难点，不同理论观点和对策，进行清晰而全面的分析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些简明、实用的政策性建议，报中央有关部门。

##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物质利益 矛盾及其调整

从某种意义上说,改革是在现实可能的条件下对社会主义社会物质利益关系的调整,使之更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文中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物质利益矛盾的客观性、特殊性及调整方法作了初步探讨。

※ ※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根本对立的物质利益矛盾消失了,但矛盾仍然存在。人们的经济关系仍然是一种物质利益关系。当前,深入地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物质利益矛盾,寻找解决矛盾的正确途径和方法,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 一、社会主义的物质利益矛盾的客观性

我国虽然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但是已经形成了崭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社会主义公有制规定了劳动者以全民、集体的方式占有生产资料直接地与生产资料相结合,全体社会成员有了一致的利益,公有制又为劳动者提供了实现物质利益的经济条件。然而,社会主义社会物

质利益的共同性、一致性并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在一致性的基础上仍然存在着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物质利益矛盾的客观原因和基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社会生产力还没有充分发展。在生产力没有充分发展的条件下,人们之间始终存在着物质利益矛盾。从实践来看,社会主义首先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中取得胜利,生产力起点低,要创造出比资本主义高的劳动生产率,不能指望在短期内便能达到;即使在实现“四化”之后,经济上成为发达的国家,生产力有了一个巨大的飞跃,然而还没有实现按需分配,由不同的物质利益的愿望和要求而产生的物质利益矛盾也不可能消失。这是因为随着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化程度提高,新的社会分工愈来愈复杂、愈细致地发展起来。由于分工所造成的劳动方式的差别,客观上带来人们不同的物质利益。

第二,多层次的经济结构,多种经济成份的长期存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生产力落后和发展水平不平衡,形成了以



国营经济为主体的，包括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个体所有制和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外商独资的企业。多种经济成份和多种经济形式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既相互依赖，又分别代表着不同的生产关系，反映着各个部分的劳动者具体物质利益。在不同的经济成份之间或它们各自内部之间，由于自然条件、技术水平、管理状态、劳动者的积极性不同，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不同，为社会提供的财富有多寡，以及获取的经济收益的方式不同，也就存在着物质利益的差别。

第三，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价值规律，要求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按照价值量相等的原则进行交换。实际上，在等价交换中又包含着不平等的劳动，这就决定了不同的商品所有者有着自己特定的经济利益。

第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三大差别”仍然存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是长期存在的。它们在“融合”之前，人们的劳动方式和生活条件都存在着差别性，有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的不同，也就是说，他们实际支付的劳动量，对社会贡献有大小之分，决定着他们有着不同的物质利益要求，获取不同量的物质利益。

第五，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原则。这个原则同商品生产一样，在平等的劳动交换中包括着事实上的不平等。按劳分配原则对所有劳动者来说，都实行同一尺度——劳动——来计量报酬，这是平等的。但是它意味着不同等的劳动只能

领取不同等的报酬，得到不同等的物质利益。同时，除了按劳分配这种主要方式和个体劳动所得外，企业发行债券筹集资金，就会出现凭债权取得利息；随着股份经济的产生，就会出现股份分红；企业经营者的收入中，包含部分风险补偿；私营企业雇用一定数量劳动力，会给企业主带来部分非劳动收入。可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物质利益矛盾是不依人们的主观愿望如何而转移的客观规律。社会主义物质利益原则，就是正确反映这种客观规律，实现人们由于不同的经济关系所形成的不同的物质利益愿望和要求。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基本点，就在于承认物质利益的差别性，真正贯彻社会主义物质利益原则，从而达到充分调动劳动者生产积极性的目的，使社会主义制度增强活力。

那么，社会主义物质利益矛盾表现在哪些地方呢？

首先，劳动者、群体和社会共同的物质利益三者之间的矛盾，即通常所说的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矛盾。这三者的物质利益的矛盾，经常在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中，尤其表现在国民经济收入用在积累和消费的比例上，表现在企业的盈利上缴给国家的税利和企业的留成上。当然，社会主义要求人们摆正位置，恰当兼顾三者的利益，各得其利，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只要还存在着这三者利益的区别，矛盾始终要表现出来的。例如，在当前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国家的宏观控制与企业的微观搞活的矛盾，就往往涉及物质利益的矛盾。对于国家来说，对整个国民经济加以控制，使国民经济不至于因为盲目发

展而出现失调。控制是必要的，也有利于微观搞活企业，保证企业和个人的物质利益能够正常地、持续地得到实现。在一定条件下，例如国家要较大地调整经济的基本比例关系，迅速扭转一时出现的失控现象，使宏观经济及时处于正常状态之中，作为各个企业甚至个人要作出暂时的、必要的牺牲。但是在国家调整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和居民消费量过猛时，不可避免对微观经济、人们的消费有所节制，在这种情况下，就表现为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物质利益矛盾。

其次，劳动者群体之间的物质利益矛盾。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着不同的所有制，它们分别体现着不同的生产关系，自然要表现为物质利益上的矛盾。即使在同一所有制内部，不同的经济实体，由于主客观条件的不同，经济效益的差别，对国家和社会贡献的不同，彼此就存在着物质利益的差别。这些矛盾常常通过商品交换表现为不同的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生产者和交换者，他们绝大多数是各个经济实体的劳动者，又以法人身份出现在生产和流通中，在市场上相遇。在交换过程中，价值规律在起作用，通行的等价交换原则，反映在经济利益上就存在着不同的实际内容，表现为物质利益矛盾。

再次，劳动者个体之间的物质利益的矛盾。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指出：社会主义分配原则“默认不同等的个人天赋，因而也就默认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所以就它的内容来讲，它象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页）社会主

义社会各个劳动领域都有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区别。固然，他们作为社会主义劳动者是平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是他们在劳动中各自所处的地位是不同的，能力有大小，对社会贡献有差别，这些差别既有客观的经济原因，又有主观因素。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仍然带有私人的性质，正如马克思所说，它还是谋生的手段，那么，只能根据他们所提供的劳动数量和质量而得到相应的劳动报酬。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分工还存在着劳动贡献和报酬不对应的复杂情况，有的是投入少量劳动而获得较多的物质利益的岗位，也有的是为社会所必需，要投入较多、较复杂的劳动的部门；有的人能力强，为社会创造较多的财富，而得不到较多的报酬；有的人能力不强，为社会创造财富较少，反而占据较多的物质利益。这些情况必然表现为劳动者个人之间物质利益上的矛盾。此外，还由于利息、股份、风险补偿及一些非劳动收入情况的出现，劳动者个体之间的矛盾也会有新的变化。

上述表现出来的物质利益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在经济关系中的表现。如果处理得当，对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定能起着强大的推动作用。

##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物质利益矛盾的特殊性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物质利益矛盾，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主导地位条件下产生的，反映着劳动者之间的经济关系。这种矛盾的发展状态不可能不受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经济条件的制约。固然，在某种情况下，矛盾有可能尖锐起来。例如，



最近一个时期有少数企业和单位借改革之机，不择手段牟取小团体的利益，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有的人为了个人的私利，公然违反国家的法纪。这种情况就使社会物质利益矛盾呈现出紧张状态。但是这些现象毕竟是少量的，可以通过教育、法律手段加以解决，不会发展为全面性的尖锐化或对抗。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劳动者的个人利益和社会的公共利益是辩证的统一，它具体体现在社会分配上。就是说，劳动者通过劳动为社会创造财富，又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从社会的总财富中领回自己的劳动所得，获得与自己所提供的劳动数量和质量相应的物质利益。在这里，物质利益的社会形态和个人形态虽然有区别，但是两者是相互贯通、相互转化的，都是社会主义物质利益的整体不可分割的两个部分，这两者不一致的地方只是整体和部分的差别。这就向我们说明，社会的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并不是处于分裂的状态，它们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还应看到，社会主义社会物质利益矛盾产生于劳动者经济收入的差别，这些差别如果不悬殊，而且是出于劳动能力大小的原因，这就不包含着阶级剥削的因素。所以，矛盾完全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得到调整 and 解决。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产生的物质利益矛盾并不包含阶级剥削的因素，它在性质上是非对抗的。只要不发生严重的工作失误，或偏离社会主义的经济关系，矛盾就不至于演化为外部冲突。

###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物质利益矛盾的调整

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利益矛盾的性质、内容和表现形式都不同于以往阶级社会的物质利益矛盾。因而，它完全可以通过调整的途径和方法加以解决。

要通过改革不断调整人们的经济关系。马克思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毋庸置疑，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从其根本性质来说，是和我国现阶段生产力状况相适应的。然而，任何类型的生产关系都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它们都是由各个方面、环节、成份按层次所组成的活的机体。假如在生产关系中某一方面、环节或成份存在着缺陷，都会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有不完善的地方，明显地表现在僵化、半僵化的经济体制上。这种旧的经济体制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物质生活资料分配的平均主义，这正是小生产观念的反映。

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经验来看，新的经济体制要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物质利益原则，根据劳动者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的多寡，适当拉开经济收入的档次，让多劳者真正取得更多的实惠。

第一，承认企业是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作为商品所有者的各个企业的生产发展快慢、经济效益好坏，与他们自身利益攸关，不能象过去那样，一切由国家包起来，企业的管理者和职工对盈亏不负任何责任，即使亏了本也照拿工资。这样，对

企业是一种压力，在一定条件下，外在压力可以转化为内部动力，激发他们关心自己利益，提高经济效益，发展生产力。事物的运动不是整齐划一的，技术设备和生产条件相同的企业，由于主观努力不一样，管理水平有高低，经济效益会显出差别。这种差别应当与经济收入、物质利益挂钩，才能得到事实上的承认。表现在社会经济关系上，就是要承认劳动者群体之间的物质利益的差别性。既然承认各个企业是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就不能硬把彼此的经济收入的差别拉平，不能把差别看作不合理，也不能以公共利益高于一切把企业的产品无偿调拨或把盈利全部拿走。如果这样，企业就失去了独立性，丧失了自我改造、自我发展的能力，无法进行扩大再生产，也就没有活力了。当然，企业要承担社会的、国家的责任。国家对于经济效益好、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企业，要多加支持和扶植使其迅速发展。国家还要大力扶植经济文化落后的贫困地区，使之尽快地赶上先进地区，这只能从经济着手，提高其生产力水平，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第二，在生产单位和企业中，认真实行“按劳分配”，使劳动者的劳动和经济收入挂钩。目前城镇许多企业实行承包经营

责任制，工资与经济效益挂钩。这种做法的优点，是把物质利益原则具体化为管理制度，便于按劳分配。这样，相等的劳动就有相等的报酬，具体体现了劳动者之间的物质利益的差别。这些差别即使是较大和明显的，但是由于来自劳动，没有渗入任何剥削因素，就不会导致阶级分化，不会偏离社会主义轨道。适当将差别拉大，还有利于劳动者积极性的充分发挥，促进全社会的“共同富裕”。

第三，重视知识，珍惜人才，逐步提高脑力劳动者的物质利益。在现代，生产力发展的特点是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是知识形态的生产力。脑力劳动者掌握着文化知识，有较多的科学技术知识，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从目前来看，脑力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比较低，生活条件比较差。这固然有历史原因和国家的经济条件的限制，但是这不能说与分配制度的缺陷没有联系。党和国家领导人看到了这一点，正试图采取措施加以解决。目前脑力劳动者的劳动和报酬的扭曲现象，他们的社会贡献与物质利益不相适应的状况，有望随着改革和生产力的发展得到合理的调整。

作者单位：广东省教育学院政治系  
责任编辑：范英

何小锋

## 评“国际大循环”理论

中国作为落后的大国，又面临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不宜用单一的“国际大循环”理论构筑长期经济发展战略。从长远看，应考虑建立包括大陆、港、澳、台、海南特区在内的多种循环的多模式的“中国经济圈”。

“国际大循环”理论提出之后，引来海内外的各种议论。作为一个有重大的影响全国性经济战略决策的理论，汇集百家之言，深入讨论研究，是完全必要的。

客观地说，参与国际分工与交换，进一步对外开放，是中国9年来的一贯战略方针，在最近几年体现得更加明显。十四个沿海城市的开放，1986年10月国务院鼓励外资的二十二条规定和各省市的更加优惠措施的制定，以及最近宣布海南建立比原特区更加开放的特区省，广东采取全面开放的措施，都说明中国沿海对外开放的步伐逐渐加快。因此，从这点来说，进一步对外开放，参与国际分工的决策是经过几年的酝酿和实践的，并不是一朝推出、一哄而上的。

然而，如果这个进一步对外开放的战略采用“国际大循环”的概念和涵义，恐怕有着可以商榷的问题。用国际大循环的模式，作为中国广阔的沿海地区对外开放的

一统模式，并且希望借此解决工农业的“二元摩擦”和1.8亿人口的就业问题，进而影响内地经济，在实践上是否可行，不能不慎思再三。

如果说中国对外开放有一个“单一的”发展模式的话，这个模式就是不统一的、多种形式的对外开放格局。也就是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环境，针对沿海各地的不同地理位置、不同经济基础、不同人文观念以及政治、经济改革的不同特点，实行多层次、多样化的，或者说，是多模式的对外开放。这个基本观点，将在下面进一步讨论。

### 一、是否出现“第三次良机”

目前国内有些舆论认为，50年代以来我国曾经遇到过两次良机：第一次由于处于被封锁状态而无法利用。第二次则因为十年动乱而失去良机。现在我们正遇到“类似的”第三次良机，即当前国际上正在



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一些经济发达国家把劳动密集型产业、活劳动耗费大的产业向劳动力较便宜的国家 and 地区转移,扩大对外投资。因此,错过这个良机,2000年之前再等一次恐怕就难了。这种观点似乎对目前世界经济环境作了过分乐观的估计。目前国外的分析,认为90年代并不是世界经济上升的时期,特别是下列一些因素,不能不对世界经济带来不利的影响。

1.去年10月开始的世界性股市暴跌,预示着世界金融进入调整时期。按照一般的经验,股市通常预示未来6至9个月后的经济状况。自从30年代大危机以后,到90年代正好相隔60年,这有如长波理论指出的经济危机的一个周期。目前大多数分析家虽然并不认为会出现如30年代那样的大萧条,但是很可能会出现经济增长速度的显著下降,使国际贸易受到不可避免的强烈打击。

2.目前国际上保护主义盛行,特别是美国与其它主要贸易国家争夺市场激战正酣,使日本、亚洲“四小龙”等国家和地区面临巨大的经济压力。由于国内、国际市场的不足,有的国家和地区经济出现产业结构转型的迹象。这个现象的根源是国际市场的萎缩,这同经济上升时期发达国家因追求比较优势而淘汰、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情形并不一样。

3.不可否认,目前由于股市进入“熊市”,银行存款利率下降,黄金价格较低,有大量的国际游资正在寻找出路,这对中国扩大利用外资提供了可能性。但是,投资者对外投资,主要意愿在于扩大市场,他们重视的是中国庞大的市场,而中国面临外汇支付能力不足和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

的制度,难以与外资的意愿达成一致。更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中国的外向型工业已经面临国外的巨大竞争威胁,近有东南亚的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等国,远有巴西、墨西哥的竞争,中国沿海加速利用外资,扩大出口的压力将不断增大。

## 二、国际比较的“错觉”

国际经济研究的大忌,是将各国的经济作简单化的比较,而这种情况在讨论中并不少见。

1.小型经济模式不能搬到大型经济中去。

国际大循环的观点之一,是要利用“亚洲四小龙”把劳动密集型为主转向以技术密集型为主的出口产业的时机,利用中国沿海1.8亿劳动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用大量活劳动同进口国外原材料组合,大进大出、两头在外。这种观点——暂且不说实际可行性——即使在理论上,也是值得商榷的。

以丰富要素发展具有相对优势的出口产业,这种理论出自著名的“赫克歇尔—欧林原理”(H—O原理)。这种理论认为,各个国家应该在国际分工中,集中本国最丰富的生产要素,发展该种丰富要素密集型的出口生产,以交换需大量使用本国稀缺要素的产品,由此可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这种理论由瑞典诺贝尔奖获得者——欧林于30年代系统提出,并在以后几十年的国际经济学中成为基本原理。然而这种理论的局限性,已经被国际贸易的实践和统计验证所揭露。最著名的是颇有兴味的“里昂惕夫之谜”(Leontief—Paradox)。这场由里昂惕夫挑起的大争论,

其历时之长，争论之烈，实为经济学中之罕见，由此引发许多新理论与新方法，并导致国际经济学中的大变动。对这场讨论的介绍与分析，会对我国讨论国际大循环战略有所裨益。

里昂惕夫在1953年开始运用投入产出分析于美国的进出口结构，结果表明美国输出的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输入的是资本密集型产品，由于常识认为美国是资本极其充裕的国家，而实证分析显示美国反要通过国际贸易输入资本要素，输出劳动要素，这莫名其妙的结果对H—O原理提出了质疑<sup>①</sup>。

瓦勒(D.F. Wall) 1961年对加拿大的研究表明，加拿大输出资本密集型产品，输入劳力密集型产品，由于加主要是对美贸易，且劳动相对丰富，所以结果也否定了H—O原理。

巴拉德维(R. Bharadwaj) 1962年对印度——美国贸易的研究中发现，印度对美国输出资本密集型产品，自美国输入劳动密集型产品，也不符合H—O原理。

这些研究结果都否定了H—O原理，但下面的一些研究结果却支持H—O原理，这使问题更加扑朔迷离。

宁永基(Youngil—Lim) 在1976年对南朝鲜的研究结果表明，南朝鲜输出的是劳力密集型的制造业产品，输入资本密集型的制造业产品，作为劳动相对丰富、资本相对缺少的国家，南朝鲜进出口结构符合H—O理论的推测。

台湾学者梁国树教授在1966年对台湾的研究中发现，作为劳动相对丰富的地区，台湾的出口品是劳动密集型的。这个结论对H—O理论提供了一个实际例子。

至于香港与新加坡，许多研究表明，它们都是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完全符合欧林的要素比例理论的。例如陈坤耀教授在最近发表的文章中说：“根据我所作的经济计量因果分析，有明确的证据显示，四小龙的经济增长是由出口带动的。因此，四小龙的情况可被简单形容为运用劳工密集产品的出口，如纺织品、成衣、电器用品、玩具及鞋类等，来获得迅速的经济成长”<sup>②</sup>。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对立的检验结果？对此，国际经济学界有各种解释，本文不拟对此详加介绍。但须指出的是，讨论者往往忽视了一个简单的事实：从比较经济学来看，小型的岛国经济发展模式是与大国经济发展模式不同的，二者应当区别开来。我们不难发现，支持要素比例理论的受检区域都是小型区域，如四小龙这样的国家或地区，之所以发展相对丰富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是因为本身地理呈现岛型，资源单一，必须通过国际贸易来实现本国相对丰富要素同稀缺要素的交换，这样的交换既可说符合经济法则，也可以说是迫不得已的事情。

而不符合H—O理论的国家都是大国，如美国、加拿大、印度等。它们本身资源众多，地域广阔，不必按照单一模式发展本国经济与对外贸易。最明显的因素如运输成本的国内外差异，生产和经营的垄断，规模经济效益，要素的间接替代和组合的多样化，国内外需求的复杂化都可能成为影响生产和贸易的重要因素，这些“国情”决定了要素比例理论不能简单地运用于大国经济。

其实，所谓对H—O理论和“里昂惕夫

之谜”的大争论，其理论解释可以运用国际价值理论基础上的“比较价值原理”来作出，其主要观点是：各国应该生产并出口劳动生产率相对高的产品，进口劳动生产率相对低的产品。（这种理论的证明可参阅本人与同事合著之《中国计划商品经济的理论模式》第五章，中国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

上面的冗长赘述，不过是想证明这种观点：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其国情的复杂性和多样化，不能以单一的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作为对外发展战略。那种单一发展战略是同H-O原理相一致的，在理论上有很大的局限性，在实践上是不可行的。然而，还须指出的两点是：第一，虽然本文认为比较价值理论是正确的理论，但它是一个抽象层次较高的原则，其运用还要经过一系列中介理论，作为沿海地区对外发展战略这个具体层次的问题，应该说，全国并不可能有一个简单化的统一模式，而要根据不同生产能力、地理位置、经济层次而采取不同的发展模式。这方面最明智的作法，是放手让各地形成“百花齐放”、各具特色的格局。第二，虽然H-O原理有理论局限性，但不能一概否认其一定程度的可用性。本人认为，H-O模式在目前对珠江三角洲是基本适用的。这有一个最大的特殊情况是，珠江三角洲（将来以至广东）是港、澳的经济腹地。香港是以大进大出、两头在外为模式发展起来的，虽然它一方面承受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也在进行产业结构的转型，但另一方面，由于实行联系汇率，出口势头仍旺，而且有珠江三角洲为腹地，并把劳动密集型产业通过与珠江三角洲合作而得以发展，因此，广

义的珠江三角洲地域（包括港、澳在内），将带有港、澳经济的扩大和延伸的特点，这就决定了国际大循环理论可适用于珠江三角洲。目前珠江三角洲已有百万以上的城乡劳力从事“三来一补”和三资企业的工作，其间接带动的劳动力则更多，这样的数量和潜力比较符合国际市场需求的容纳力，而且业已引起国外的震动。但如果从此引伸出整个沿海地区乡镇1.8亿劳力的模仿，那对国际经济是个不可想像的巨大冲击。

2. 中国投资环境不能简单地同国外类比。

国际比较分析的另一个容易发生的错觉，是运用分析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的方法，来分析社会主义国家和地区的投资环境。

对于投资环境的国际比较，始于美国学者罗伯特·斯托伯的“多因素评分法”。该方法提出评价投资环境的八个因素：政治稳定性，外商股权，资本外调，国内外企业差别待遇，币值稳定，关税政策，当地融资条件，通货膨胀<sup>③</sup>。以后的分析者虽然加上了一些评价因素，但这些分析基本上仍然立足于对市场经济的因素进行比较，当时也不可能有人对计划经济的投资环境的评价作出研究。

中国经济对外开放以后，吸引了不少外商为各种动机到中国投资。在比较研究中国投资环境时，国内外分析家一时不可避免地沿用了传统的分析方法，最明显的例子是：以税率大小、劳动成本高低、土地厂房价格等因素直接同国外比较，从而得出中国投资项目的“成本”低廉的结论。殊不知，中国作为一个具有浓厚计划经济

和东方色彩的国家，它有许多特殊性在起关键作用。就成本而言，除了有形的看得见的成本之外，更重要的是看不见的“无形成本”，诸如官僚式的审批程序，法制与法治的不健全，企业福利的多重化，产、供、销体制的行政干预，市场和外汇的管制，以及人们的思想观念上的阻碍等等，这些都表现为时间价值的浪费和开支的无法预算。据许多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经验，投资项目常常出现延期投产，而项目经济效益对此的敏感性最大。

不可否认，中国政府与企业人员对改善投资环境作了许多努力，许多三资企业也获得了显著的成功。但是，成功者大多数是香港投资者，这同香港投资者对中国投资环境的特殊性认识较深刻有关。目前出现的两个现象是值得注意的：一是利用外资已从1985年的利用直接投资为主，转变为利用外国贷款等间接投资为主；二是在中国制订进一步鼓励外资的一系列优惠政策的同时，中国利用外国直接投资额并无明显增加，至今没超过1985年的水平。这说明经过初步的试探，外商已意识到事前分析与事后结果的不一致，从而提出重新评价中国投资环境的问题。

随着认识的深入，中国方面已经提出了“硬环境”与“软环境”以及改善“投资小气候”问题，这是认识上的一种进步。正象香港投资者对中国的特殊性知之较多一样，香港的分析家对中国投资环境的评价方法也有独到之处，其代表作是闵建蜀教授首创的“体制评估法”。即从政治、经济、法律、体制等因素评价中国独特的投资环境<sup>④</sup>。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入，相信在互相认识的基础上，外商对华投资将会进入稳

健的发展时期。

### 三、对外开放的长期发展战略

制订中国对外开放的长期战略，需要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本人仅在此谈一些粗略的想法。

1. 以经济效益为中心形成不同层次的多种循环圈。

第一，形成中国大陆内部循环圈，其最主要的是沿海与内地的东西部大循环，包括人、财、物的双向流动。这方面，内地可优先供应沿海出口生产所需的原材料，但沿海要回让一部分外汇收入，使内地得到合理的经济补偿。

第二，形成珠江三角洲与香港以至海外的经济循环圈。利用香港在高智力的第三产业（包括金融、国际营销管理、信息服务、运输通讯、生产和管理技术等）的优势，与珠江三角洲的劳力、土地等方面的有利因素相结合，使两个地区经济上溶为一体，形成“前沿”与“腹地”的依存关系，使香港这条“小龙”成为包括珠江三角洲在内的生气勃勃的“大龙”。

第三，形成华东、福建沿海与香港、台湾以至海外的经济循环圈。目前与台湾进行贸易与经济合作只能通过第三者（主要是港澳）进行。从长远看，随着海峡两岸联系的加强，华东、福建与台湾的直接贸易与经济合作的前景是比较乐观的。

第四，形成华北、华东与南、北朝鲜、日本以至远洋的经济循环圈。特别是，随着中国与南朝鲜经济联系的日益发展和南、北朝鲜的关系缓和，中国将在南、北朝鲜的间接贸易中发挥特有的作用。



第五，形成海南与港、台以至东南亚和远洋国家的经济循环圈。

第六，形成内地与邻国以至远洋各国的经济循环圈。

这样，中国的开放模式将是多层次、多样化的，其中心是经济效益的最大化。既然是长期发展战略，就要考虑到十年以后的情形。十年后的中国，港、澳已回归祖国，台湾与大陆的联系日益增多，海南岛经济体制超前发展，将形成“一个国家，多种体制”的“中国圈”。在这个“中国圈”内部，各个特殊地区（大陆、港、澳、台、海南）之间的贸易与往来既不完全同于本地区内的贸易，又不完全同于国与国之间的贸易，但又有一定程度的共同对外性。这样的“中国圈”，是中国独有的现象，如果利用得好，将在太平洋地域乃至世界经济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2. 以国际市场的供求为出发点，制订对外经贸工作的具体策略。这方面，考虑中国的现有能力与条件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要以国际市场的供求状况与变化趋势作为决策的前提。在利用外资、引进技术、扩大出口方面，切不可凭主观意愿作出一厢情愿的决策，而需始于对国际市场作大量的、深入的调查研究，并随时为适应市场变化而调整决策。

3. 以不断改革、开放为推动力，实现

观念更新。扩大开放的根本障碍，在于思想观念的不适应。珠江三角洲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成功，很大程度上归结为珠江三角洲人的海外关系多，与外界思想交流的历史较长、机会较多。因此，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新、旧观念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相应树立商品经济的各种观念，更长远地说，必须发展现代化的科学文教事业。如果10亿多人的思想观念能够尽快更新，特别是沿海各省4亿多人，加上港、澳、台2000多万人的共识，其所转化的物质力量，将令世界为之震惊。

---

①关于里昂惕夫之谜的讨论，散见于各国际经济学的教科书和论文。

②《探讨亚洲四小龙的转期发展》，《信报·财经月刊》1988.3。

③Robert. Stobaugh—“How-to-Analyze—Foreign—Investment—Climates” Harvard—Business-Review, —September—October, 1969.

④《中国的投资环境》，京港学术交流中心1987年版。

作者单位：香港东南经济信息中心

责任编辑：张硕城

## 不合国情的“国际大循环”构想

### ——兼论开放的多元优势次阶跃推进战略

不论从国情、世情来看，“国际大循环”都将存在严重的实施障碍。它在做法上是照抄“亚洲四小龙”的经验，指导思想仍未摆脱“大一统”观念。

选择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包括两面一体的目标：一方面，赶上和超越世界先进水平，在竞争的意义上重建我国在国际间的优势地位；另一方面，在现代化进程中，使广大人民获得广泛的社会福利和人自身的全面发展。因此，采取开放的多元优势次阶跃推进战略比较符合中国国情。

王建同志的“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构想，以宽宏的战略眼光，把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纳入国际经济大循环中，寻找走向现代化的新路子，这是具有很重要的方法论意义的。但是对王建同志的基本战略构想，笔者却不敢苟同。问题不在于我国要不要参加国际分工和交换，对此是毫无疑问的；问题在于如何判断参加国际大循环的程度及其在我国现代化战略中的地位。战略决策不仅要考虑“需要”，更要十分注意“可能”。

#### (一)

王建同志认为，我国未来经济发展战略面临二元结构所导致的两难困境，摆脱这个困境的战略思路是，把农村劳动力的产业纳入国际大循环，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加工产品出口，一方面解决1.8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产业转移，另一方面换取外汇，为重工业发展提供所需外汇和技术。国际大循环是解决中国发展战略主要矛盾的中心转换环节。王建同志主张，应

当把国际大循环发展战略作为我国从现在起到本世纪末或者更长一段时间内的总体发展战略。

笔者认为，这样的战略构想是不现实的。这个战略构想的致命问题是，脱离了我国是一个拥有10亿人口，近千万平方公里疆域的社会主义大国这一根本国情。把我国发展战略主牌押在国际大循环上，只是一厢情愿，到头来将引致战略指向重大失误。30多年来，我们干的一厢情愿、脱离实际的事情已经够多了。泼点冷水，是希望避免重蹈覆辙。

第一，国际大循环战略忽视了一个重要规律，即一国经济发展对国际经济的关联度与依赖度和它的人口、疆域、经济规模存在负相关关系。根据世界银行资料分析，一国商品出口额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人口在一亿以上的国家，除个别国家外，均在10%以下，包括美、苏在内；人口在500万以下的小国（或地区），不管其经济发展水平如何，绝大多数国家高达25—60%；人口在一亿以下500万以上的国家，绝大多数在10%—25%之间。在这个规律作用下，参加国际大循环对中国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很有限的。希望打“国际大循环”战略主牌，让六七十年代“亚洲四小龙”奇迹在八九十年代的中国重演，实在渺茫。

第二，国际大循环战略没有充分注意劳动密集型产品世界市场有限容量和人口大国的矛盾。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国际市场容量是有限的。首先，虽然存在产业国际转移趋势，但是发达国家以及新兴工业国让出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市场只是一部分，并不是把整个市场让出来。其次，世界上

有几十个近百个国家窥视和争夺发达国家及新兴工业国让出来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市场，中国只能争夺到其中一部分市场。再次，目前中国劳动力素质低，管理落后，这在短期内是难以克服的，这就大大限制了我国争夺劳动密集型产品市场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几乎两倍于欧、美、日人口总和的中国，希望通过参加国际大循环，搞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推动国民经济起飞，确实离现实性太远了。即便是腾出沿海近两亿人口参与国际大循环，其影响也是极为有限的。希望带出1.8亿农村剩余劳动力，也是做不到的。况且在一些数字上，王建同志也过于乐观了。1500亿美元的出口产品额（其实还要扣除到1987年为止的400亿美元出口产品额基数）根本无法容纳6000万人的就业，而且二次产业与三次产业就业岗位增加的比例也决没有1:2那么高。建立在不切实际过于乐观的分析基础上所作的战略选择，其风险性足以令人担忧。

第三，国际大循环战略忽略了社会主义国家参与国际大循环所遇到的“制度屏障”。现在，向外转移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过剩资金的国家，几乎全是资本主义国家，这些产业和资金的主体是资本家。他们在向我国转移市场、资金时，必然首先碰到两方面问题：一方面，资本家害怕政治风险；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相对于其他盟国而言，对社会主义国家总是采取抑制政策的。因此，我们采取闭关锁国政策，不冲破资本主义国家的抑制政策，是错误的；但是对于资本主义国家寄与不切实际的过高幻想，也会造成失误。1979年以来，虽然我国采取了相当

开放的对外经济政策，但是不可能从根本上克服“制度屏障”。这就限制了我国在国际竞争格局中，接纳国际产业转移和资金转移的规模和深度。例如，“亚洲四小龙”和日本，除香港外，产业转移和资金转移指向主要是在东南亚、南美洲一些发展中国家，转到中国来的为数甚少。加上我国产业组织很不发达，与世界经济联系的关系网络远未发育，这也大大限制了我国承接第二次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国际转移的能力。而要克服这种情况，决非一朝一日所能解决，它涉及到整个社会机制的改造。

最后，“国际大循环”战略忽视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态势。自70年代下半期以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跌入“长波”低谷，经济扩张乏力，进口增长速度下降，1970年—1982年与1960年—1970年相比市场经济工业国进口额年增长速度由9.5%降至4.8%，中等收入国家由5.9%降至3.9%，低收入国家由5.4%降至1.2%，苏联、东欧由8.6%降至6.0%，只有高收入石油出口国呈增长趋势。这种状况，在近、中期内难以根本转变。六七十年代，“亚洲四小龙”起飞，恰遇资本主义经济大更新、市场大扩张这一千载难逢的“黄金时代”。而我们只能在一个经济扩张乏力的格局中，争夺“二传手”抛出的球。这种态势，又限制了我国利用二次产业转移的规模和深度。

广东省在全国是参加“国际大循环”基础和条件最好的省份之一。但是，除珠江三角洲和几个特区外，就全省情况看，参加“国际大循环”也是很有限的。1986年，全省总产值中，外贸收购消化的只占

17.1%，调出外省的11.02%，省内市场消化的达71.88%。1978年至1986年，全省工农业总产值增长额中，由外贸收购增长额消化的仅占16.52%。“六五”期间，在全省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中，引进外资仅占11.55%。即使是深圳特区，引进外资的情况也不太乐观，在1980年至1985年深圳全社会基建投资中，引进外资仅占20%，1986年也只占26.82%。1986年，珠江三角洲开放区“三来一补”工缴费收入1.81亿美元，按人口平均每人不足20美元。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我们一方面必须继续坚持对外开放政策，积极利用国际产业结构调整的机会，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和产业调整。但是，我们又要充分注意到，与在六七十年代实现经济起飞的“亚洲四小龙”相比，我国经济发展有很不相同的特殊国情和时过境迁的国际背景，决不可以把“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起飞道路直接套到我国战略中。我们必须清醒地估计到，我国参加“国际大循环”是极为有限的；希望通过参加“国际大循环”把1.8亿农村劳动力带出来，实现产业调整，是过于乐观的。因此，把参加“国际大循环”作为我国到本世纪末以至更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总体战略，是一种不切实际的选择。“国际大循环”战略只能作为副牌来打，而不能作为主牌来打。

这里还需指出的是，“国际大循环”战略构想隐含的两大观念，这两大观念在处理中国发展战略问题时，是不足取的。

一是“照抄”观念。“国际大循环”战略，基本上是重复“亚洲四小龙”的战略路子，而且是把“岛国(地区)”战略应用到拥有广



大内陆腹地和10亿人口的大国上。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疆土辽阔的大国，没有任何一国的经验可以照套到中国上而适用的。中国的战略出路只能是从本国国情出发，研究别国经验教训，锐意创新，开创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使中国扬后起者之优势，创造后来者居上这样一个新的竞争格局的创新型战略道路。

二是“大一统”观念。“国际大循环”战略没有充分注意到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的自然、社会条件的差别所带来的战略多元化问题，以及由此带来的大国战略优势，即多元优势集结综合问题。相反，把全国经济发展纳入一个单一的“国际大循环”战略中，这是违背大国根本国情的。我国总体发展战略，必须建立在各地区战略优势的发挥上，把这些优势集结起来，形成总体创新优势。这就是我们参与国际竞争的根本的本钱。

## (二)

研究中国发展战略，必须从中国的根本国情和走向未来的战略目标出发。中国的根本国情是国家大，地域广、人口多。这就产生了两对奇妙的矛盾，即经济——科技总体规模实力优势和经济——技术发展水平落后并存一体；局部优势与发展条件多样化和综合要素进步水平低并存一体。这样的一种基本国情，为我们进行战略选择提供了广泛的可能空间，这也是我们考虑总体战略的基本立足点。战略决策与选择的价值在于，通过优化选择，扬长避短，发挥自己优势而克服自己劣势，在国际竞争总格中，力争后来而居上。中国发展战略的实质，是要在国际竞争的历史

总格中，摆脱贫穷落后的地位，其中包括两面一体的目标：一方面，赶上和超越先进水平，在竞争的意义重建我国在国际间的优势地位；另一方面，在走向现代化中，使广大人民获得广泛的社会福利和作为人的全面发展。因此，中国的战略发展不能简单重复发达国家的历史，也不仅仅是历史前进的相对速度；它只能是一种历史的再创造，在借鉴别国历史经验的同时，创造一种新的历史发展格局。显然，唯有创新，才是有希望的前途，步别国后尘，亦步亦趋，是不可能复兴中华民族的。

首先，中国发展的战略选择，必须在历史坐标系上，重组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组合，使中国在走向未来的赛跑中，争取与发达国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一书中，曾根据他对历史发展的理解，提出了一个著名论断，“在跃向未来的赛跑中，穷国和富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不少人对这个论断有非议。但是，我认为，在特定意义上说，这个论断是合理，即不是在发展的既有条件上，而是在未来的战略选择和对历史机会的利用上，穷国与富国是处于同一起跑线上的。我们不要盯着发达国家已走过的路，考虑中国的发展大趋势，而是站在发达国家的肩膀上，从发达国家已取得的历史进步成果出发，面向未来考虑中国发展大趋势。要依据对历史全面批判基础上对历史的全新理解，选择中国走向未来的目标和道路。决定一国未来的不是过去的历史，而是取决于对未来的理解和所作出的胜他人一筹的选择。当然，历史不是可以简单超越的，有的历史环节不可超越，有的历史环节可以跳过去，有的几个历史环

节可以重叠一起并作一步、两步走过去。因此，我们可以依据对历史和未来的全新理解，把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序列结构转换为过去——现在——未来的空间并列结构，在争夺未来竞争制高点的同时，补偿过去和现在的历史环节。在这个历史战略重组选择中，人多地广经济规模大的大国，就可以发挥其规模优势，立足未来配置自己的力量。我国经济规模几千亿美元，在世界上排第七位，拥有近1000万人的科技大军，完全可以在推进传统产业革命的同时，在局部上与发达国家争夺走向未来的制高点。例如，我们是否一定要在完成工业化基础上才向新技术革命进军呢？或是直接利用新技术革命成果推进工业化呢？我们是否要在完成农业机械化的基础上再开展生物工程呢？还是可以直接运用生物工程技术实现农业革命呢？后者所争得的农业进步的成本可能更低。这就是经济——技术大国规模优势可能产生的创新发展格局。我们必须利用大国规模优势所提供的独特条件，实施全新战略配置，而无需步“亚洲四小龙”后尘。

第二，我国人多地广，各地区自然、地理、经济、技术条件很不一样，由此形成各地区不同战略优势和战略劣势。全国总体战略要建立在各地区多元优势的发挥及其整体集结的基础上。总体战略要有利于各地区择优避劣，形成发展的优势格局。而各自优势的发挥，便是全国范围内的区域分工格局的形成，由此产生市场联系的发展和市场的扩张，经济发展的社会化、专业化和优化，形成内部的自循环自交换增殖系统。我们不需要搞全国划一的发展战略模式，一说粮食重要，全国

各地一律以粮为纲；一说微电子技术重要，全国各地一齐涌上来抓微电子技术开发；一说“三来一补”好，各地不管是否有条件都往外挤；一说“大进大出”，各地都来一个模样。这是完全没有必要，也不现实的。最现实而又最有价值的是各地根据自己优势条件选择自己的市场区隔和发展方向，真正形成局部市场竞争优势。

现在大家都说搞现代化缺资金，其实这是一个现象，缺资金的实质是缺生产力要素。但从全国来看，我国不是生产力要素总量绝对短缺，而是生产力要素结构性短缺。从各地区看，生产力要素结构性短缺情况又各不一样。另一方面，生产力要素结构性短缺又总是以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生产结构为前提的。各地应当依据本地区生产力要素丰缺情况，选择合适的市场区隔、产品结构和生产方式，以利于扬长避短，形成优势，使国民经济沿着阻力最小的路线起飞。

从全国总体战略看，其任务是要合理进行生产力区域布局，形成多元优势结构，并通过分工体系的完善和市场的发育，形成多元优势的整体集结。这可以形成我国经济起飞的巨大的内在动力。广东省珠江三角洲、沿海地带、山区等不同类型地区选择不同发展战略道路，形成多元优势非平衡起飞的实践，说明多种发展模式利于多元优势整体集结，并较快地促成经济起飞。

第三，在着力合理配置国内生产力要素，选择优化的产业结构、区域布局的同时，应努力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参加国际分工，利用国外经济——技术发展的先进成果，加速国内生产力成长和产业结构更

新，形成国民经济——技术的内循环和国际产业——技术大循环交换作用的格局。但是参与国际大循环始终只能建立在内循环基础上。现在，许多发达国家都把一些发展中国家作为他们未来竞争的“假想敌”，力求与他们在经济——技术发展上保持10至15年差距，并在资金、技术转移上加以严格控制。因此，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从根上说主要靠自己开发。但是积极吸纳世界经济——技术先进成果可以缩短差距，提高走向未来的起点。

综上所述，我们主张我国总体战略宜采取开放的多元优势次阶跃推进战略。我们并不认为这种选择是理想的，我们只是想表明，我国走向现代化有多种战略选择，我们必须继续探索，不应封闭选择的大门，不要再刮“一窝蜂”的风。

作者单位：中共广东省委政策研究室

责任编辑：张硕城



## 徐干附曹在建安十一年

熊清元

徐干何时依附曹魏，研究界的说法颇不一致。有说在建安初（见《文学评论》1981年第1期《建安七子论》），有说在建安九年（见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有说在建安十年左右（见《重庆师院学报》1984年第1期《建安文学编年史·前言》），有说在建安十一、二年左右（见《文艺研究》1988年第6期《建安诗风的衍变》），还有说在建安十二年（见《曹植集校注》附《曹植年表》）。徐干附曹在建安十三年以前，因其文赋为据，已无问题。但究在何年，说者都没有提出可靠的根据，读者自然无从判断。因此有进一步考究的必要。

严可均辑《全三国文》，有“与徐干同时人”（严氏案语）为徐干《中论》所作序文。其中云：

董卓作乱，劫主西迁，……君避地海表。自归旧都，州郡牧守礼命踧踖连武，欲致之。君以为纵横之世，乃先圣之所厄困也，岂况吾徒哉。……故绝迹山谷，幽居研几，用思深妙，以发疾疢，

潜伏延年。会上公拨乱，王路始辟，遂力疾应命，从戎征行。

这里提供了“旧都”和“上公拨乱”两个重要信息。

先说“旧都”。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徐干》诗亦述及徐干出处：“置酒饮胶东，淹留憩高密。此欢谓可终，外物始难毕。摇荡箕濮情，穷年迫忧栗。末涂幸休明，栖集建薄质，已免负薪苦，仍游椒兰室。”诗谓徐干“淹留憩高密”后即进入了仕途。因知“归旧都”即指“憩高密”。“高密”是前汉高密国之治所，故得称为“旧都”。再说“上公拨乱”。自董卓之乱至建安十二年，曹操征战至高密所在地者，仅有建安十一年征管承之役。《魏志·武帝纪》云：“秋八月，公东征海贼管承，至淳于，遣乐进、李典击破之。”“十二年春二月，公自淳于还邺。”淳于即距高密不远，后汉同属北海国。曹操在淳于闻隐居高密的徐干之名，而征召之，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据此可以得出结论：徐干是在建安十一年曹操征管承时“应命”附曹的。

## 我国特区发展的新阶段及其目标模式

世界各主要经济特区的发展正由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区向自由港、自由贸易区阶段转变，综合化、贸易自由化和高科技化是这一转变的三个明显趋势。我国特区也正向着新阶段发展，面临由一般原型性特区向具有自由港、自由贸易区特征的新目标模式转变的选择。这种转型和发展，无疑是一个相当艰巨的任务。

我国经济特区经过9年的建设，基本上完成了奠基任务。目前正在向新的阶段前进。新阶段面临的问题是，应怎样进一步规定特区的建设目标才能适应世界各类经济特区发展的新趋势和我国扩大对外开放的新形势；是稳定在现行的特区政策和管理体制、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水平上，还是应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度、转向更高层次的特区经济？这个更高层次的特区经济模式的特征又是什么？这是我国特区当前急需深入研讨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一、我国特区必须适应世界各国经济特区发展的新趋势和我国扩大对外开放的新形势，转向具有自由港和自由贸易区特征的更高级的发展新阶段

世界各主要经济特区的发展在走出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区的黄金时代之后，目前已经步入它发展的第三阶段。同第二阶段相比，这些经济特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概括说来，它存在着三种相互联系的新趋势：

（一）综合化趋势。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中期，世界经济特区发展的主导形式是结构较为单一的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区。仅短短10多年间，这种加工区以低廉劳动价格与外国资本结合的优势，发展出口加工业，递次向广大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扩展。到现阶段，情况已大不相同，代之而起的是特区经济的综合化趋势：

（1）很多经济特区转向综合化，如



世界闻名的汉堡自由港增辟了出口加工区，菲律宾巴丹出口加工区也在努力建立包括轻工业、中型工业和重工业在内的综合性多元工业部门。（2）一些新建立的经济特区也在使其经济综合化。如印尼的巴淡岛综合自由贸易区的产业部门就包括了工业、商业、旅游业和农、牧、渔业。

（3）一些准备建立的经济特区也在按综合化、多功能化方案进行设计，如日本的那霸、葡属马德拉群岛自由贸易区都制定了综合发展规划。经济特区的综合化趋势说明特区的经济地位日见重要，设区国希冀特区功能多样化，以便对本国、本地区经济的开发起更大作用。

（二）贸易自由化趋势。世界主要经济特区的发展由第二阶段进到第三阶段，又一个显著的变化是由出口加工热转向贸易自由化。整个亚太地区，尤其是东亚、东南亚各国和地区，鉴于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世界经济的特点和可能发生的变化，都在通过更加开放的特区形式来谋取经济利益和应付新的挑战。因而在亚太地区率先出现了贸易自由化趋势。这集中表现在一个半弧形的自由港自由贸易区地带正在形成：它北起南朝鲜的济州岛，中经日本琉球、台湾加工区、香港、新加坡、印尼巴淡岛，南至泰国沙敦府和印度的安达曼、尼科巴群岛。台湾虽然中止在彰化开辟自由贸易区的计划，但鉴于出口加工区的优势正在丧失和推行自由化国际化政策的需要，已决定在出口加工区实行贸易自由化，放宽厂商的经营范围，鼓励发展贸易、运输、仓储和金融业务，改进贸易管理，取消进出口签证等。这些措施如果顺利实施，台湾出口加工区将发生质的变

化。在日本积极策划把琉球的那露自由贸易区建成东亚转口中心的时候，泰国的沙敦府特区也拟建成泰国连接太平洋地区的一个贸易和转运中心。至于印度的安达曼、尼科巴群岛更是雄心勃勃，要在印度侨民的支持下建成一个“新香港”。这些情况可以透露一个信息，亚太各国和地区都拟通过自由贸易的特区形式，来迎接世界经济中心向亚太地区的转移。

（三）科技化趋势。这是世界经济特区发展的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转移的又一个重要标志。当代科技革命迅猛发展，经济特区纷纷企求产业结构的高度优化。虽然劳动密集型加工业还有其存在的条件和发展的必要，但对于经济特区来说，争取由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向知识、技术密集型工业过渡已是大势所趋。因此，一些经济特区正在推行产业结构转型的计划，某些出口加工区正在升级为新一代加工区，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作为科技化趋势的典型形式的科学工业园区的问世，而且有些科学工业园区如新加坡的肯特岗和台湾的新竹已获得初步成功。

必须指出，这三种新趋势的中心是贸易自由化。经济特区是生产和流通的国际联系的特殊形式，是集中利用外资发展国际经济合作的地区，对它来说，只有通过贸易自由化才能比较顺利地实现特区经济的综合化和科技化。贸易自由化又是对于当前贸易保护主义的反动，经济特区只有实现贸易自由化才能在当前贸易保护主义方兴未艾时显示它的特殊功能。

世界经济特区发展的上述趋势，说明特区的发展正在突破它的原型形式——自由港、自由贸易区和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

工区，转向更高级的形式——综合性的自由港、自由贸易区和新一代出口工业区。因而对于各种特区形式的旧概念必须发展和丰富，而不可以用适用于原型特区形式的旧概念来品评现阶段的特区新形式或规定特区的发展新目标。

我国的经济特区是世界经济特区的后起之秀，更加需要充分考虑世界特区发展的新趋势，吸收它们的新经验，以适应现时世界经济变动的新特点和应付亚太半弧形自由港、自由贸易区地带的挑战。这是我国经济特区发展新阶段必须转向更高级的目标模式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国经济特区必须转向更高级发展形式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扩大对外开放的新形势对特区提出了更高要求。当前，我国正推行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要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发展对外经济合作，在更深的程度上参与国际分工和市场竞争，以经济的外向循环来促进国内经济的振兴。在这种战略的指引下，沿海一带已出现了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好势头：(1)沿海开放带已扩大到1.8亿人口的广大地区；(2)十四个经济技术开发区实行了具有特区性质的政策；(3)闽粤两省的开放地带正在建立大面积的对外加工区；(4)外贸、外汇、价格乃至整个宏观管理体制正在进行更深刻的改革。

在这种形势下，沿海开放地带原已形成的开放梯度格局开始发生变化：(1)优惠政策趋同化。当前沿海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开辟的一系列出口加工区所享有的优惠政策和经济特区已日趋一致，经济特区原有的政策优势正在丧失。(2)开放梯度趋等。优惠政策的趋同化自然地导致开放梯

度结构发生调整，因政策实施的快慢与优劣带来的不平衡发展也会引起开放梯度位置的变化。有些经济技术开发区已越居开放的前列，经济特区已不再独踞开放的第一梯阶。尽管现时特区也开始采取一些自由度更大的政策和经济形式，如开设保税仓库、保税工厂、免税商店和保税工业区，但某些经济开发区也迈出了自由度同等的步伐，如福州马尾开发区除了设立保税仓库外，还开设免税市场。

在这样的态势下，经济特区必须对自身提出新要求，依据沿海经济发展的新战略制订新的发展方针，把特区建设引向新的战略发展阶段，保持在对外开放总格局中的领先地位，以继续起到推动沿海开放全局的作用。

我国经济必须向新的阶段发展第三个原因，来自它自身内部的必然要求。虽然，我们的特区在建设伊始就吸取了世界经济性特区结构综合化的经验，立足于形成综合性产业结构，但是，应该清醒地看到，它创办9年来的实际说明，仍然有许多自身的薄弱环节，阻碍着发展的步伐：它的经济开放度明显落后于东亚——南亚正在形成的半弧形的自由港、自由贸易区地带；它对于国际资本仍没有较大吸引力，近几年外资流入的速度已经减慢；它的管理体制、特别是对外流通体制的改革，在现行政策的约束下还难以获得真正的突破，要按国际惯例运行有不少困难；特区市场的购销总量亦已增长乏力。种种情况表明，特区要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和高速增长的势头，必须扩大开放度，实行自由港、自由贸易区的某些政策，转向具有自由港、自由贸易区特征的特区经济形

式。我国新开辟的大特区海南岛，为了尽快开拓新局面，也很有必要在起步伊始就选择类此的目标模式。

## 二、具有自由港、自由贸易区特征的特区经济发展新模式的一般特点

实际上，深圳、厦门和海南经济特区都意识到必须积极采取措施、加速改革，促进特区向更高层次发展。深圳已明确提出要使其经济按国际惯例运行，促进经济的国际化；厦门特区在加速部署实行自由港某些政策；海南特区也宣布要实行比其他特区更开放的政策，逐步建成免税区。可见，我国经济特区向自由贸易度较大的新模式转变的趋势已初步显现。但是，（一）至今对是否选择这一模式尚存在很大争论；（二）对于这一模式的内容与特点更是缺乏应有的共识。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加以阐明。

具有自由港或自由贸易区特征的我国特区经济新模式有很大特殊性，它存在双重特质，即既具有世界自由港或自由贸易区的一般特征，又具有我国经济特区的基本特点。我国特区的自由港、自由贸易区的一般特征是：

它是国际间、区域间物资自由流通的集散地，各种商品交易荟萃的场所；

它是各国商船自由进出和停泊作业的口岸；

它大大放宽贸易管理，扩大减免范围，免征或只征很低的关税和间接税，以保证商品自由流通；

它引进先进技术，发展自由加工业；

它是世界经济、世界市场的一部分，具有竞争性和自发性，从长期看，它必然从属于国际价格规律，市场力量对生产要

素的转移和分配起着支配作用；

它允许资金自由投入（要符合特区发展规划）、自由调拨、自由流通，大大放宽外汇管理和兑换业务，存在外汇市场；

它实行宽松的人员出入境制度。

上述表明我国经济特区将具有自由口岸、关税豁免与低税并存、保税加工和有限制的自由贸易市场等综合性自由港或自由贸易区的一般特征。（严格说来，综合性自由港和自由贸易区还是有一定区别的，自由港的最大特征是作为自由口岸，自由贸易区却不一定具有这样的功能。但在本文内并没有加以区别，这是因为考虑到深圳如成为具有边境自由贸易区特征的特区，也将同时具有某种自由口岸的功能。）

当然，社会主义国家管理下的经济特区，必然具有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管理下的特区的种种特点：

它坚持为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基本方向；

它形成以社会主义经济为主导、中外合作经济占较大比重、多成份并存的社会经济结构，存在两重性的经济关系；

它应有良好的“后向效应”，要在发展商品经济、技术转移、促进出口贸易等方面对内地经济起到愈益增强的作用，当然也要把自由港、自由贸易区某些政策严格限制在特区范围内；

从较长时期看，它要为国家提供纯收入和外汇收入，同时也会提高投入资本的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

它对于劳资关系，国营、集体经济和外资双方采取协调的政策；

它要形成以贸易为导向以现代工业为基础的多元结构，以及适用技术和先进技术相结合的多层次的技术结构；

它是我国有计划商品经济条件下自由度很大、干预较少的市场经济，不过在一定范围内和某种程度上还存在必要的计划指导；

它以建立出口导向型经济来为我国出口替代和进口替代并重的战略服务；

它要构筑以现代经济为基础与先进科学技术相结合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在不发达的地区经济基础上建立的具有自由港、自由贸易区特征的经济特区，必然有一个由不发达的城市经济向发达的具有有限自由贸易特征的商品经济转变的过程，这个过程具有渐进性、长期性，所以自由港自由贸易区某些政策的实施就有一个由初期政策逐步发展、扩大到成熟期政策的过程。

这些基本特点说明我国特区不会全盘抄袭西方自由港、自由贸易区政策，而只是中国式的自由港、自由贸易区。

这样的特区经济将具有以下八大功能：（一）中转功能；（二）仓储功能；（三）加工和供应制成品功能；（四）展销功能；（五）吸引和转移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功能；（六）传输信息功能；（七）体制改革试验区功能；（八）后向效应和前向辐射功能。

必须说明，形成具有上述特征和功能的新模式，不是对现时综合性特区经济的否定，而恰恰是这一综合性特区经济合乎逻辑的发展。

三、实行新的特区经济模式必须划清若干理论政策界限

现行的特区模式和具有自由港、自由贸易区特征的特区模式是很容易混淆的。它们有许多共同点，特区现时又处在模式转换、政策转换的动态过程中，政策的具体差别不大明显。在这种情况下，要迈向上述模式的新阶段，更必须在指导思想上弄清某些重要的理论政策界限。

（一）要区分外向型经济和特区经济；现时综合性特区经济和具有自由港、自由贸易区特征的特区经济。外向型经济只是指其经济结构和运行同世界经济存在着紧密联系，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世界市场来实现它的外向循环。这个一般概念可以包括形态各异的具有同样外向型特征的经济，但不能取代特区经济的概念。特区经济是很特殊的经济形态，具有特殊的社会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决不是外向型经济所能代替得了的。不错，外向型经济是特区经济的显著特征，但不是它的唯一特征，它还有市场型、加工型、负债型等种种特征，它的社会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和非特区的外向型经济也有很大差别。认清这些差别是为了分清特区经济的特殊性，明确特区要发展的不仅仅是外向型经济，要确立的也不仅仅是符合外向型经济要求的产业结构和经济体制。

关于现时综合性特区经济和具有自由港或自由贸易区特征的特区经济的区别则是一个比较新的理论问题。有的同志认为，现时的特区经济并无定型，它还在发展，也可以包含自由港、自由贸易区特征。这其实是一种认识上的模糊。必须看到，人们对于特区经济的观念，就是现行的特区政策制约下的特区经济。现行的特区政策比较接近世界出口加工区政策，现



时的特区经济也比较接近出口加工区经济，而同世界自由港、自由贸易区所通行的一般政策有较大差别，这表现在：

项 目	关 税	税 收	价 格	贸易管理	工 业
新 模 式	扩大减免范围，下调关税税率	所得税15%，取消产品税，工商统一税，建立新税制	形成以接近国际价格的自由价格为主要形式的新体系	除少数实行配额管理外，原则上取消许可证制度	自由工业区
现行模式	保持现行税率	所得税15%，保留产品税，工商统一税	保持高于内地价格低于国际价格的自由价格和指导价格并存的价格体系	保留配额和许可证制度，但有所放宽，审批权下放	类似出口加工区

这种区别说明，同样是经济特区，却可以选择和形成不同的经济模式。可见经济特区只是一般概念，必须进一步阐明它的目标模式，我们的特区才有明确的发展方向。

(二) 要区分有限保护贸易和有限自由贸易。一个地区是实行有限保护贸易还是有限自由贸易，主要看它在贸易管理方面执行什么样的政策。

我国是执行高保护贸易政策的国家。特区的贸易管理，适应吸引外资和鼓励出口的需要，在某些方面放宽了进出口管理，但在另一些方面仍然实行保护贸易，还在一定范围内保留着全国统一的许可证制度和保护性关税政策，这与有限自由贸易还有很大差别。

即使现时特区贸易管理放宽，也主要局限在促进进出口贸易的某些政策措施上。

如上述指出的特区企业为履行出口合同进口的料件可免领进口许可证和免税，海关分别按来料加工或保税工厂办法管理，加工出口的产品也可以免税。仅在这些方面，我国特区的贸易管理类似于世界出口加工区所采取的政策。但越出上述范围，所采取的就仍是保护贸易政策了。现规定进口的生产资料只要转向生产内销、本销产品，就要依律征税；凡属国家统一管理或由省统一经营的出口产品，还须层层报批，申请出口许可证；进口供应特区市场的商品还须半税，且只限于既定的外汇额度内。世界出口加工区一般不存在进出口关税，加工料件进口及其产品出口均可免税，只规定转为内销时须照章缴纳保护性关税。但其所要保护的對象是特区外的被保护部门，而我们特区要保护的却首先是特区内的被保护部门；它是在特区外才实行保护贸易

政策。而我们特区却是在特区内实行保护贸易政策。虽然我们特区也放宽了贸易管理，采取某些具有自由贸易性质的措施，但是总的说来，还是处在全国统一的贸易管理和海关的管辖下，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保护贸易政策，因而也可称为有限的不完全的保护贸易。

现时特区的关税政策除了对保税料件加工出口实行优惠外，其他方面仍保持相当高的进口税率。制成品税率多数在60%以上，即使其中的一小部分减半征税，实际保护率也相当高；为生产本销产品进口生产资料的税率也不低。毫无疑问，保留这种水平的保护性关税显然和逐步实行自由港、自由贸易区某些政策的特区经济相矛盾，因此，怎样修改和调整特区关税细则确是一个迫切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看来应当防止两种偏向：一是过分强调实行保护性关税的重要性，否定扩大减免、调低税率和加强关税调节功能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一是过于强调具有自由港、自由贸易区特征的特区经济的关境外性质，主张统统免税。前者不理解保护性关税和与之相关联的财政补贴、扭曲的价格信号虽可起到某种保护内部企业的作用，但它会使企业脱离国际市场的需求倾向和商业竞争而陷于技术落后和产品老化的境地。后者则是对于世界自由港、自由贸易区的关税状况不甚了解，实际上各设区国无不根据自身的经济需要选择合适的特区关税模式。所谓特区经济的关境外性质是就其本质而言的，并不排除在实行自由港、自由贸易区初期政策、在其经济发展的特定阶段实行关税豁免和低度保护并存的关税政策。我们应当依据特区的产业结构、产品

成本和内外价格比率，重新确定合适的减免度和保护度，扩大减免范围，下调平均税率，须征税的部分要建立低水平的累进关税结构并分别厘定各类产品的税率，以引导特区的贸易管理逐步从有限保护贸易转向有限自由贸易。

(三)要区分一般市场经济和有限自由贸易条件下的市场经济。比较一致的意见都认为特区经济应当是市场经济，即受价值规律自发调节的经济。这种经济有较为完善的市场体系，企业是市场的主体，实行分散决策，依赖价格机制自动调节经济的运行，特区政府只在一定范围内作些干预。目前几个特区包括建设较早的深圳特区，也还没有完全形成这样的市场经济。不过，即使这样的市场经济形成了，特区市场经济仍然是用贸易管理和保护关税同国际市场隔离的经济，还是境内市场经济，也和有限自由贸易条件下的市场经济有所不同。有限自由贸易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将大大放宽贸易管理，实行关税豁免与低度保护并存并用以代替进出口许可证制度，它在很大程度上与国内市场相脱离而与国际市场相联系，从而成为境外或准境外市场经济。

1984年底，我曾经在《略论国际价值规律在深圳、厦门特区的作用》一文中概略地阐述由一般特区市场经济向有限自由贸易市场经济的过渡，指出价值规律在特区的应用必将发生重大变化。特区现存的双重价值决定和双重价值尺度会向基本上是国际价值决定及其价值尺度过渡，国际价值规律会居于支配地位。因而特区市场经济会发生很大变化：特区的市场价格会转化为国际市场价格或基本上是国际市场

价格，特区经济的运行主要会受国际市场价格机制的调节；特区市场的流动性会明显加强，商品、资金、劳务、技术知识的流动会大大提高；特区市场的扩张性会日益突出，市场容量必定迅速扩大；特区市场的竞争范围与方式亦非昔日可比；特区市场也愈益国际化，将逐渐发展为引人注目的贸易中心。

（四）要区分出口加工区和自由工业区。这两种特区形式在许多论著中都不加以区分，在实践中两种名称也互用，而其经济内容确实也差不多。不过，这里要探讨的不是那种名为自由工业区实为出口加工区的特区形式，而是特指综合性自由港、自由贸易区中的自由工业区和出口加工区有无差别。实际上两者的自由贸易度是有所不同的。自由工业区和出口加工区除同样没有出口税、出口限额、出口特许、生产资料进口税、企业完全自主经营、没有股权限制等共同点外，还有不少差别。自由工业区的环境是自由港或自由贸易区内的自由贸易市场，消费品进口免税或税率很低，企业产品可以本销，劳务费用相对较低，投资形式比较灵活，股权转让较为容易，故而有更大的自由度和灵活性，也要求有更强的竞争性。这样的自由工业区办得较为成功的如新加坡的裕廊工业区，它实行自由贸易政策，规定除烟、酒、汽车等少数商品征税外，其他包括生产资料和生活

资料在内的所有进口商品均不征税；区内还有十多万居民，大批商业企业，有不小的消费市场。十分明显，不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应当把这样的自由工业区同南朝鲜的马山、台湾的高雄出口加工区相区别。

有人认为凡是原形小自由港区之旁设一个小出口加工区，便应当将其合而为一称为自由贸易区。我们认为这种说法缺乏具体分析，至少应当分析一下它们的关税模式和经济结构，如果只是在小自由港区采取自由口岸政策、小出口加工区仍限于生产出口产品的生产资料进口免税，消费资料进口要纳税，则这样的出口加工区同自由贸易区还是有不少区别，就应当如实地按其本来面目称呼它们。

在特区发展的新阶段，应当关注这两种工业区的差别。选择具有综合性自由港、自由贸易区特征的特区形式，就不必按照自由工业区的经济特点和产业特点的要求来逐步地建立特区出口加工工业。现时特区的工业必须加速转型和发展的步伐，才有可能成为自由工业区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无疑是一个相当艰巨的任务。

作者单位：福建省社会科学院  
责任编辑：张硕城

# 论市场经济的规律系统

——兼析“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理论缺陷

价值规律应是市场经济规律系统而不是单个经济规律。这一系统中，供求规律处中枢地位。

“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不是理想的经济运行机制模式，从市场规律系统的动态运行来看，它存在相当的缺陷与片面性。

## 一、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体系的构成与市场经济规律系统的内容

从总体上说，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规律，可以划分为三大主要系统：

1. 在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主体条件下产生与发生作用的社会主义制度本质规律系统；2. 在发展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产生与发生作用的市场经济规律系统；3. 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规律系统。在这三大规律系统中，前者主要揭示和反映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的特殊性；中者主要揭示和反映了市场经济的一般性；后者主要揭示和反映了生产力发展这一自然过程的必然性。上述三大规律系统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同时又通过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统一的生产方式发展规律的作用，使它们构成了有机的经济规律体系。

所谓“市场经济规律系统”指的是什么

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从价值规律谈起。

传统的理论在谈到价值规律的时候，总是把它表述为一个单一的经济规律。例如，各种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几乎都是这样写道：价值规律的内容和要求是，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它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的交换按照价值量来进行，实行等价交换。这种表述把价值规律狭义化或片面化了，它仅仅包括价值决定和价值交换两层含义。实际上，价值规律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领域都发生作用。因此，传统的表述是不完整的、不确切的。

事实上，价值规律应该是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的规律系统而不是单个经济规律。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经济活动都和市场、商品发生联系。这种客观联系，一方面是纷繁复杂的、多种多样的，



因而反映其内在联系的客观经济规律也相应地存在多个；另一方面，在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条件下，既然商品的本质属性是价值，再生产的各个环节、市场机制的调节都与价值范畴紧密关联，与商品、市场、市场经济有关的一切规律都和价值有内在联系，都反映了价值的形成、变化、运动与实现，从而就构成了价值规律的系统。因此，我们应当完整地、准确地、系统地认识和把握市场经济的规律，把价值规律作为市场经济的规律系统加以研究。

当我们从系统的角度去揭示价值规律的时候，它的内容当然就远不限于传统定义所认定的“价值决定”和“价值交换”两点了。价值规律系统即市场经济规律系统在内容上至少是由以下规律在相互密切联系相互制约中共同构成的：1. 使用价值是价值承担者的规律；2. 商品价值量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规律；3. 等价交换规律（尽管价值量相等是商品交换的基础，但总体上要求的等价值交换只能通过具体商品的等价格交换表现出来）；4. 供求规律；5. 竞争规律；6. 价格规律；7. 积累和扩大再生产规律；8. 利润最大化规律；9. 比较成本规律；10. 利润平均化规律；11. 货币流通规律；12. 货币储藏规律；13. 资金周转规律；14. 利息率变动规律；15. 产品在市场上的生命周期规律；16. 有价证券交易规律；等等。这一系列市场经济的规律，通过相互交叉、相互制约所形成的“合力”就是市场调节。

在市场经济的规律系统中，供求规律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供求规律自发地要求供给和需求保持平衡。在供大于求时，买方市场形成，商品价格下跌，导致需求

增加，而生产者利润减少，从而又刺激生产收缩，价格回升，在新的水平上达成供求平衡；反之，供不应求时，卖方市场形成，商品价格上升，导致需求减少，而生产者利润增长，从而又刺激生产扩大，价格又回落，在新的水平上又达成供求平衡。可见，通过市场交换表现出来的供求规律，实际上对生产的方向和规模、对生产要素及利润的分配、对消费需求的数量和结构等等都起着调节作用。个别劳动能否转化为社会劳动、商品价值能否实现及实现的程度、各商品生产和服务部门的扩张与收缩、消费需求的满足与否及满足程度、各生产者的盈利大小等等，无不受供求规律所支配。因此，供求规律是市场调节的中枢。市场经济实质上主要就是通过供求关系来调节的经济形式。在过去自然经济、产品经济思想支配下，我们对供求规律乃至整个价值规律体系不予重视、不予承认；后来人们开始承认价值规律了，然而对属于价值规律系统中的供求规律尚未放到应有的地位上去认识。显然，如果忽视供求规律的研究。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所提出的总需求与总供给保持基本平衡的要求是难以自觉地达到的。

## 二、市场经济规律系统的性质以及它与其它规律系统的关系

对于市场经济的规律系统，是否可以给它戴上“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帽子？笔者对此持否定的回答。但是，过去人们常常乐于为市场经济规律系统中的“成员”定性，说什么某某规律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啦，等等。例如，对竞争规律、利润最大化规律等等，就曾经被人们打上“资本主义”的烙印，造成了许多“冤、假、

错案”。后来，虽然也承认了社会主义条件下有竞争等等，但又有人总是忙于划清竞争规律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和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不同，等等。其实，这种定性并不必要，也是徒劳的。

我们应当摒弃对市场经济规律认识上的主观片面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的经济规律，和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没有必然的联系。实际上，是搞资本主义生产还是搞社会主义生产，并不取决于或体现于市场经济的形式及其运行规律。实践已经表明并将继续表明：市场经济规律系统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中都有着共同的要求。至于生产的性质，它主要由在一定所有制基础上产生的社会制度本质规律系统所支配。

承认经济规律或经济规律系统的客观性、自发性，与承认经济规律或经济规律系统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并不矛盾。当我们把市场经济规律系统纳入当今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历史条件下去考察的时候，我们发现，价值规律系统不过是全部经济社会和自然界的规律体系中的一个子系统。在市场覆盖全社会经济生活的条件下，市场经济规律仍不可能不受其它规律系统的制约。

首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对市场经济规律系统中的诸规律发生着制约的作用。生产力发展的规律系统主要包括的规律有：社会分工和按比例发展生产的规律，科技进步和生产力加速度发展的规律，劳动生产率提高规律，生产的技术构成提高规律，产业结构的变化规律，生产力不平衡发展的规律，城市化规律，生产力要素的优化规律，等等。例如，社会分工和按比例发

展生产的规律，揭示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不断深化，对各部门、各行业之间的按比例发展提出了愈来愈高的要求，这决定了“只有当全部产品是按必要的比例进行生产时，它们才能卖出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717页），从而决定了商品价值的实现，决定了个别劳动向社会劳动的转换。同时，市场也只能随着生产力和社会分工的发展而发展，市场机制的作用程度也只能随着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增强。又如，科技进步和生产力加速度发展的规律，推动了劳动生产率和资金生产率的提高，促成了凝结在单位商品内的劳动量的节约，从而促成了单位商品价值量的下降；另一方面，这一规律又促成了产出的增长，促成买方市场的形成，改变着商品的供求关系等等。

其次，社会制度本质规律系统对市场经济规律系统也发生着影响和制约作用。社会制度本质规律系统是指反映社会制度本质和社会发展根本方向的规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条件下，这一规律系统所包括的最主要的经济规律有：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规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规律；在生产技术和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基础上，社会及其全体成员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相应提高的规律。这一规律系统从方向上制约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决定了企业效益和社会宏观效益的一致性；决定了运用市场经济形式发展经济，并不背离社会主义的根基；决定了可以逾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与不可逾越商品经济充分发展阶段，这二者是可以高度统一的。正因为这一规律体系的存在和作

用，社会主义社会中市场经济将可以比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市场经济有更健康的发展，从而有可能避免资本主义经济的某些弊端。

再次，自然规律系统的制约作用也不能低估。自然条件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人们只能在自然环境允许的条件下发展生产，离开自然规律侈谈经济规律是不现实的。例如，生态平衡规律对人们的经济活动乃至对人类社会的存在都起着生死攸关的制约作用。又如，对于某些受自然条件制约而稀缺的供不应求的资源，企图通过价格上涨自动地促成生产的增长，往往是难以办到的，甚至会因为市场价格上升带来的诱惑力增大而导致疯狂的掠夺性和破坏性经营。最近，宁夏发生的因大肆滥挖甘草而毁坏百余万亩草场、威胁到甘草资源再生的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在各类产品中，农产品产量尤其受自然规律的制约。即使在风调雨顺的时候，它也至少受耕地有限性的制约。因此，农产品价格提高对于产量增长的刺激作用是比较弱的，即产量的增长幅度一般低于价格提高的幅度。可见，市场经济规律作用的范围和程度，不能不受自然规律的制约。

既然市场经济规律系统不是孤立地发生作用，而是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和上述规律系统共同发生作用，因此，那种以为市场调节是万能的，能解决一切问题的极端的观点，显然是不符合客观现实的。当然，市场经济规律不仅受生产力发展规律系统和社会制度本质规律系统的制约，市场经济规律系统发生作用的结果，反过来也推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进一步巩固了社会主义制度。

此外，由于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上层建筑中的规律也会影响到市场机制的运转。例如，意识形态的超前与滞后规律，即思想观念或者可以超越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或者会落后于经济发展水平，这都会影响经济的发展。比方说，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封建官僚思想和小农经济思想，对于市场经济模式的发育是一种阻碍；而用共产主义空想社会主义观念去指导现实经济生活，同样会损害以致否定市场经济的发展，等等。

### 三、“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这一经济运行机制的构想不是理想的改革模式

经济运行机制，是社会经济有机体的各个组成部分和各个环节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推动整个机体运动和发展的方式和功能。它同样是一个系统。

中国的经济改革将建立什么样的经济运行机制？目前所提出的“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这一经济运行机制的构想究竟能不能作为普遍的公式加以推行？

固然，“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这一提法有可取之处，因为它毕竟否定了国家直接经营、管理、指挥企业的旧体制；同时又承认了市场是连接国家和企业的枢纽，承认了国家调节必须通过市场进行，企业必须根据市场信息的指示安排生产和经营，这毕竟是一种重大的进步。

但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还是不能也不应成为改革所要建立的经济运行机制的理想模式。因为它具有相当的缺陷和片面性，我们不能不对此加以若干重要的补充和修正。这些补充和修正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在作为系统的经济运行机制中，任何一方对另一方的调节不应是单向的，而应是双向的。如果把国家看成是凌驾于市场之上的高明者，是不妥的，甚至是危险的。在国家、市场、企业所组成的大系统中，市场不仅受国家调节，市场反过来也把信息赋予国家的担负有关调节活动的职能部门，使国家可以不断纠正失误的调节办法，不断提高调节的质量，健全和完善调节的手段。同样，企业也不是完全被动地受市场调节，企业行为也在对市场进行调节。因为市场无非是由供求双方所组成，除了个人消费者以外，大量的供求者都是企业，企业的供求行为当然会对市场发生影响。

第二，在经济运行机制中，包含着多个构成要素，因而市场的调节者不应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如果把市场仅仅看成是由国家来调节的，则是片面的。市场固然可以受国家调节，但同时也受到市场本身内在的两股基本力量——企业和消费者的调节。忽视市场自我调节的内在力量。仅仅看到外部——来自国家的调节，实际上是对市场机制本身认识不足的表现；同时也容易导致由国家操纵市场的错误。除了国家、企业、消费者这三股力量对市场的运转起调节作用外，还有一股应愈益重视的力量，这就是国际市场对内的调节。这四股力量构成了一个调节的系统，形成了调节的合力。国际市场的调节包含两方面的意思：一是就外向型经济地区（含经济特区）和外向型企业来说，其生产经营活动主要接受国际市场导向；二是就国内市场来说，同样受国际市场影响，如国际市场供求变化对国内市场供求的影响、国际市

场产品结构、品种、质量对国内市场的影响等等。在目前广东珠江三角洲一带，国内市场的流行产品已日益赶上国际市场的潮流，二者在时间上的差距正在缩小，这正是从一个方面证实了国际市场对内调节、影响的客观性。

第三，国家调节的对象可以是国内市场而难以是国际市场。固然，国家可以通过许可证制度、配额制度、出口补贴制度和关税壁垒来实行某种程度的对外干预，但在我们这样一个外贸在世界国际贸易中的比重十分低微的国家来说，除了个别属于我国独有的和垄断的产品之外，这种对外干预的作用在总体上是很弱的。国际市场总是按照它固有的内在规律在运行着，我们在发展外向型经济时，从国家到企业都应充分注意这一点。否则，占领国际市场只能是一句空话。

第四，国家调节的目的何在？对此，“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模式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国家调节市场，不应是在国家直接管理企业的旧模式中插进一个“市场”那么简单，不是用国家调节去限制市场经济规律，限制市场机制的运行；国家调节的目的应是为企业创造自主经营的环境，是完善市场体系，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让市场经济规律系统获得纵横驰骋的广阔舞台。否则，象目前某些地方对某些商品重新采取凭证凭票限量供应的那种“国家调节”，只能是对市场经济机制和市场经济规律作用的限制。

最后，对经济运行模式的研究，应当摒弃孤立的静止的形而上学的观点，而应从系统的动态的发展的角度去把握它。因此，简单地用“企业——市场——国家”或



“市场——国家——市场——企业”的提法来代替“国家——市场——企业”的提法，并不能很好地解决问题。我认为，从动态上去把握经济的运行，应看成是一种螺旋式上升的、不断发展的经济运行。也就是说，国家及其它力量通过各种杠杆对市场进行调节，企业接受市场调节，尔后生产和销售市场需要的产品；市场供求形势又反过来促使国家调节更趋完善，更完善的国家调节又更适应市场并对市场起更积极

的作用。市场对企业的引导也将更少盲目性，企业的生产和经营又更上一层楼，消费者也从中愈益得到更多的实惠，……如此循环往复，不断发展提高，其结果必将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作用得到更好的发挥，从而带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面繁荣。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经济系

责任编辑：张硕城 黄振荣



## 枢密院始于晚唐

齐 辛

上海辞书出版社新版《辞海》“枢密院”条曰“枢密院：中国封建时代中央官署名称，五代后梁时建立崇政院，后唐改称枢密院，宋代沿置。”（缩印本第1274页）此处将后梁的崇政院作为枢密院之发端，实误。据晚唐人裴光庭《东观奏记》卷中，宣宗“尝诏枢密院，兵部侍郎、判度支萧邴可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唐语林》卷1也有相同记载，可知至迟在唐宣宗朝已设立了枢密院。至

唐末昭宗时，枢密院又分为上下两院。或称东西两院。《通鉴》卷263天复元年正月条云“王知古为上院枢密使、杨虔朗为下院枢密使”，胡三省注：“枢密分东、西院，东院为上院，西院为下院。”《金石萃编》卷118《吴承泌墓志》也有“充（枢密）东院承旨”的记载。后梁建国后，将枢密院改为崇政院，至后唐，标榜承唐朝余绪，乃将崇政院复改为枢密院。

## 试谈经济波动与经济结构的关系

中外学者对经济波动的研究，均偏重“因素分析”、“总量分析”，而忽视结构因素的影响。

产业结构失衡所导致的“倍数效应”的失控，严重影响经济总体水平的稳定。

我国长期奉行“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忽视工业内部结构的合理化，给经济总体水平发展的稳定性造成极大影响。

经济波动，即西方学者所谓商业周期(Business cycles)或经济周期。是指经济活动水平即就业、生产和物价水平的波动。

关于经济波动的原因，从1860年法国经济学家朱格拉首先系统考察经济波动现象以来，西方有很多学者进行过研究，理论有几十种之多，但可粗略地划分为内因论和外因论两大类。所谓外因论，就是从影响经济总体水平的外生变量来解释波动，如心理原因论、政治原因论、工艺技术原因论、人口原因论、自然原因论等等。所谓内因论，就是从影响经济水平的内生变量解释波动，如货币原因论，消费不足论，投资过渡论等等。从西方到我国，经济学家们研究经济波动的原因，有一个共同的弱点，即偏重于“因素分析”、“总量分析”，而忽视结构因素对波动的影响，下面我将从结构角度对经济波动的原因进行一些探讨，以供参考。

### 一、结构失调与短缺的“倍数效应”

我认为，对经济活动的总体水平产生影响或者约束作用的因素，除了自然因素、政治因素、

货币因素、供需制约、资源的总量制约等以外，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就是产业结构状况的制约。如果产业结构严重失衡，则资源配置的效果必然是低下的，经济活动的总体水平，不仅增长缓慢，而且不稳定。为了说明这一点，我想借用斯庇索夫的商品分类法，他把商品分为四大类：

(1)当前消费品，如食品、衣着；(2)耐久性消费品，如住宅，家用电器；(3)耐久性资本品，如矿山、钢铁厂、铁路等；(4)制造耐久品所需材料，如钢、水泥、木材等。这样的商品分类也许不很严密，我们且不必深究这一点。我们只需知道，这些类型的商品是互补的，这一类生产不足，意味着另一类生产的过剩。就象一双手套，失去了其中的一只，余下的另一只就成了没有用的。从统计学的角度看，我们只缺一只手套，但在这一只手套没有进行补充生产之前，我们实际上等于缺一双(因为现存的一只也不能发挥其效用)，把这一现象在经济生活中推而广之，就是我所谓短缺的“倍数效应”。其规律是：产品之间互补性越强，倍数效应就愈大。

在我国的具体情况下，这种“倍数效应”的作用是很明显的。假定某省短缺价值1亿元人民币的能源，会导致能生产价值数倍于此的生产能力闲置。从而，电力短缺这种结构失衡对总体经济水平的影响是一个倍数。产业结构的失衡可进一步区分如下：

### 二、横向的失衡与纵向的失衡

我国结构失衡可区分为纵向的失衡与横向的失衡，为了使二者相区别，我想举如下的例子说明：生产面包，需要面包机，生产面包机，需要生产面包机的机器，以此类推，形成这样一个生产链条：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推算，我国的霍夫曼比例是相当小的，1980年为0.8，1982年为1，1983年、1984年、1985年三年均为0.98。这一点而言，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判断，虽然我国的人均国民收入水平低，但我国工业化的程度已进入霍夫曼所谓“第四阶段”，即意味着我国的工业化程度是相当高的。

我国要获得经济的稳定增长，要求产业结构的演进与工业化这一进程相一致。根据统计数据和分析，就会了解我国经济结构是如何制约我国经济的稳定增长的。首先，把我国制造业产值增加中所占的份额，与国际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70美元（1953年）的水平相比较（如下表）：

主要工业门类	我国各业所占比重	国际270美元/人、年国内生产总值时的平均值	二者的差额
1. 食品、饮料、烟草工业	10	38.4	-28.4
2. 纺织品及服装工业	12.1	13.8	-1.7
3. 木、纸、印刷品及皮革工业	6.6	10.9	-4.3
4. 橡胶、化学及石油工业	18.1	10.9	+7.2
5. 工业原料	23.6	9.2	+14.4
6. 金属加工产品	26.7	15.9	+10.8

（注：资料来源：按《中国统计年鉴》1986年275页数据推算）。从上表可见，我国的轻工业（表中1—3项）所占比重远远低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其他国家的平均水平，而重工业（表中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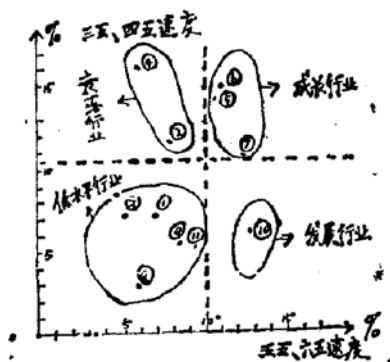
6项）所占比重则远远高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其他国家的平均水平。

其次，再把“三五”、“四五”时期的各制造业的平均增长速度与其在“五五”、“六五”时期的增长速度作一比较，如下表：

部门划分	“三五”、“四五”时期平均增长速度(%)	“五五”、“六五”时期平均增长速度(%)
1. 冶金工业	7.05	7.65
2. 电力工业	11.2	8.1
3. 煤矿工业	7.1	5.2
4. 石油工业	16.55	6.05
5. 化学工业	13.85	10.85
6. 机械工业	14.75	11.1
7. 建材工业	10.45	12.55
8. 木材工业	2.8	6
9. 食品工业	5.4	8.6
10. 纺织工业	6.1	12.55
11. 造纸工业	4.85	9.1
12. 平均增长速度	10.4	10

(资料来源同上)

接着,我们以“五五”、“六五”时期的平均增长率为横轴,以“三五”、“四五”时期的平均增长率为纵轴,做散点图如下:(轴上代表平均增长速度)



(注:①②……⑩⑪表示各行业的标号)

按照增长率的变化,对我国各行业进行分类如下:⑤化学工业,⑥机械工业,⑦建筑材料工业在两个阶段的增长都超过工业的平均增长率,可称之为“成长行业”,⑩纺织工业,在前十年(“三五”、“四五”时期)还低于平均增长速度,但到后十年(“五五”、“六五”时期),就明显地高于平均增长速度,可称之为“发展行业”,④石油工业,②电力工业在前十年高于平均增长率,但在后十年大大低于平均增长率,称之为衰落行业,①冶金工业,⑧木材工业,⑨食品工业,⑪造纸工业在两个时期的增长率都低于各行业平均速度,可称之为“低水平行业”。

从上述得出的结论是:虽然我国的重工业化程度比较高,这只是一个总量概念,但就工业内部的结构而言,是极不合理的:目前,我们日常经济生活中感觉最为短缺的,一是能源,二是原材料,从上图可以发现,正是电力工业、石油工

业、冶金工业、煤炭工业、木材工业等部门的增长速度最低,成为“衰落行业”、“低水平行业”。

长期以来,我们认定存在着一个“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认为要使国民收入有一个较高的增长率,必须使投资品部门(主要是重工业)占较高的结构比例,这体现在投资品部门的较高的投资比例上。但令人遗憾的是与此相伴随的却是工业内部产业结构的非比例性导致的“瓶颈”约束,出现大量消费品供应的短缺。后者短缺是由于消费品与投资品在总量上的比例不合理所致,主要是一个总量问题,而优先增长的投资品亦出现短缺,则完全是一个结构问题。用我举过的例子来说:各种投资品发展的不平衡,造成的局部短缺,就象一双手套失去了一只的情况一样,带来的是更为严重的倍数效应。这种现象可称之为总量矛盾与结构矛盾导致的双重短缺。

这种双重矛盾的原因,上升到体制的高度,就是因为我国的产业结构的转换能力差,缺乏一个产业结构的自动调节机制。具体地说:(1)企业内部所有权主体缺位,企业内部没有一个长远发展利益的人格承担者,企业倾向于进入投资少,回收期短、见效快的所谓“短、平、快”项目;(2)价格扭曲、价格刚性;(3)生产要素滞流、市场发育不健全,也没有一个以竞争为前提的企业淘汰制,迫使企业追求长远发展目标,从而决定了企业的时间视野短。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我国产业结构的失衡问题,企业经营机制的改革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经济研究所  
责任编辑:黄振荣



编者按：本刊今年第二期发表《广东山区经济的起飞与工业化政策》一文后，引起有关方面重视，也引发了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的进一步讨论。山区经济的发展，是广东全面开放和综合改革的重要部分。这里发表汤彤海和陈权同志的文章，从一个县的具体做法出发对怎样发展山区经济提出见解。

## 山区工业发展的五个并重

汤 彤 海

赵紫阳总书记在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指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社会生产力所要解决的历史课题，是实现工业化和生产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工业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产物，也是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重要标志。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经济发达程度，主要取决于工业的发展程度。我国广大山区的工业化程度是很低的。我们乐昌县虽然是粤北地区9个县（区）的第一个工业产值超过农业产值的县，但同发达地区相比，仍然有很大的差距。为了缩短这种差距，就必须从本县的实际出发，制订出今后的发展战略。经过有关专家的论证，我们乐昌县初步的战略构想是：以集约化农业为基础，县办工业为主导，乡镇企业为主体，建立一个结构层次多元化，支柱企业系列化，发展速度持续化，经营形式集约化，经济效益高效化的目标。根据这一构想，要争取山区工业经济的突破性发展，我认为，下述五个方面的同时并重是应当认真考虑的。

一、发展县办工业和乡镇工业同时并重。综观我县工业发展格局，县办工业和乡镇办工业已经发展成我县工业经济的两大支柱，是我县工业腾飞的两翼。合理调整城乡工业布局，保证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坚持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积极振兴县办工业既符合我县当前工业发展现状，又体现了我县今后工业发展的丰富内涵。

发展县办工业和乡镇办工业同时并重，并不等于在每个发展阶段都同时平均使用力量，也并不是在发展项目的布局、选择上不能有所侧重。一般来说，县一级较乡镇一级有较强的驾驭全局的能力，能在较大范围内实施生产诸要素的优化组合，具有在一定时期内乡镇难于具备或难于比拟的基础条件。发展县办工业，增强县财政的支柱能力和对乡镇工业的辐射作用，经济工作这盘棋就能活起来，就可有效地成为农业和其它各项建设事业发展的后盾。

发展县办工业，一般应以实施技术难

度较大的骨干企业为主，以建立技术密集型企业为主，把一般加工性和劳动密集型企业尽可能扩散到乡镇去。实行凡乡镇能办的，县不争、不挤、不抢的指导原则，做到城乡兼顾，各有侧重。

我县乡镇一级的工业除少数已具备初步基础外，特别是石灰岩地区，从严格的角度上讲还是“工业空白”。因此，重点在乡镇布局工业项目，特别是在乡镇布局劳动密集型的加工项目，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的紧迫任务。我们应首先利用和发挥一些镇工业比较密集，交通、地理条件比较优越的特点，作为第一步发展阶梯，加快现有企业的改造步伐和优先发展一些加工项目，第二步发展阶梯就是要认真抓好现有基础较好的乡镇。这样，到1990年就可能实现乡镇工业产值超亿元。

二、发展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企业同时并重。这主要是从企业的技术装备程度和生产过程的机械化、自动化程度来讲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具有一次性投资少，劳动容量大，企业的经济效益比较容易统一的特点。在现时条件下，这是我们重点发展的一个产业部门，特别是乡镇企业，根据其自身条件，应该作为一个首选课题发展一批建材、矿产和农副产品、竹木产品的生产加工。这里特别值得指出的是，目前国际资本（包括港资、美资、日资、欧资等）已显现出流向中国，开展“三来一补”业务的趋向，南边珠江三角洲地区由于经济的发达和劳动费用的增加，来料加工也可能逐步向北转移。因此，我们要善于捕捉这一信息，抓住这一时机，争取发展一批“三来一补”的企业，为解决城乡劳动力的出路，特别是为农村的劳力

向非农产业转移开辟一条新的途径。

技术密集型企业是工业现代化的标志。在进行传统产业革命的同时，我们要敢于接受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积极采用先进的生产技术成果，提高企业的技术装备程度。只有这样，才能大幅度地提高劳动生产率，有效地降低劳动消耗和物质消耗，提高产品质量，增强市场竞争能力。例如坪石镇塑料厂1985年进行技改，从日本引进了一条具有80年代先进水平的塑料圆织机生产线，生产能力从年产几十万平方米一跃增到400多万平方米，投产两年来，在原料紧缺的情况下，由于其技术先进，产品质量过硬，外贸部门竞相来料加工；开工率较高。完全可以预料，随着一定数量的生产线的引进及其效力的发挥，我县工业系统的技术、设备装备状况将发生一个质的变化。

三、发展工业利用本地资源优势和利用社会资源优势同时并重。工业生产的资源对象是多元化的，有农业的、矿产的、工业的，有野生的、人工的，也有本地的、外地的等等。在工业发展的起步阶段或初级阶段，首先应着眼于本地资源，通过工业加工（制造）转化为商品，成为本地的经济优势，无疑是一种“多、快、好、省”的办法，甚至是一条捷径。就是说工业有了一定的发展，也有一个开辟新的加工领域和扩大加工的深度、广度问题。我们有优越的地理条件，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将为工业的发展建立可靠的原料基地。我们要为此大做文章，建立起工农结合的经济体系。

但是，我们决不能囿于本地资源，特别是不能仅从农业资源来考虑工业发展问

题。过去那种“围绕农业办工业”的提法，实质上困死了工业发展余地，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工业，也只不过是单一的农业资源工业。因此，我们应该以拓展的眼光去发展本地不具备资源条件而市场又有容量的工业生产，把工业发展的舞台尽量扩展得大一些。日本是举世公认的资源贫国，现在却发展成为一个工业富国，其成功就在于较好地利用了国际资源。我县不产棉花，但却办起了全省较大的棉纺厂。我县并不生产钢铁，但长来乡却办起了两间扎钢厂。由此可见，有无资源或资源多寡并不是工业发展的唯一条件，思路广阔，开展多方位的资源战略才是正确对策。

四、产品生产项目立足于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同时并重。工业产品对市场的依赖性很强，对市场变化的反应很灵敏，所以，必须有一个灵活的、应变自如的市场战略。过去，我们办一个工厂，生产一种产品，企图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有稳定的销售市场，成为“万岁工厂”，“万岁产品”。这在当今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是不可能的。我们从办厂的那天开始，从一种产品投产的那天开始，就应该想到倒闭的可能，淘汰的可能。倒闭了、淘汰了再办新的工厂，再搞新的产品生产。只要我们在该产品的市场衰退以前收回全部投资，那就是取得了理想效益。不是经常听说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某年某月倒闭了多少工厂，抵偿抛售厂房、设备吗？除了少数是经营不善、亏本被迫倒闭的以外，多数是捞够了，主动自我更新，转向生产其它产品。我们应该适度仿效，增强投入勇气，缩短建设周期，抢占市场。同时，也要准备退却，研究新的资金投向。

现代社会是一个开放的社会，一切经济活动都具有国际性。打入国际市场，跻身于世界市场的竞争行列，这是我们工业发展的一个新的着眼点。跻身于国际市场，有利于纵观世界经济技术发展的动向，吸收并进而消化世界的先进技术成果，不断地提高自己的生产水平。乐昌制衣厂积极开展外贸加工定货和外商直接来料加工，几年时间，生产设备几乎全面更新，现在的生产规模已相当于原来的三四倍。而且，还带动办起了四五间乡镇制衣厂。坪石毛巾厂积极承担外贸出口加工业务，生产规模也日新月异，由原来产值百余万元发展到今年可达400多万元，明年可扩展到1000万元的规模。同时，还把金鸡染织厂、老坪石织布厂带活了。所以，应把研究国际市场动态，积极开辟国际市场作为我们每一个企业管理者及每个经济工作者的一个新课题。以出口促进工业的兴旺，以工业的兴旺进一步扩大出口。我设想，在今明两年内，我县工业产品的出口总产值应争取达到占全部生产总值的15%以上，到1990年达到25~30%或更多一些。这样，我县工业经济以内外结合的格局就可基本形成。

五、内涵扩大再生产和外延扩大再生产同时并重。内涵扩大再生产可以有效地控制社会基本建设规模，是一条好路子，也是中央的政策，我们应该坚持。而且，我县的工业已有一定的规模，整个工业固定资产总值已达85214万元，有较强的自我积累、自我投入、自我发展的能力。但从整体工业发展规模上看，单靠内涵扩大再生产，其生产能力只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较难产生新的飞跃。特别是在经济较

落后的山区，要想较快地缩短与先进地区的差距，产生工业生产能力的飞跃，还必须同时走外延扩大再生产的道路，通过社会集资、外引内联、银行贷款和力所能及的自筹，兴建一批新的工业生产项目。试想：麻纺织厂近2700多万元的投资，如单靠棉纺厂的自我积累便不能如期解决。我们初步规划在近一两年内还要兴办一批轻工、食品、化工、建材、纺织和改造、扩建一批老企业，其资金来源，也只能以银行贷款为主渠道的办法来解决。所以，我们必须强化发展观念，强化投入观念，既要量力而行，又要敢于冒风险。只有这样，

在不断改造和扩大现在企业生产的同时，又开拓新的生产领域，争取上一批新的生产项目，才能较好地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

上述5个方面的“同时并重”，实际上是工业发展中的空间布局、类型选择、资源对象、市场开拓，资金筹集等几个问题。我认为，在我们讨论山区工业发展问题时，从本地实际出发把这几个问题的相互关系处理好了，并随时根据变化了的情况灵活地进行运用和调整，是一定能够收到预期效果的。

作者单位：中共乐昌县委

责任编辑：范英

## 乐昌建设苧麻基地的对策

陈 权

乐昌县地处粤北，1/3的面积属石灰岩地带。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10年间，在农业方面，“小而全”的自然经济格局虽有所突破，但尚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同时，工业内部的结构也不尽合理，主要存在“三个脱节（工业发展与农业发展相脱节、加工业与资源利用相脱节、工业布局与山区优势相脱节）。

为了从宏观指导上闯出一条优化经济结构的新路子，乐昌县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决定把开发苧麻系列产品选择为战略突破口，这是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的客观要求，是加速石灰岩山区脱穷致富、促进全县农村经济均衡发展的有效途径，也是建立乐昌工业优势带动全面经济起飞的需要，更是我县源于对市场和自身竞争条件的认识。从1985年起，我们就围绕建设基地的一些政策问题开始了积极的探索。

一、领导与群众相结合，有规划、有组织地发动广大群众大打苧麻生产总体战，通过产销合同和优惠政策，把千家万户的小规模生产纳入商品生产基地。1985年12月，县委、县政府作出了

关于发展苧麻生产的决定，此后陆续制定了育苗、植麻、合同收购、肥料供应等一系列扶持苧麻生产的优惠政策和措施，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种麻积极性。与此同时，县委、县政府采取强有力措施，统一规划，责任到户，领导办点，分工包干，从1985年起连续3年持续大打种麻总体战，到1988年已实现5万亩基地麻目标。今后将把基地建设重点放在疏理流通渠道、完善服务体系、推进技术进步和提高经济效益诸方面。

二、以加工工业作苧麻基地的后盾，努力实现贸工农良性循环。在建立苧麻生产基地的同时，在省市支持下，我们投资180万元在苧麻的主产区建了一座精干麻厂，接着又投资146万元在该厂新建麻球车间，1988年投产后，增强了该厂的配套生产能力。这个座落在苧麻基地中心位置的乡镇企业的建成投产，给广大麻农吃了一颗“定心丸”，增强了他们发展基地生产的信心，对企业也产生了一种“向心力”。1987年春，在中央有关部门和省市的关怀支持下，立项投资为2600万元、拥有长短锭共1万锭的乐棉麻纺车间也破

土动工，建成后产品70%由外贸代理出口，30%由外贸收购出口，加上今后陆续发展的麻织、针织、漂染、制衣等深度加工产品，这样，从苧麻种植到系列终端产品之间将拥有一条顺畅的通道，石灰岩山区苧麻生产基地将纳入贸工农型轨道，根据麻纺的设计能力，每年将消化精干麻1500吨，反过来又将刺激精干麻加工能力的增强和苧麻种植面积的扩大。这种贸工农良性循环机制，将引导我县苧麻生产基地和苧麻工业新体系朝着高层次、高效益的方向发展，并大大提高社会总体效益。

三、完善农村双层经营和服务体系，逐步优化农村经济组合，把基地生产推上集约化、规范化、专业化的轨道。经过近3年的发展，苧麻生产基地目前的状况具有如下三个特点：一是外延性生产急剧扩展，已形成一定规格，但基本上处于广种薄收的粗放经营状态；二是通过合同订购把千家万户的生产纳入了基地范畴，苧麻生产基地已具雏形，但广大麻农的生产仍是小规模、分散的、易变的，他们与基地的关系处于一种松散状态；三是产供销之间建立了一定的联系，但由于双层经营的整个服务体系的不完善，以及目前综合加工能力的不足，导致产供销之间联系的低效率和不稳定，麻农和加工企业之间以及基地内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磨擦时有发生。这种状况是与双层经营体制的不发育相一致的，这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家庭经营自主权的矛盾，社会化商品生产与小规模家庭经营的矛盾在我县商品生产基地建设中的反映。只有通过建立和完善农村双层经营体制才能逐步得到解决。从我县苧麻基地的状况出发，在今后3年内，我们拟重点探索和解决以下3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因势利导，设立各级地域性的苧麻专业合作组织，完善服务体系。目前相当部分麻区的生产缺乏组织和专业指导，生产资金、产品收购、肥料和农药供应、运输等方面的服务都出现脱节，社会各服务部门很难为千家万户分散的生产提供有效的服务，产供销的衔接松散，广大农民强烈希望原有的经济组织担负服务的责任。因此，很有必要在自然村、行政村和乡镇政府3个层次上，相应设立苧麻专业合作组织，由它们与社会各服务部门统一发生关系，“承上启下”，为本地区提供产供销各项服务。这种专业合作组织的职能有3个：①对上对下签订产销合同

并严格执行合同；②上承下达，传递信息，组织与指导生产；③产前、产中、产后服务，包括贷款、技术、肥料、农药、产品收购、运输等项内容。专业合作社实行责权利结合原则，可按苧麻收购价的7%左右提取手续费，除提留部分作公共积累外，其余部分应同参与固定服务的供销社、县苧麻办和乡镇比例分成。通过这种经济联系建立服务网络内部比较稳定的经济责任制，使服务规范化、社会化成为可能，同时，还可大大调动村一级干部积极性，解决多年来村级干部责任制不落实的老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建立中间经济组织，制定适宜的价格政策，实行苧麻基地风险基金制度，保证基地生产与苧麻工业持续稳定发展。基地生产持续稳定的发展，取决于麻农持续稳定的积极性。要保持这种积极性，核心问题是要有一个适宜的价格政策。我们设想，在继续实行目前基地政策的同时，可在乡村和国家之间试验建立一种“中间经济组织”，它既是基地经济活动的组织者，又是联系商品生产者的投资主体，主要职能一是负责调节经济利益、盈利多时，可把一部分利润通过一定形式返回给麻农，按合同价格实行内部交换，支持他们发展生产；二是可以建立一种风险资金制度，帮助农民减少风险。它可以从每年的收益中留一点利润，建立一笔风险基金，国家也可以在必要时通过减税等经济杠杆的调节和麻纺价格的支持，使其能保持一定数量的利润用于风险补偿。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麻价大起大落的问题，对基地工作和苧麻工业持续稳定发展提供又一个强有力的保证。

第三个问题，是发展优良品种，加强技术进步，提高苧麻生产水平和总体经济效益。近几年基地生产广种薄收的现状，除了石灰岩山区农民还未从根本上摆脱贫困，对农业的投入过少这个原因外，先进技术的普及和技术服务跟不上也是一个主要原因。许多农民仍沿用过时的传统耕作方式，或者不懂得选择适应本地栽培条件的优良品种，尤其是缺乏种优质麻、夺高效益的观念和技术，远远不能适应生产发展的要求，很有必要建立一个以县苧麻技术开发服务组织为核心的，各乡镇村技术员为骨干的技术服务网络。县苧麻办可以转轨成技术开发服务组织，为基地麻农提供适度和有偿的技术培训、技术承包或咨询、示范和组织种子、肥料、农药、设备等综合性服



务，并通过经济合同与乡镇村二级苎麻技术员建立紧密的横向关系，使技术服务尽可能覆盖整个麻区。

在建立技术服务网络的同时，应十分重视优良品种的推广。当前国内外纺织工业技术日益发展，对原麻的单纤维细度、纤维柔软性等指标要求日高。纤维的细度愈高，纺织价值愈大，市场竞争力越强。我们打算在3年种植的基础上，对所种品种实行去劣存优，适时更新，大力推广优良品种。

在技术进步方面，技术服务网络和各级苎麻专业合作社要围绕优良品种的种植，总结和推广

适应本地气候水土特点的一整套良种种植管理方法，举办育苗、移栽、管理、扯麻刨麻等全套技术培训班，推行培育壮苗、合理密植，重施追肥、增施磷肥、去杂除劣，快速成园、动力剥麻和各种繁殖等新技术、新工艺，并与增加投入、精耕细作相结合，把我县优质麻的产出比例从现在的30%提高到70%以上，在短期内把粗放经营推进到集约化经营的水平。

作者单位：原中共乐昌县委

责任编辑：范英



## 梁红玉籍贯小考

钟士和

梁红玉，南宋抗金名将，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曾记载：“韩蕲王之夫人，京口娼也。”后来元人脱脱等编修的“宋史”对梁的籍贯出身只字不提。直至当代，一些颇有代表性的书籍都沿袭了上述两书的说法。如蔡东藩《宋史演义》、臧励稣《中国人名大辞典》、新旧《辞海》、《辞源》以及《中文大辞典》（台湾版）等都回避了梁红玉的籍贯问题，这不能不算是一个缺陷。据本人查证，梁红玉的籍贯是江苏淮安市。

清乾隆年间的《山阳县志》记载：“宋，梁夫人，蕲王韩世忠妻。楚北辰坊人。初，江淮兵乱，梁流落为京口娼家女。”清同治年间的《重修山阳县志》清光绪年间的《淮安府志》在山阳县列女中记载略同。山阳县即今淮安市，（1988年前名淮安县）北辰坊即今淮安市淮城镇新城村。

北辰坊，又名北辰镇、北辰堰、北神堰。因地处古淮河岸边，春秋时吴王夫差开凿邗沟以勾通江淮，于此筑堰而得名。

上述清代诸县志，很可能参考了具权威性的韩世忠墓神道碑。碑名“中兴佐命定国元勋之碑”，碑高一丈三尺余，因碑文字数逾万，俗称“万字碑”。碑文中有两处记载了梁红玉的籍贯：“杨国，家楚州，织薄为屋盖。”“杨国，家本楚州，寓京口也。”杨国即梁红玉。梁红玉因抗金有功，被封为杨国夫人。宋孝宗淳熙四年，（公元1177年）朝廷为岳飞等人平反，同时追封韩世忠为蕲王，并按王的规格对韩世忠夫妇重新安葬。神道碑碑名由宋孝宗亲自题写，碑文由礼部尚书赵雄撰写。此碑建立时间离梁红玉逝世不到三十年，碑文又出自官方，其内容当是准确无误的。

本期“书海酌蠡”责任编辑刘斯翰

## 认同与融合： 闻一多的文化观

闻一多的多元文化观认为，中国的本位文化周初便已定型，是本地众多民族合力的创造。少数民族多次“入主中原”的结果都是“汉化”而非“胡化”，而伴随这“认同”的便是“融合”，各种文化在交流中放出异彩，这是世界文化发展的一个规律。

五四以来，把文化学引进文学（包括学术）研究领域的作家、学者并不止闻一多先生一人，但他在这方面成就巨大，最引人瞩目。

五四时期，闻一多先后发表了两篇评论郭沫若《女神》的文章——《女神之时代精神》与《女神之时代色彩》。一方面热烈赞扬《女神》不单形式新，内容也新，富有二十世纪的时代精神；一方面又批评《女神》不独形式十分欧化，而且精神也欧化，缺乏地方色彩。而这地方色彩正是东方的文化，它是美的、韵雅的。后一个观点，显然与当时激烈反对中国传统的论者有所不同。是不是他理智上接受西方，情感上面向传统？不是。因为它不是非此即彼的问题。中西文化的碰撞在知识分子思想中引起的变化是十分复杂的，热衷于外来文化输入的人，往往很难避免过分的“欧化”，对传统持否定态度的人，又难于摆脱传统的束缚。甚至出现过这样的情况：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被一般人目为国粹派“封建卫道者”的，却是介绍近代西方文化最有影响的人物。林纾和严复就是典型。可见有些文化现象，不是几句话讲得清楚的。就以闻一多来说，他在留美期间受庞德、叶芝、罗威尔等人的影响很深，但回国后却没有跟意象派诗人那样反传统、反理性。闻一多的文化观有个发展过程，但他不是一元论者，他说得很明确：中国文化并不是一个单纯不变的文化，最早的东夷西夏两民族，分明代表着两个不同的文化，只不过它们早已融合到了分不清谁是主客的程度。

在《文学的历史动向》中，他以对近代文明影响最深的四个古老民族——中国、印度、以色列、希腊为例，说在悠长的年代里，四个文化起先沿着各自的路线分途发展，后来，随着文化势力的扩展，四个文化“一个个胳膊碰上了胳膊，于是吃惊，点头，招手，交谈，日子久了，就交换了思想观念与习惯，最后，四个文化慢慢的都起着变化，互相吸收，融合，以至总有那么一天，四个文化个别性渐渐消失，于是文化只有一个世

界的文化。”

由于生产发展，世界市场的开拓，过去那种地方的或民族的自给自足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互相依赖所代替，各民族的产品成了公共财产，于是出现由许多种民族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一种世界文学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早就明确地阐述过了，这并不是闻一多的首创。不过，无论是“接受”或“默契”，一个20年代信奉过文化国家主义的信徒，40年代讲出这番话来，意味着他思想认识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闻一多在文化认同这点上确定中国文化的地位，同时相信世界文化必趋一统，这是闻一多文化观的核心，也是对中国传统思维模式的挑战。他完全抛开了传统的诸如人和天认同，从而取得和谐协调的“天人合一”等说法，把各民族、各地方文化融合渗透的过程看作是一个矛盾统一的运动过程，这种融合绝不是简单的“合一”而是在不同文化的撞击中找到它的契合点。

关于“认同”，他当时用的是“同化”，这个术语的涵义与我们使用的“认同”概念完全一致。中国古代有东夷、西夏、南蛮、北狄等区分，民族很多，分布很广，其间还有几次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时代，但每次都不是“胡化”而是“汉化”，文化认同现象非常突出。而伴随“认同”的便是融合。这个观点说明了文化发展的一个规律——世界上多少文化都曾经因接触而交流而放出异彩，不愿意向别的民族学习没有不归于灭亡的。

根据闻一多的看法，中国文化周初便定型了。理由呢？他没有作具体的说明，这大概是因为在商周时代的生产发展情况下，天、帝、礼等观念以及人与人之间的行为模式，都已经形成了原始观念，礼已经被视为发展人和维持社会秩序的规范，社会定了型，文化也就定型了。其实所谓定型也是相对来讲的，中国文化首先是它的兼收并蓄的统一性然后才是区域性，即我们常说的中州文化、华夏文化、齐鲁文化、吴越文化等等。而且文化永远在变动之中，如汉以前有诸子百家，汉代则独尊儒术，汉和汉以后的文化也是有发展变化的。

闻一多的文化观是多元的文化观，他运用了人类社会学、民俗学、考古学以及弗洛伊德的学说等等对中国古代文化进行探源。收在全集甲集中的《伏羲考》和《龙凤》等文，绝不是单纯考证诠释的文章，而是有关人类起源和文化起源与流变的力作。他是对中国文化最原始的表现形态、中国文化生命里最基本的观念形态以及图腾文化开拓出来的精神领域和价值观念进行认真探索的学者，在文化史上的贡献甚巨。例如他从人首蛇身像谈到龙与图腾，他认为龙就是一种图腾（TOTEM）兼并了许多旁支的图腾而形成的一种综合虚构式的生物，这综合式的龙图腾团族所包括的单位，大概就是古代所谓夏以及至少与其同姓的若干夷狄。龙图腾团族以诸夏为基础，龙族的诸夏文化才是我们的本位文化。所以数千年来自称为华夏的历代帝王都说自己是龙的化身，而以龙为其符应。在《龙凤》一文中他还进一步指出，就最早的意义说，龙与凤代表我们古代民族中最基本的两个单元——夏民族与殷民族，龙和凤自然作为我们民族和文化的象征。直到现在，我们不是仍自称为龙的传人吗？

我们知道，中国本位文化是本地众多民族合力创造起来的，而不是外来的。这与罗马文化主要接受希腊文化，日本文化主要接受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有很大不同，与人本主义文化也有很大区别。中国古代本位文化，人是一种依附存在，缺乏自由意识，与人本主义是两回事。把这两者混淆了，就很难说清楚中国文化的原始精神和特质了。

闻一多的多元文化观在《复古的空气》一文中，有极为精辟的论述，他针对抗战时期突然刮起一阵复古阴风，首先提出这样的论点：我们的民族和文化之所以能存在到今天，不在于能保存古的，而是相反，在能吸收新的。并由此说开去，文化史上每一次放光都是受了外来影响，而不是因为死死抓住自己固有的东西。他不仅一开始就注意到中国文化的原始形态，本身的多种因素，多层次的结构所共有的主客性质，而且注意到如何继承传统，吐故纳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从文化的视角对复古的原因与动机所作的分析。他认为复古倾向有种种心态，主要有四种类型：一种是心理上的自卫机能，由于发现自己事事不如人，又抵挡不住外来压力，便不自觉地利用这种心理来补偿，于是自卫机能便发生作用。另一种是带有报复意味的自尊心理，这也是一种感到自己落后但又不能不忍辱负重的心态。还有一种是与其说是自尊，毋宁说是自卑的媚外心理，给外人一捧，自己茫然。再一种是以复古来掩饰自己对近代知识的无知首先为自己个人打算，这种复古当然要摒弃的，但第一种复古就无可厚非。闻一多并不完全从贬义上去理解“复古”，而是强调文化有惰性，愈古老的文化，惰性愈大，在历史重大转折关头，往往是一面现代呼声最高，一面复古的空气也最浓。明白了这点，才能掌握文化的价值取向，看得清优秀的文化传说是什么，被扭曲变形的东西又是什么。

一般来说，文化传统是指统一民族在历史实践中创造和积累的文明成果，包括典章制度、文学艺术、风俗习惯、民族心理、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等。在中西文化观照中闻一多特别注意下列几种文化现象。第一是儒墨道三派的产生和所起的作用。他在《什么是儒家》、《道教的精神》和《关于儒、道、土匪》三篇文章里从文化学的角度阐述了三派出现的历史背景和它们在文化史上的地位。毫无疑问，儒、墨、道三派在中国社会中有巨大影响，三派学说都有丰富内容。但这三派在不同历史时期都产生不同的影响。他认为我们几千年的文化以家族主义为中心，一切制度，祖先崇拜的信仰和以孝为核心的道德观念等都是从这里产生的。闻一多对儒家的评价前后略有变化，但一直坚持这样的观点：儒家思想既是奴隶制社会的产物，又是拥护奴隶社会的。他认为人类的发展如果必须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发展阶段的话，那么这一法则的意义就在于奴隶社会是历史必须经过的阶段，“它本身是社会进步成果，也是促进社会进步的因素”。“奴隶社会的发展促成了奴隶社会的崩毁”。这一论证符合历史发展事实，有不可辩驳的逻辑力量。接着来的问题是，既然维护奴隶社会的是儒家思想，为什么经过战国、秦代进入西汉以后却成为封建社会的主导思想呢？按照闻一多的说法，其奥妙是孔子思想经过董仲舒加以修正，以治家之道治天下，实现了所谓天下一家的思想。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要害就是以孝行为选举人才的标准，即普通说的以孝治天下。

当然，董仲舒的儒家不同于孔子儒家，董仲舒以后的儒家也不是董仲舒的儒家。最明显的是唐代儒家对“孝”作了一些修正，但其为儒家则一。

闻一多对儒家的看法是很独特的。他认为儒是寄食于贵族的知识分子，是当时社会机构中的缓冲阶层，以居间的方式缓和主奴之间的矛盾，他们提倡中庸之道，一方面，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一套伦理道德规范来维持现有秩序，一方面主张“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站在主奴中间息事宁人。所以儒家最忌矛盾的统一，矛盾统一了便没有主奴之分，缓冲阶层就没有存在的余地了。这种富有浓厚思辨色彩的议论，给人极大的启迪。特别是儒家所奉行的“中庸”之道，不管被解释得多么好听，他认为“中庸”决不是公平，“公平是从是非观点出发而中庸只是在利害上打算盘”。一语中的，对研究儒家学术中的形而上学的观念进行了有力的评击，把中庸的本质揭示得再清楚没有了。

对于墨家、道家，闻一多也都作了一些分析，在《道教的精神》一文中，他没有沿袭旧说把道家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杨朱、老子、庄子，而是从更高层次上审视自东汉以来一直流行着的、有卓越精深的老庄一派思想做理论根据的道教，强调要把宗教和哲学分开。道家出身于道教，它的全部思想是从灵魂不灭推衍出来的。但真正接近道教的宗教精神的是庄子，甚至以贵己重生为宗旨的道家各支派都可以说是从庄子推衍下来的。他开头对充满神秘思想的庄子思想十分赞赏，也推崇庄子汪洋恣肆的文章，但后来却扬弃了庄子。在《关于儒·道·土匪》一文中他不无嘲讽地对道家作了如下的描绘：一个儒家做几任“官”，捞得肥肥的，然后撇开腿跑到一所别墅或山庄里，变成一个什么居士，便是道家了。这篇文章是有针对性的，他有点近于借题发挥地鞭挞了所谓“身在魏阙，心在江湖”和“大隐隐朝市”一流的人物。打从孙中山建立中华民国开始，这类人物多着呢，抗战期间仆仆风尘，来往于重庆成都昆明桂林等大后方的名流就不少。然后他又回到正题，特别引述英国韦尔斯《人类的命运》中的一句话：“在大部分中国人的灵魂里，斗争着一个儒家，一个道家，一个土匪。”他不完全同意韦尔斯的说法，因为韦尔斯叫儒家、道家和土匪站作一排，将理论和行为混为一谈，毕竟是犯了混淆范畴的逻辑错误，但他认为如果把“儒家，道家，土匪”改为“偷儿，骗子，土匪”不但没有损害韦尔斯的原意，说不定还可以使那些比韦氏更熟悉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人，感到更顺理成章。偷儿是巧取；土匪是豪夺，是明摆出来的；而道家的无为无不为，即无所不为，无所不取，无所不夺，看上去又象一无所取，一无所夺。因此“讲起穷凶极恶的程度来，土匪不如偷儿，偷儿不如骗子，那便是说墨不如儒，儒不如道”。郭沫若认为这是对道家很痛快的清算。现在看来，文章对儒、墨、道的论述不够全面，也有点偏激，但对本民族的心理结构和思维模式却作了准确而生动的勾勒，为研究中国文化史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材料。

第二是他比较注意诗歌的社会功能。在这个问题上最值得重视的是他提出中国、印度、以色列和希腊四个古老民族文化猛进的开端都表现在文学上的观点。中国的诗三百篇中大部分的周颂和大雅，印度的《黎俱吠陀》，《旧约》里最早的希伯来诗篇，希腊的《伊



利亚特》和《奥德赛》都差不多同时产生。中国文化大体上从三百篇产生这一时期就定型了，诗始终是中国文学的正统类型。他在《文学的历史动向》一文里把诗的社会功能，提到很高的地位，说它一出世“就是宗教，是政治，是教育，是社交，它是全面的生活。”甚至他还说：“维系封建精神的是礼乐，阐发礼乐意义的是诗，所以诗支持了那整个封建时代的文化。”

闻一多不单注意到四个文化的开端都表现在文学上的共同现象，而且从文化的视角评论文学，这在当时来说，不论观念或方法都可以说是全新的。我们现在不是提倡在文学研究中建立文化的审视点吗？闻一多在这里开了个先例。他对诗经、楚辞、乐府、唐诗差不多全用上了这个方法，道人之所未道，这是他的一大贡献。

第三是他认为四个文明古国中，唯独中国对外来文化的心态是勇于“予”而不太怯于“受”的。其它三个都勇于“予”而怯于“受”。他联系四个文明古国的文化兴衰阐明了大家都关心的一个问题：除中国外，三个文化都转了手。有的转给近亲，有的转给了外人，主人自己却都没落了。从这里出发，他断言，为文化自己的主人打算，“取”比“予”还重要。这个论点，有很多历史事例可以左证，唐代派玄奘往西方取经就是一例。本来，“予”和“受”是对立的但又是可以统一的。闻一多从心态上进行研究，对他的文化认同融合说增添了具有说服力的内涵，很值得重视。

第四，在中西文化观照中，他特别注意到宗教问题，写了《从宗教论中西风格》一文，独抒己见。中国没有宗教，这是许多学者都承认的，宗教，特别是佛教对中国的影响也有目共睹。不过，佛教却是外来的。这里与文化无关的话不谈，我只想强调两点：一是闻一多认为宗教本身尽管有数不完的缺憾和流弊，产生宗教的动机无疑是正确的。为什么呢？因为宗教的产生必须建立在灵魂不灭的观念上，宗教崇拜的对象必须是一个至高无上的神圣的万能而慈爱的神，你对他只有无条件的皈依和虔诚的祈祷。而这些，中国人都都不具备，所以从狭义上来讲中国人没有宗教，而西洋却处处是一个上帝的国度。如果从宗教论中西风格，那是完全不同的。二是闻一多并没有把有无宗教作为衡量文化高低的准则。他十分重视佛教和基督教的输入对中国文化的巨大影响，在文学方面来说，如果不是佛教、基督教的输入就不会出现宋元以后小说戏剧如此繁荣的局面。中国本土不是没有讲故事与歌舞剧的雏形，但它们的形态不完备，佛经的翻译由后汉至盛唐，风靡一时，译者力求切合经典原意，多以散文与韵文杂用而构成一种新文体，饶有朴实平易通俗易懂的白话文学的风格。佛经想象力丰富，情节性强，且寓有因果报应、人生虚幻无常等思想，佛经对中国小说戏剧的这种影响，不限于艺术形式而且涉及生活态度、价值观念、民族心理结构和审美趣味等等文化问题。

当然，《从宗教论中西风格》不是没有缺陷的，他只是从宗教的问题上打入一个楔子，对“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掩盖下的如自私自利、偷偷摸摸的一切丑态进行严厉的批判，有的放矢。但由于说理不够充分，使人感到有点走上了“极端”。然而主旨还是激励向上追求，永不屈服的意识。闻一多自己就是从旧的思想中解脱出来获得人民意识

的，明白了这一点就不难了解，为什么他称赞屈原是人民诗人，田间是时代的鼓手。他从二元的文化观出发，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对家族主义、民族主义以及如何对待外来文化和传统等一系列敏感的问题，都作出了反应。他深信民族主义是我们复兴的根本，但民族主义不该是文化的闭关主义。他提出为文化自身的主人打算，“取”比“予”还重要的观点，正表明他已经实现了对民族文化自卫心理的超越，热情地呼唤新的文化的诞生。这不禁使人想起闻一多先生1943年给臧克家信中的话：“经过十余年故纸堆中的生活，我有了把握，看清了我们这民族，这文化的病症，我敢于开方了。”但是，这回开的药方，倒不是他自己说的一部“诗的史”或一首“史的诗”，而是对中国文化彻底的反思，他的历史课题伸到历史以前，他的文化课题超出了文化圈外。

\*原名《The Fate of man》作者为H.G. Wells。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

责任编辑：陶原珂

※

※

※

## 首届“知识分子问题学术讨论会”八月间将在北戴河举行

知识分子问题是关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重要课题，为了交流和推动这一课题的讨论，新知学园、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理论部和上海世界经济导报拟于今年八月间在北戴河联合召开我国第一次“知识分子问题学术讨论会”，主要议题：1. 知识分子研究的理论和方法；2. 我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和现状，特别是改革以来的面貌和诸方面的问题。

## 亚洲“四小龙”经济起飞的教育背景

在资金紧缺时舍得花钱

在经济市场化条件下坚持教育的计划性

在义务教育基础上注重职业技术教育

60年代中期以来，亚洲的新加坡、香港、南朝鲜和台湾，经济均以世界少有的高速持续增长，从贫穷落后的状态迅速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成为举世瞩目的“四小龙”。“四小龙”经济起飞的奥秘，其中不仅有独特的经济地理环境和良好的机遇等原因，而且有着不容忽视的教育背景。

### 一、在教育问题上眼光长远，舍得花钱

发展教育事业是要耗费大量投资的，而且这种投资不象直接对经济部门的投资那样可以在较短的周期中见到成效。这就使有些决策者在发展经济上很舍得下本钱，而在教育上却总舍不得大量投资。这是教育问题上的近视。实际上，现代教育的主要功能，正是通过提高人的素质，达到发展生产力的目的的。教育对经济的推动作用，是巨大而持久的。没有教育的发展作为背景，经济的发展是不可能持久的。“四小龙”的决策者以至企业界和民间，都能较好地认识到这一点，因此在教育上有远大的眼光，舍得花大钱来发展教育事业。事实证明，正是由于他们教育事

业的发展，使劳动者素质普遍得以提高，有了大批掌握现代高科技、具有现代管理知识的人才，才使他们得以适应世界政治经济环境变化的有利时机而迅速崛起。

在去年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举行的一次讨论会上，一位南朝鲜前“总理”在分析南朝鲜成功的因素时，把“高度的教育热情”列为重要的一条。的确，南朝鲜所以能从一个资源贫乏、人口稠密的传统农业地区迅速变为新兴工业地区，在二三十年间从国民产值人均83美元（1961年）猛增到2850美元（1987年），是和他们高度重视发展教育事业，把培养人才作为一项重要国策分不开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南朝鲜人口有80%是文盲，劳动力素质极低。南朝鲜当局明智地把提高国民的科学文化知识作为发展经济的基础，从50年代开始就下决心花大力气抓好国民教育，教育经费一直占财政支出的15~20%，并通过增加税收、借贷、鼓励地方和私人办学等方法来补充政府投资的不足。到了1960年，南朝鲜小学数量已比战后初期增加2.65倍，中学增加近2倍，而

大学竟增加近13倍。在经济持续发展的70、80年代，南朝鲜的教育热情持续高涨。据统计，1965~1974年，教育经费每年平均递增28%；1978~1979年更增加73.2%，使其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值高达5.54%。目前，南朝鲜适龄儿童入学率达98%以上，高中毕业生升学率接近50%，在校大学生超过100万；政府中80%左右的阁员在国外留过学；各大企业的各级管理人员中，有90%以上的人具有大学以上的学历。南朝鲜发展教育的成效可见一斑。

新加坡在舍得花钱办教育方面在世界上也是名列前茅的，其教育经费与国防开支时常不相伯仲。1959~1967年教育经费开支平均占国家财政开支的23.4%。1960~1982年，新加坡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12.9倍，而教育经费却增长了15.5倍。与此类似，香港在60、70年代生产总值年均递增约18.7%，而教育总支出则以21.8%递增。1975年全港生均教育支出1500港元，10年后已增至8400港元（1981年世界平均962美元，中国大陆为55.6人民币）；1986年教育投资是10年前的5.2倍。台湾的教育支出，也占财政支出的15~20%。

## 二、在教育上协调市场和计划两种机制

“四小龙”虽然都实行市场经济，但他们在教育上都表现出较强的计划性，善于协调好市场机制和计划机制两者的关系。在人才培养上既适应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又考虑到长远的利益；既引进竞争机制，又加强了立法。主要表现在：

1. 加强人才需求预测，以确定人才培养的专业、层次、数量。

新加坡在60年代后期，根据经济增长的速度，预测社会对各层次、各专业人才的需求情况，提出加强高中和大学的职业技术和商业教育；70年代中期，贸工部制订了“十年人力发展计划”。到了70年代后期，新加坡开始实施经济升级计划，对受高等教育的人才需求剧增，国家就通过包括总理国庆文告和大学公开信等在内的各种形式引导学生到人才较缺乏、就业前景好的法律、工程专业学习。此外，国家还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下达各系科招生名额，确定本科生与研究生的比例，并把部分奖学金固定到急需发展的学科上去。由于重视人才预测，精心计划并采取相应措施，新加坡教育在发展速度、规模和科类、层次上，都比较密切联系经济发展实际，没有出现大起大落的失控现象，也未出现发展中国家屡见不鲜的高等教育中本专科比例倒挂的现象。香港政府从1965年开始，每两年进行1次就业人员状况的调查，以指导教育的发展方向。

2. 根据实际情况，分清先后缓急。

南朝鲜在发展教育中，注意防止无计划无目标地一哄而上，而是结合实际，分清先后缓急，在不同阶段有侧重地发展某一方面。如在50年代，以扫除文盲，普遍提高国民文化水平为主，1950年就实施六年义务教育；60、70年代，针对经济建设急需应用型人才而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进入80年代，基础理论的欠缺成了经济持续发展的薄弱环节，他们就重视基础理论人才的培养，加强“英才教育”。

3. 重视宏观管理和检讨总结。

香港政府为指导教育发展，先后成立了教育委员会、教育统筹委员会、大学及

理工资助委员会、职业训练局等官方、半官方机构，制订教育政策，提出发展目标，对各级教育进行宏观管理。当局还十分重视对教育政策实施情况的检讨总结。如1980年组织了“专上及工业教育检讨委员会”，次年发表了《香港教育制度全面检讨》报告书，1981年聘请国际顾问团到港进行全面考察，次年发表了《香港教育透视——国际顾问团报告书》。这些报告书对香港教育都产生重大影响。

#### 4. 重视教育立法。

“四小龙”重视运用法律手段确立教育的地位，如台湾在1968年实行九年义务教育，经一个周期之后，检讨得失，于1979年正式为九年义务教育立法。《国民教育法》规定“凡6岁至15岁的国民，应接受国民教育；已逾龄未受国民教育之国民，应接受国民补习教育”，1982年又颁布《国民教育法实施细则》等法规。最近，台湾当局又准备对1948年制订、经过1972年及1982年两次修订的《大学法》进行修订。南朝鲜1948年颁布了义务教育法，1966年又颁布了教育法。香港、新加坡也都制订了许多有关教育的法规，从而保证了教育的地位、经费和发展计划实施。

#### 三、注重应用性，重视职业技术教育

“四小龙”在经济地理上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地域狭小、资源匮乏、人口密度大，可以说只有“人力资源”是丰富的。但是当世界经济逐步向高科技、现代化转变的时候，如果没有大量高水平的工程技术人员、商业经济人才，没有大批具有现代工艺技术的熟练工人和谙熟现代生产工艺和管理方法的管理人才，单凭低素质的廉价劳动力，便将失去其竞争优势。

因此，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使自己在激烈的国际经济竞争中取胜，就必须大力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推动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转化，使人力资源成为竞争中的真正优势。而要迅速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最有效、最快捷的途径就是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四小龙”正是这样做的。他们从60年代中期开始，就十分注重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培养出大量素质较高、适应性较强的各种层次的应用型人才，从而抓住了国际经济格局变化的机遇，为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打下良好的基础。这种做法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香港和新加坡的职业技术教育是非常突出的。香港在1970年以后，陆续创办了8所负责培养中等技术人员的工业学院和两所培养高等技术管理人才的理工学院。目前8所工业学院有各类在校生65000人，两所理工学院有各类在校生3万余人。此外，一些私立的、政府资助或认可的专上学院，也大多属职业教育范畴。高中职业教育也受到重视，全港有22所官办和资助的工业中学和15所职业先修学校，从而形成从职业高中到专上的整个职业技术教育体系。值得一提的是香港各类成人教育规模很大，各高校和工业学院成人教育部分远远超过全日制学生人数。灵活多样的成人教育为在职人员提供众多的深造途径。新加坡在1969年对整个教育体制进行调整改革，提出了向工艺教育进军的口号，并成立了工业与职业训练局，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地发展技术职业教育，以满足国家工业化的需求。两所高等职业教育的机构——新加坡工艺学院和义安工艺学院10年



间(1970~1980)分别扩大1倍和4倍。新加坡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从70年代的每年平均8%,提高到80年代初的5%左右,职业技术教育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

在高等院校科研方向上,“四小龙”也注意以应用开发研究为主,建立起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基地和工业园区,如台湾的新竹工业园区、新加坡国立大学周围的科学园区和南朝鲜的京畿等地。以大学教授、讲师为主的高级知识分子,组成各种“智囊团”式的委员会,积极参与包括政策决策、技术决策等的参政议政和咨询活动,也是教育直接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的一种做法。

从“四小龙”的经验看,职业技术教育是极富生命力的。

#### 四、结语

“四小龙”在发展教育上,还有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如重视思想教育、大力发展民间办学、教育的多元化和国际化等等。毋庸讳言,“四小龙”在教育问题上也有许多难题,其中不少是与其政治制度有关的。另一方面,“四小龙”虽然都具有与我们相似的文化、民族背景,我们现在又处于一个与他们经济起飞时相类似的环境,但他们的许多东西,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地理环境等等,和我们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因此,在借鉴“四小龙”发展教育的经验时,我们当然不能照搬。

作者单位:省高教研究室

责任编辑:刘斯翰

※

※

※

### 广东钱币学会首次举行钱币鉴赏交流咨询活动

为了提高会员的钱币知识和水平,中国钱币学会广东分会于1988年6月23日上午在广州首次举行钱币鉴赏交流咨询活动,在穗部分学会领导、专家学者、实际工作者以及钱币收藏爱好者共30余人参加了活动。不少人带来了中外古钱、现钞、硬币和纸币供鉴赏、交流及鉴定。参加者还就如何开展钱币学研究发表了意见,一致认为当务之急是组织力量整理古籍资料和抢救活材料。

(林有能)

## 近代广东开放与粤人文化心理

从历史过程看，近代粤人对西方文化经历了敌对——顺应——择善而取三个阶段；从接受层次看，经历了物质文化——制度文化——思想观念的递进过程。事实表明，除少数知识分子外，粤人对西方文化在心理上始终未达到全面开放，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心态在较开放的广东亦同样是十分稳固的。

近代中国的开放对于清王朝这样一个处于封闭状态的封建专制国家而言，是痛苦、被迫的一步，也是一段漫长的艰难历程。它冲击着国人封闭型的传统文化心理，从而在封闭走向开放过程中重塑新的、健康的文化心理。由于广东地处近代开放的前沿，所受冲击尤为强烈，因而粤人的文化心理变化也就较为明显。

### (一)

自唐宋以来，广州一直是我国一个重要的对外贸易通商口岸，即使是明清海禁时期，广州仍保留着“一口通商”的特殊地位。可以说，广东对外联系基本上没有中断过，不能算是对外部世界完全封闭隔绝的地区。这一特殊条件，使属于中华文化大系统中的岭南文化表现出明显的地方特色。一方面，唐宋以来，广东就已是一个人口流动性较大的地区，在这块“流放地”、“迁移区”，社会人口的组成经常保持着一种“动态”结构，从而有别于积缓滞重的北方内地。而这种“动态”结构，久而久之便赋予了粤人以“流人精神”、“充军意识”——不满现状、勇于抗争、敢冒险竞争。另一方面，鸦片战争前，由于保持着通商口岸的地位，与外界通商成了广东人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外部世界对他们来说并不陌生。因而，粤人与外界交往的意识也较强，他们在通商和移民过程中，频繁地与外人接触，与文化背景不同的外国人基本上能够相处而安。有位鸦片战争前

在广州居住过的外国人回忆说：在这里（指广州），由于生活方式的新奇；由于彼此间和好的社会感情，与无限友谊的存在；由于被指定同我们作买卖的中国人交易的顺利和他们的忠实；由于个人与财产安全的感觉；每一个在广州居住的外人，当他离开广州时，无不十分惋惜。①欧美商人也以广州为他们在华的主要落脚点，引进了部分西方文化，如1827年在广州创办英文报纸《广东纪录》，1833年创办中文期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1834年美国医生伯驾来广州创办博济医院，传播西医，等等，从而使广州较早接触西方近代科学。

但是，鸦片战争前这种所谓的“开放”却是畸型、扭曲的，它只不过是封建统治者自我陶醉、昧于外情、视外界如无物，而君临天下、赐福蛮夷的“壮举”。这是统治阶级自以为是的“帝国文化”优越感的产物。这只能造成讲求“夷夏之别”的社会氛围，并非真正意义的开放。所以，外来文化虽有传入，但其影响甚微，根本谈不上有什么冲击。

### (二)

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清政府由“主动开放”转为“被动开放”。这一转变，带来的再也不是外国的点滴东西，而是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军事侵略、经济掠夺、文化渗透。所有这些，广东均又首当其冲。于是，一幅与前完全不同的

灰暗画面摆在粤人面前：外国领事馆立于沙面租界，外国舰艇游弋于珠江江面，外国教堂、教会学校、医院散落于广东城乡，洋人趾高气扬，中华帝国的威风扫地。粤人的文化优越感受到了猛烈的冲击，传统文化心理慢慢地发生了变化。这一变化的轨迹基本上是：对外来异质文化先是敌对，再是顺应，最后是择善者取。

粤人因旧的秩序被打破而失去了心理稳定，接着再恢复心理平衡，让心态趋向正常。这是一个痛苦、缓慢的过程。开关之初，在部分上层“民众”——士绅们的领导下，下层民众表示出了对外国军事侵略的反抗，如三元里抗英，反割广州城河南地，反外国人入广州城、潮州城，等等。这是基于民族自尊心、反抗外来侵略的正义举动。但显然，这种反抗并不能改变战争失败、签约丧权这一客观现实，于是，接着便是容忍、顺从，与“夷人”相处。但是，粤人之“夷夏之别”，及派生而来的敌对、抵触、排外心理却因外国人在粤的横行而积怨更深。一位外国人写道：“广州的暴民是中国最有复仇心的。他们有长久的记忆来滋养他们的仇恨。……在本世纪里，这个城市曾经被英国兵进入并统治过。广州城内和四周有许多痛恨政府的人，首先恨它太无能或者太不可靠，不能把象海怪似的从洋上来的外国人再驱逐到海里去”。<sup>②</sup>这种敌对情绪，至20世纪初依然存在。

相较而言，对侵略者的仇视，并没有导致粤人对整个近代西方文化的敌视。他们把外国的“人”与“物”分开，大胆引进了西方文化的部分东西，这种引进也是逐渐由表层至深层。

“外国文明输入中国，以广东为始”。鸦片战争后，广东成了西方文化传入中国的重要通道。而粤人原已具有唯变维新精神和创造心理。这样，他们较早接受和吸收了西方文化的内容，使近代广东文化呈现出多姿多彩：新式机器、近代化工业生产较早在广东出现；西式教育也较早引入广东，冲击了传统的经学教育；粤人办报馆、开学堂早于他省，逐渐形成了有近代色彩的社会信息传播系统；粤人黄遵宪、丘逢甲、吴趼人、苏曼殊、黄小配等在近代文化界倡导，造成了“诗界革命”、“文体革命”、“小说革命”；陈树人、高剑父等粤籍画家形成了岭南画派；广东音乐也自成一家，粤剧、潮剧、汉剧等广东地方剧种也形成流派；推至清末，康有为、梁启

超等维新派提出在中国建立英日式的君主立宪制度并为此进行了失败的尝试，孙中山等民主革命派通过实践在中国创立了民主共和制度，并相应形成了幼稚、初级的制度文化，为近代中国开辟了一个新的局面。

在宗教信仰方面，粤人本信崇儒、道、佛。随着鸦片战争后西方基督教士的大批涌入，一部分广东民众信从基督教。然而，从总体上看，不管信奉哪种宗教，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其入教的目的，与其说是基于宗教信仰不如说是基于现实世界中的生活观念，更多是与讲求实惠的务实文化心理相维系。所以，“反教”斗争在广东虽时有发生，但却不是十分激烈，规模也较小，比内地北方大规模的反教狂潮远为逊色，如义和团运动时广东的反应就较为冷淡。这与粤人对西方文化具有较大承受力、较为宽容的文化心理不无关系。

### （三）

多少是由于开放的缘故，近代广东的社会结构产生了较大的变化，近代广东人形成了3种重要的社会群体：商人、华侨（包括留学生）、先进思想家。

1. 在鸦片战争后“开放”的条件下，与外国人通商做生意成了一种公开性的合法事业。由于广东“通商最早，风气最开，其能通外事知外情者，所在向有”。通洋务、懂“夷语”的广东人占有熟悉外界事务之便，善于经商、讲求实效的广东商人在与外商做生意方面捷足先登，构成了中国商人中最活跃的群体之一。在洋行买办中多有广东人，他们最先充当了与洋人通商的居间人。这些广东籍买办中有些积蓄力量，最后脱离洋商，自办实业，成了近代中国工商业界的活跃人物，如唐廷枢、徐润等人。

开放，给广东的商业带来了相应的繁荣，进一步加重了粤人重商的传统心理。在粤商心目中，并不以结纳洋人、与洋人交往为耻，义利之别、夷夏之防的观点日趋淡薄，这是近代粤人文化心理变化的重要表现。重利的商业文化传统与被迫开放后，与洋人通商的现实相符，大大地有助于广东重商传统的高扬。另一方面，他们与洋人通商中，又逐渐萌生和发展了竞争的意识以及爱国主义思想。粤商较早有意识地集聚起来，保护自己的利益，清末他们在广州组织起粤商自治

会，在商业较为发达的地区如汕头组织起了商会。正是粤人率先发出了与洋人实行“商战”的呐喊，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传诵一时；1905年反美拒约斗争，广东商人积极参加、不落人后；20年代省港大罢工，粤商也予以大力支持。

2. 远离家园，背井离乡，客死他乡，对小农们来说，本是艰难痛苦的事情。而粤人却常具“流人意识”、迁移传统。在近代被迫开放后，广东农村自然经济不断地瓦解，失地农民日益增多的条件下，他们并不死守破落的家园，而是纷纷涌向海外以谋出路。于是，移民——华侨，成了粤人文化心理变化较为明显的另一个群体。

华侨多少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部分接受了西方先进生产方式，在所在国办公司设工厂；回到国内，引进外国科学技术、管理经验——生产方式乃至思想文化。南海侨商陈启源在广东率先引进了西方机器生产技术体系。华侨投资兴建潮汕铁路、新宁铁路。机器、火车等物质文明给人们带来的不仅仅是交通便捷、经济发展，同时也必然引起人们时空观念的变化，重新认识世界。华侨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中介人。

华侨在居留国保留传统中国文化——其语言习俗、思维模式、地域意识、宗乡感情依然存在。

3. 中国人是最先在广东开眼看世界的。鸦片战争失败，签订“和约”，割地、通商、赔款，所有这些，冲击了士子们的文化优越感。他们不得不睁眼看世界，了解打败自己的敌人。粤人得开风气之先，走在全国前面，积极了解外部世界。但在近代初期，粤籍士子们并未未来得及对本国文化传统作深刻的自省。只有在稍后的向西方学习浪潮中出现的粤籍先进思想家才开始从事这项艰巨的工作。

由于受开放的影响，近代广东出现了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先进思想家，如洪仁环、容闳、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人。他们是多少接受了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本身与外部世界有过不同程度的亲身接触。开放给他们带来了一个全新的外部世界，对他们的深层文化心理以剧烈的冲击。他们耳濡目染西方文化，接受了外来的思想观念，逐渐改变了原来传统文化结构。19世纪70年代，由官派留美学生120名中，70%是广东人。带领他们前往的广东香山人容闳较早喊出了“借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造东方文化，必可使老大帝国，一变为少年新中国”的呼声，他所

带去的留学生由于亲身经历过西方教育和生活，“以故人人咸谓东西文化，判若天渊，而于中国根本上之改革，以为不容稍缓之事”。<sup>③</sup>1878年，孙中山第一次到海外去，大大打开了眼界，深受启迪，据他后来自述：“始见轮船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sup>④</sup>很难想象，如果不出国并接受西方教育，孙中山能否成为一代伟人。既承继了中国知识分子关心国家前途的传统心态，又在开放的冲击下，深感自身文化传统存有种种弊病，转而接受外来文化。两者结合，赋予他们在中国建立新文化体系的精神。因此，他们已不同于或改变了粤人对西方的人与物（文化）先是敌对、抵触，再是容忍、顺从的心理变化过程，而是能自觉去对比中西文化，分别优劣，择善去恶。他们所提出的向西方学习的层次也逐渐由表及里，以至提倡或实践在本国引进、建立西方制度文化，同时改造本国文化传统、改造中国的国民性。在20世纪初内忧外患交织之时，梁启超大倡“新民”说；孙中山提出“知难行易”说，倡导“心理改造”。这些实实在在是在向传统文化的惰性挑战。

上述3个群体的文化心理表现，基本说明了近代广东人在开放条件下由表及里的心理圈，也显示了近代粤人由低层次向高层次发展的正常心理过程。

#### （四）

近代中国的被迫开放、外来的冲击并没能导致整个中国自然经济的农业文化构架的解体，未能导致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惰性的彻底改造，相反，在某些方面，这种文化惰性得到了来自西方劣质文化的补充而加固了本身的抵抗力，对抗来自西方文化的冲击。这一点，在广东同样是较为突出的。

广东未曾有过全面的开放，既未完全转换社会体制结构，更未很好地彻底改造传统文化心理结构。开放是有限的，而冲击也是有限的，加以近代以来，广东的政治环境极不安定，无暇顾及改造国民性。粤人文化心理中所存在着的因循保守、忿争、心胸狭隘、习奢等惰性并没得到改造。土客相争、宗族械斗不绝于近代广东农村，愚昧、迷信笼罩着下层民众，赌博之风盛极广东城乡。开放与封闭、进取与保守同在；大部分人的浑浑噩噩与少数仁人志士的趋前、超前意识并

存。相当一部分民众表现出对旧秩序的顺从、对列强的容忍，只有小部分民众参与反抗封建统治、爱国御侮的斗争、革命。

急功近利的商人心理操纵着广东的发展，也约束着广东的发展。大部分向往发财的小市民与喜好炫耀财富的商人，成了广东城镇非官社会的主要构成者。这种文化心理的消极面严重影响了近代广东社会的全面发展：

其一、已经有研究者注意到了近代广东人才辈出的历史现象。但不能忽视的是：近代广东人才长于粤，而多“用之于外”。很多粤籍人才多在外省特别是江浙上海一带，或港澳、海外施展才干，真正一生以广东为其政治舞台演出“全剧”者不多。其原因除广东偏于岭南一隅，施展才干场地窄小外，广东的重商传统影响到许多人政治才干的发挥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其二、重商的文化传统也限制了文化教育的发展。本来经济发展能为文化教育的发展提供物质基础。然而，近代广东财税仅次于江苏，居全国第二位。30年代的统计数字表明，广东教育经费支出也仅次江苏列全国第二位，但近代广东的文化教育水平不及河南、直隶，更难与江苏“媲美”。这种经济发展与文化教育落后的现象，除了政治环境的不安定外，主要的是因整个广东的重商轻文、弃儒从贾的传统心理所致。

其三、有着悠久海外贸易历史的广州，一直

是中外贸易市场中心，然而，鸦片战争后不久，这一地位被上海夺走，而且，后来的经济发展速度显然不及新兴的上海、天津、汉口等地。其原因除广州偏处岭南一隅、交通不发达、资源缺乏、没有近代大工业等之外，显然，还应注意到粤人急功近利、过于讲求实际、追求奢华及由此而来的重商轻视教育、轻视学术，导致了文化教育的落后；广东多数人文化素养不高而严重影响到了广东进一步发展、开放的速度等等这些文化心理消极面带来的影响。

囿于中国传统文化惰性，局促于岭南一隅的广东，虽是开放较早但却没能带来人的文化心理的全面开放，未能形成整个地区真正开放的氛围，确立起开放的机制，因而整个地区的发展还是踟蹰而行。这种情况尤引人深思。

① 《鸦片战争》（资料丛刊）（一），第251页。

② 《中法战争》（资料丛刊）（五），第15页。

③ 容闳：《西学东渐记》。

④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47页。

⑤ 《戊戌变法》（资料丛刊）（四），第115页。

⑥ 区架甲：《新广东》，《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一卷。

作者单位：广东省社科院

责任编辑：林有能

## 更正

今年第二期封2照片说明中“迟柯”应为“迟轲”，“广东美术学会会长”应为“广东美学学会会长”。特此更正，并向迟轲同志及读者致歉！



## 清初迁海时期澳门考略

(1661—1683)

清初，统治集团为了扑灭在台湾的郑氏势力，决定在东南沿海5省实行迁徙政策。广东经康熙元年（1662）和三年（1664）两次大迁徙，从饶平县的分水关至钦州的防城沿海一带，几乎成了无人居住的禁区，惟独澳门例外。以往论及迁徙问题的论著不少，但奇怪的是，在这些论著中却很少论及澳门问题，或往往“点到即止”。因而，清初朝廷对澳门的基本政策，迁徙时期澳门采取的措施，这个时期澳门贸易状况等等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 一、清初对澳门葡萄牙人的态度和政策

要了解清初对澳门葡萄牙人的态度和政策，必须对明朝在澳门实施的策略和措施，作一个简单的回顾。

明朝嘉靖年间（1522—1566），葡萄牙人始在澳门立足，到了嘉靖末年，他们的势力有了发展，不仅从事欧洲、印度、东南亚、日本和中国之间的转口贸易，而且还“凌轹居民，蔑视澳官”。这就引起了地方和朝廷的忧虑，朝中曾有大臣设想各种驱逐葡萄牙人的方案，但始终没有成事。既然驱之不去，又不能养成大患，明朝最后只好实行“约束”和“防范”的权宜

措施。

首先是控制其活动范围。万历二年（1574），在澳门北面的莲花茎设闸，“官司启闭”，把葡萄牙人的活动范围控制在莲花茎以南的半岛上。<sup>①</sup>万历四十二年（1614）又“设参将于中路，雍陌营调千人戍之”。<sup>②</sup>天启元年（1621），把参将改设于距离莲花茎闸仅15里的前山寨，统领水陆兵，分戍海陆。自此“防制渐密，终明之世无他虞”。<sup>③</sup>

其次是制约其行政、司法、课税等方面的活动。虽然从万历三十六年（1577）开始，澳门的葡萄牙人逐步建立起一套地方的管理机构，其中包括行政、司法、税务、宗教等方面，甚至还设有炮台，驻有军队，但他们在澳门的一切活动，均受明朝的严格制约。如万历三十二年（1608），香山知县蔡善继条议制夷十则，并亲自到澳门处理犯案的葡萄牙人头目。<sup>④</sup>万历四十二年（1614），海道副使俞安性“条具五事，勒石永禁”，进一步给居住在澳门的葡萄牙人订下严厉的法规条文，内容从禁蓄倭奴、人口买卖到船舶修理、税收问题，以至房屋的重建等都包括在内。<sup>⑤</sup>

清朝建国初年，基本上沿袭明朝的体制和政策，对澳门的葡萄牙人也同样采取

“约束”和“防范”。史载：“皇上又申命疆臣，严行约束，即于澳夷，亦每事防范，诚以地方安危，击乎市易，而市易利害在于夷商，杜渐防微之道，固不可不详且慎也。”<sup>⑥</sup>在这个原则之下，顺治一朝对澳门实施的有两项较为重大的措施：

其一是调整了前山寨的兵力布署。“顺治四年，设前山寨官兵五百名，参将领之如故。两王入粤，增设至一千名，辖左右营，千总二、把总四。”<sup>⑦</sup>顺治八年（1651）以前的广东，仍处在明清两朝的交替动荡之中，所以顺治四年在前山寨设的兵力，较明朝略少。到平南敬亲王尚可喜和靖南王耿继茂进驻广东时，防守的兵力才基本上恢复到明朝的水平。

其二是顺治四年，两广总督佟养甲请求朝廷恢复明朝崇祯十三年（1640）以前，准许广东商人到澳门贸易，但仍禁葡萄牙人到广州从事商业活动的政策。<sup>⑧</sup>佟氏所以提出这个建议，很可能是他考虑到当时广东的进出口贸易，占了民生很重要的一部分，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试图“通商俗国”。<sup>⑨</sup>

在研究清初澳门问题的时候，我们发现有些外国学者似乎在刻意寻找根据，证明清初朝廷与澳门葡萄牙人如何修好。如傑瑟斯（M·de·Jesus）说顺治七年（1650）清军围攻明朝最后一个据点广州，得葡人相助，因而与葡人修好，“免其徒增烦累之年税”。<sup>⑩</sup>琼格斯特（Liungstedt）说：顺治八年清朝因葡萄牙人承认其主权，免地租三年。<sup>⑪</sup>这些说法似根据不足。

查顺治七年攻广州城的是尚可喜（1604—1676）的部队，而纪录这场战争

较详细的著作是《元功垂范》，但该书根本没有提及葡萄牙人参加或提供武器协助攻城的记载，其他有关文献，也没有类似的纪录。所以，傑瑟斯之说值得怀疑。

清初，中国封建王朝的统治者仍以天朝自居，外国来贸易的称为“朝贡”，使臣来探访的称为“朝见”、“谒见”，根本不存在需要别国承认其主权的概念。所以，琼格斯特之说在历史逻辑上说不通，恐怕是他把现代人的观念，强加在清朝统治者的身上了。

我们认为，清初对澳门葡萄牙人的态度和政策基本上没有改变，且不说没有免其地租，就是准许恢复广东商人到澳门贸易这一政策，后来也受到时人的非议：“佟养甲援明之旧，代佛朗机请示通市，其意原欲广圣招徕之仁，昭覆载之量，而岂知卧榻之侧，他人原未可鼾睡哉。”<sup>⑫</sup>清朝的官员，尤其是身处其侧的广东的地方官员，对于居住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始终没有忘记他们早年在中国东南沿海海盗式的贸易形象。尽管在明末清初，他们没有挑起什么严重的事端，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一般来说，清朝的官员，并没有与葡萄牙人修好的想法，而是感到“筑城形势固，全粤有馀忧”，“一日蕃商据，千年汉将劳”，<sup>⑬</sup>“约束”和“防范”是绝对不能放弃的。

## 二、关于澳门迁徙问题

香山县的第一次迁徙是在康熙元年（1662）的春天，其地段是：黄梁都、沙尾、北山、奇独澳、黄旗角、潭洲。<sup>⑭</sup>康熙三年（1664），香山县再一次迁徙，包括：龙眼都、小榄、古镇、黄围。<sup>⑮</sup>当时的澳门仍属香山县治，很显然，清初两次

迁徙，澳门都幸免了。

关于澳门免于迁徙一事，部分西方学者把它归于汤若望的功劳。德国人魏特（Alfons Vath S.J.）在《汤若望传》中说，1662年，中国人从澳门中迁出去，而当时的清朝官员也要葡萄牙人迁离澳门，这件事经神父刘迪我（P. Le Fevre）到北京活动近一年，托汤若望多方活动，得一“皇帝谕旨”，才免于迁徙。<sup>⑥</sup>

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研究：（1）康熙元年华人是否迁出澳门；（2）澳门葡萄牙人免迁的原因。

首先，我们认为在康熙元年华人并没有迁出澳门。其根据有三：

第一，乾隆初年的香山知县张甄陶曾谈及迁徙之事：“垣以内则澳夷之居，华人杂入其中，赁屋营生，租既归夷，又日滋寡。从前有迁民出澳之语，详版虽在，託之空言。”<sup>⑦</sup>这段文字清楚表明，虽曾有迁华人出澳的计划，但却没有实行。文中说的华人租葡萄牙人房子居住的情况，与明末清初的人的记载没有两样，说明这种华夷杂居的情况到乾隆年间一直没有改变。

第二，澳门专门为吸引华人入教的“进教寺”建于康熙十八年（1679）。这时，仍然是海禁未解除的年代。如果在康熙初年，华人已全部迁出澳门，那这座寺院的建筑不是完全无的放矢了吗？

第三，清政府即使下决心迁徙澳门的华人，也不易办到，因为明末清初，澳门部分华人完全西化，从语言到服饰都与葡萄牙人无异，加之当时澳门又没有严格的保甲户籍制度，要辨认出这部分人并不是那么容易，更何况有的华人已与葡萄牙人结婚，他们的子女，更是无从处置。

由此可见，康熙初年已迁华人出澳门一说并不能成立。

其次，关于澳门葡萄牙人免迁的原因。

康熙元年，汤若望在中央朝廷任钦天监，通正使，官至正一品，颇得皇帝信任，澳门葡萄牙人通过教会人士请他帮忙说项，是合乎情理的。然而遗憾的是，魏特没有提供文件的根据，而目前康熙朝的档案也未完全公布，连最新出版的第一档案馆编写的《康熙起居注》也缺了前十年的部分，令人难以判断康熙帝是否下特免澳门葡萄牙人迁徙的谕旨。

不过，关于澳门免于迁徙的问题，在《元功垂范》中却有比较明确的答案：

“王（按：指平南敬亲王尚可喜）勘界至香山濠镜澳，公议以前山界闸口为边，置澳彝于界外。王以为既奉泛海之禁，则澳彝之船不许出海贸易，界内之米不敢私运出边。内地既不便安插，彼不知耕种，又别无营运，是坐而待毙也，恐非朝廷柔远之意。乃与将军、督抚会题请命。”<sup>⑧</sup>

这是一段非常重要、又为人们所忽略的文字。我们必须注意“内地既不便安插”这几个字，说明曾有人提议过把澳门的葡萄牙人迁入内地的主张，但后来给否决了。所谓“不便”，应理解为当时负责勘测、划定迁界的官员觉得，若把葡萄牙人内迁，会引起其他麻烦。这是他们作出决定的主要根据。《元功垂范》的作者是吏部考功司郎中东官尹源进，而校者是两广总督李栖凤，两位都是尚可喜同时代的人，尤其是李栖凤，还参与过勘测工作，他们写下的文字，应是相当可靠的。我们由此

而推断康熙初年，澳门免于迁徙的原因，是由于负责勘测大臣的提议的结果，恐怕不属武断之言。至于他们是否同时受了贿？目前仍未有人能提供证实的文献资料，也就不能下此结论了。

### 三、迁徙时期澳门的贸易活动

16、17世纪的澳门，纯粹是一个转口贸易港，是联系印度阿果、暹罗、日本长崎与菲律宾的马尼拉的中转站。那里的葡萄牙人，大部分“以行贾为业……凡一船货，直巨万，家饶于财，辄自置船，问其富，数船以对，贵微者附之或数十主同一船，每岁一出，出则数十百家之命系焉。”<sup>①</sup>

然而，到了17世纪40年代以后，澳门早期商业的黄金时代基本结束。日本宽永十六年（1639），禁止葡萄牙人前往长崎贸易；1640年，西班牙人宣布停止葡萄牙人在马尼拉的贸易活动；同年，明朝又不准他们到广州进行交易。葡萄牙人在东方贸易的霸主地位开始动摇，而1662年，清朝在沿海5省的迁徙行动，更是对澳门葡萄牙人沉重的一击，使之陷入重重困难的境地。“禁海时蕃舶暂阻，奥人贫困”，<sup>②</sup>是他们当时的真实写照。而从英国商船苏拉特（Surat）号抵澳门后的遭遇也可窥见其时澳门的贸易状况。

东印度公司的苏拉特号于1664年7月12日第二次到达澳门。据当时的规定，外来的船只必须在清朝哨所的监督之下驶进，没有准许不能驶出。但到8月底，中国人才第一次注意到这首英国商船，前来查询，对英人或停泊澳门或离开的要求，均予否定。而在葡萄牙人方面，他们在广东官员来文抽货税和发给票引之前，禁止外来的船只与岸上有任何接触。他们宣称，

要征货物总值6%作为市税。不仅如此，他们还设法使苏拉特号向城内的中国人纳重税……所以，直至8月15日，一位葡萄牙人才来签了一个买400担胡椒的合同，但却没有兑现。最后，葡萄牙人经一段长时间的讨论后，通过了一个方案：英国人应在澳门选一间房子，把货物卸下出售。从10月3日到27日，英国人被鼓励登陆，却又遇到许多麻烦。<sup>③</sup>

虽然，这里描述的主要是英国人来澳门贸易时的遭遇，着重表现葡萄牙人如何刁难他们，但也反映了当时澳门的海上贸易情况。一是1662—1663年时人所说澳门没有贸易当是实况；二是清朝对前来的商船严加控制。这足以说明澳门在海禁时期正常的贸易相当萧条。

与正常贸易情况相反，17世纪60年代的私人走私贸易却比较活跃。

在广东，控制海上走私活动的重要人物是尚之信。这位平南敬亲王的儿子是一个贪得无厌的狡诈之徒，在他的手下，有一个专门从事走私集团，他们其中一个活跃的地点就是澳门。史载：“向者海禁甚严，人民不得通澳，而藩王左右险与为市，利尽归之，小民无分毫滋润。”<sup>④</sup>这种官商的走私集团贸易不仅小民不得其利，而且偷漏课税，大大损害朝廷的利益。

除了在澳门活动之外，尚之信集团的走私活动还远至东南亚和日本各地。估计，其中有一部分是转运从澳门得来的货物。所以，当时尽管澳门的葡萄牙人曾一度被禁止到马尼拉、日本长崎贸易，但中国的官商走私集团却能部分地为他们间接转运，致使澳门转口贸易港的地位得以保存。

康熙初年澳门的海上贸易由于属私人贸易性质，所以交易的货物也大大有异于明以前主要用以供皇室享受的奇珍异宝。其物品与后来雍乾年间（1723—1795）大致相同：

“惟是锡、蜡、胡椒、槟榔、檀木之类，皆由外番各国贩运而来，又得中土之细茶、茯苓、湖丝、糖果之物贩往各番。”<sup>②</sup>

\*

考察清初迁徙时期澳门的历史，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澳门之所以免于迁徙，主要是由于清朝官员“防夷”心态和因循明代的政策所致。这个时期澳门海上贸易是以私人走私贸易为主，广东官商集团从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清初对付郑氏集团的迁徙措施使澳门葡萄牙人经历了一场严重的危机，而免于迁徙，对于保持葡萄牙人在澳门的地位则是关键的一步。如果当时清朝执意迁徙澳门的全部居民，从康熙到现在300多年的澳门史，恐怕将大异于现在所写的篇章了。

⑥⑧⑨ 《粤海关志》，卷26，〈夷商〉1。

⑩ M. de. Jesus, *Historic Macao*, (1902), P. 110.

⑪ Ljungstedt, *A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Portuguese Settlement in China* (Boston, 1836), P. 76.

⑫ 《国朝柔远记》卷1。

⑬⑭ (清)田明曜修，陈澧纂：《香山县志》（光绪五年〔1879〕本），卷22，〈纪事〉。

⑮ 魏特著，杨丙辰译：《汤若望传》（上海：商务印书馆，1949年10月），363—364页。

⑯⑰ 张甄陶：《澳门形势论》，见王锡祺（1855—1913）辑：《小方壶斋与地丛钞》（光绪十七年〔1891〕本），第九帙。

⑱ 《元功垂范》，卷下，29页。

⑲ 《澳门纪略》，卷下，〈澳蕃篇〉。早期澳门并无农业，1600年以后，农业全部操纵在广东人手里，参看 Austin Coates, *A Macao Narrativ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54—55.

⑳ 《粤闽巡视纪略》卷2。

㉑ H. B. Morse (1835—1934),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6), Vol. 1, PP. 33—34.

㉒ 《广东新语》（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4月）《澳门》，38页。

①③ 《澳门纪略》，上卷，〈形势篇〉。

②③④⑤⑦ 同上，〈官守篇〉。

作者单位：香港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林有能



## 刘轲生平及著述考略

《白氏长庆集》卷十七，有《问刘十九》《刘十九同宿》《雨中赴刘十九二林之期及到寺刘已先去因以四韵寄之》和《蔷薇正开春酒初熟因招刘十九张大夫崔二十四同饮》四首诗，前两诗为五七言绝句，后两诗为七律，皆江州司马任内在庐山之作。卷二十六又有《代书》一文，当时刘轲将回韶州求举贡，访白氏告行，他作此文代书，以便轲来日赴长安应进士试，持此谒见他在京任职的文友，为轲吹嘘。诗称行第，文书姓名，于是刘十九是否即刘轲，便成文坛一桩公案。又因《刘十九同宿》一诗有“唯共嵩阳刘处士，围棋赌酒到天明”之句，而白氏《代书》称“彭城人刘轲”，轲《上座主书》自称“本沛上耕人”。彭城是郡，沛为属县，今徐州地区。嵩阳则为河南登封县。既称刘十九为嵩阳处士，则两刘是否同一人，又增加了怀疑的因素，为这一公案添了小小的纠葛。这虽是小问题，无关宏旨；但近30年来，学术界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岑仲勉《唐人行第录》说刘十九，“嵩阳处士也，名未详”。刘永济《唐人绝句精华》注《问刘十九》诗云：“刘十九，嵩阳居士也，名未详。或云即隐居庐山之刘轲。”老一辈的学者，治学态度谨严，对此都是存疑的。顾肇仓、周汝昌《白居易诗选》注这首诗说：刘十九，“指刘轲”。社科院文研所《唐诗选》的注，则据白氏《代书》和刘轲《上座主书》，认为刘轲是彭城沛县人，“刘轲并非刘十九”。诸家所说，有同有异：同者是刘十九或刘轲为嵩阳即登封县人；异者认为刘十九是嵩阳人，刘轲为彭城沛人。而引起纠葛的根源，在白诗“唯共嵩阳刘处士，围棋赌酒到天明”中的“嵩阳刘处士”一语。笔者不揣谫陋，就此试作探索。

近人吴宗慈据宋陈舜俞《庐山记》，明桑乔《庐山纪事》、清毛德琦《庐山志》，并搜集有关资料，重撰《庐山志》，书中所列曾居庐山的唐代名人，从李白到孙逸共20人，其中刘姓者，仅刘轲1人而已。白居易在江州司马任内，在庐山相与游处的友人，见于诗文者，如上面所说，则有刘十九、刘轲。朋辈之间，诗文往来，诗多称行第，文则常书姓名，这可说是唐人文坛上的习惯。刘十九与刘轲，看来并非两人。至于“嵩阳刘处士”的“嵩阳”，笔者认为“高阳”之讹，且不是指刘十九的里籍。《史记·朱建传》载酈食其见刘邦，自称“高阳酒徒”。高阳是酈食其的故乡，白氏借以戏称刘轲。上举白氏四首诗，有三篇是招饮谈喝酒的。可以“心期同醉卯时杯”、“围棋赌酒到天明”的刘轲，无疑是一位豪饮者，称得上这个“雅号”的，况且这诗是白、刘两人心情都很高兴时的戏作。下文对

此将略作说明。

如果刘十九另有其人，而且里籍属登封县，这样一位与著名诗人白居易交谊甚厚的人，即使他无意科第，是一位处士，不见于《登封县志》“选举志”内，按理也应见于“先贤传”中。可是《登封县志》的“先贤传”和“选举志”中，唐代不见有刘姓者，自然没有刘十九其人。有一位李中敏，元和中进士，官侍御史，见于《登封县志》，为刘轲同时人。刘轲的仕历、著述和文名，非李可比。若轲为登封人，不应不见于县志，这也是一项有力的反证。刘轲的里籍，他在《上座主书》中自己说清楚了：“轲本沛上耕人，代业儒，为农人家。天宝末，流离于边，徙贯南鄙。”谈论刘轲里籍的学者有点疏忽。“轲本沛上耕人”，分明说的是“本”，指60多年以前的上代。“天宝末，流离于边，徙贯南鄙”。叙明安史乱起时，举家南行转徙，在南方边地即曲江县落籍。这怎能还说他是彭城沛人呢？张九龄祖籍范阳，曾祖为韶州别驾，家于始兴。新旧《唐书》都说张九龄为曲江人。同样，刘轲虽祖籍沛县，他也应该是韶州曲江人，毫无疑问的。

这里要顺便谈一下前面提到白氏所写有关刘十九、刘轲四诗一文的写作时间。

宋敏求说，“香山集经乱亦不复存”；“后人亦补东林所藏，皆篇目次第非真”。<sup>①</sup>的确，我们翻阅一下《四部丛刊》影印日本活字本《白氏长庆集》里谪江州时期的作品编次，便显见有些混乱。《元和十二年淮寇未平诏停岁仗愤然有感率尔成章》一诗，汪立名所编《白香山诗集》，指出“时本作十三年，误。”笔者认为《问刘十九》一诗，大约作于元和十一年冬或次年早春；七律两首，写于十二年春；《刘十九同宿》诗，则作于同年十月至十一月间。至《代书》一文，应为十二年三月所作。<sup>②</sup>须作说明的是，《代书》与《刘十九同宿》所体现的作者心态差异很大，写《代书》时十分消沉；写《刘十九同宿》则欢快豪爽，近于狂态。为何如此？这只要联系写作背景来看便明白。贬谪江州，心灰意冷。但元和十二年七月，裴度出京督师，接着白氏的好友崔群入相，十月淮西平。《刘十九同宿》诗汪立名本题下注：“时淮寇初破”。这些政治局势的变化，对白居易很有利，量移在望，自然变消沉为欢快。刘轲则因取得韶州解送，于十月随方物入贡，逾梅岭，出庐山北路白氏草堂附近的驿道。两个好友这时有机会聚会，心中各自闪亮着希望之光，高兴之至！故白氏有称刘轲为“高阳处士”，并要和他“围棋赌酒到天明”的戏作。理顺这几篇诗文的写作时间和背景，也有助于说明刘十九即刘轲。

## 二

刘轲，字希仁。新旧《唐书》不立传。清徐松《登科记考》以轲为唐宪宗元和十三年（818）进士。唐人记其事的，有上举轲友人白居易。白氏《代书》一文，称轲是庐山隐士一二十人中之秀出者。次为僖宗时的范摅，他在所著《云溪友议》一书的中卷，有记轲“葬书生”事。再次是唐末五代时人王定保，他在所著《唐摭言》卷十一“反初及第”一项，说轲少为僧，后登第。范书所记，虽不免有传闻之误，但“耳目所接，终较后人为近。”（《四库全书提要》语）王定保自述所记，得自其岳父吴融等人。其后宋代计有功

《唐诗纪事》卷四十六记刘轲事，一部分采自范、王两书。三书所记，各有值得注意的地方：范书谓刘轲“韶右人也”；③王书称轲“文章与韩、柳齐名”；计书说轲“与吴武陵并以史才直史馆”。

明嘉靖年间，黄佐撰《广东通志》，始为刘轲立传。清阮元修《广东通志》，也有传。阮元的儿子阮福，又撰《刘轲传》。各传多采《云溪友议》《唐摭言》诸书和轲传世文章中的材料撰集而成，对传主生平经历，常有先后倒置的；阮氏父子所撰，尤为明显。清初屈大均的《广东新语·文语》中《刘御史集》条，虽不是传记之文，但对刘轲生平及其著述文章，多有论及。黄佐于刘轲家世及其就学登第等，记叙较明确。大概明代有关刘轲生平资料，保存尚多，黄佐为立传，足资参考。清代阮氏父子所作，或因文献有阙，反见疏略。

上述有关的记载，稍加整理，于刘轲家世生平，可得一个基本轮廓。

刘轲祖籍徐州沛县（今江苏沛县），天宝末年，安史乱起，祖父刘效携家避乱南行，自淮入湘，至韶州安家，入籍曲江县。④黄佐说，“轲生大历中”。大历共十四年，刘轲大约在大历七年（772）或八年（773）间，出生于曲江家中，其时父刘绮经商于郴州。轲童年好学，在韶州城南百里处的月华寺，从惠朗禅师学佛典。间或曾往豫章高安（今江西南昌市西南）的南果园。据轲自述，童年时又曾和家人返祖籍沛县。因家庭遭变故，有丧服之灾，悲痛消极。⑤会有人以圣人之道立身扬名相晓谕，他很感动。后南下韶州，赴罗浮山，师事寿春杨生，学《春秋》三《传》。元和初年，下罗浮，逾梅岭，隐居于庐山，从“腹笥古今史”的隐士茅君学。其后有志于科第，十二年春末夏初，回韶州谋举送。白居易为作《代书》，介绍他谒见在京的集贤馆三十二补阙等七八位文友。元和十三年，以韶州籍登进士第，累官侍御史。文宗朝，为宏文馆学士，史馆修撰。出为潞州（治所在今河北武安县）刺史。⑥开成二年（837），居洛阳修行坊，⑦作《大唐三藏大遍觉法师塔铭》。

### 三

“轲生大历中”，应该说，他与柳宗元、白居易、刘禹锡等是同龄人，登第则后于他们。韩愈比他长几岁。刘轲的思想行为和文学创作，反映出唐代、特别是中唐的时代特点，又独具个人的特色。唐代是思想比较开放的封建王朝，在它的统治下，佛教、道教与儒家思想并行。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常是一人兼受这几种哲学思想的影响；而在具体表现时，大多有或先或后、畸轻畸重的不同。刘轲少为僧，《唐摭言》说他“复求黄老之术”。但在他一生中，真正起主导作用的，则是儒家积极入世的圣人之道。他渴望有圣君贤相出，遵照圣人之教治国。自己则潜心史学，研究古代圣人的言行和治道，用他的历史著述加以阐明，以供上层统治者的参考。我们没有看到他象韩愈、柳宗元那样，明确提出文以载道、文以明道之类的主张，而他的传世文章所阐述的，主要正是儒家的圣人之道。他不满于为“驾说之儒”，要为“行道之儒”。

安史乱后，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向往贞观之治和开天盛世，亟望王朝中兴，要求进行政治改革。伴随而来的是功利主义文学思想的发展，诗和文两方面都在酝酿改革。散文文体文风的改革，到了韩愈、柳宗元登上文坛以后，声势日大，成就最高。刘轲正是这时文体之风改革的一员健将。由于刘轲的著作和文章亡佚太多，传下太少，我们看不到他对文体文风改革的言论。但是那十多篇传世至今的文章的创作实践，可以说明他的文学主张。“文章与韩、柳齐名”的评语，无疑是从古文运动的角度给予称赞的。江藩《刘希仁文集序》以为刘轲之文，当时与韩、柳齐名，“第其文流传甚少，后世但知韩、柳之下，有欧阳詹、李观、李翱而已。”又云：“希仁之学，致力于《春秋》《孟子》，持论甚正，不杂禅语，不堕理障。虽行文波澜不如韩子之汪洋恣肆，而谨严则过之。其文在韩子之下，欧阳诸子之上。若中山、文泉，<sup>⑥</sup>瞠乎后矣。”这种评价，可称公允。宋姚铉用十年时间，“遍阅群集，耽玩研究，掇菁撷华”，“纂唐贤文章之英粹”，为《唐文粹》一书，（见《唐文粹序》）选录刘轲文达九篇之多。可见宋人对刘轲文章的重视，体现出较高的评价。但当今论述唐代古文运动和古文家的专著与论文，没有看到提及刘轲，这就未免欠公平了。

必须指出的是，在中唐诗歌散文改革与传奇小说发展的高潮中，刘轲对诗歌和小说的看法，不无偏见。韩愈、柳宗元等人，不仅是古文运动的领袖，而且是著名的诗人，在唐代诗歌发展中别开诗派，独树一帜，有所创新的。同时他们也以古文试写一些小说类的寓言故事。白居易、刘禹锡等是著名的诗人，也是散文作家，文章写得雅健流畅。《旧唐书·刘禹锡传》说“禹锡精于古文，善五言诗。”刘轲与他们不同，全力写古文，从事著述；不喜吟咏，不作小说。《上崔相公书》云：“伏念自知书来，耻不为章句小说桎梏声病之学。敢希趾遐踪，切慕左邱明、扬子云、司马子长、班孟坚之为书。故比居庐山，亦常有述作。”根据他的自白，我们可以说，刘轲的诗，《文苑英华》《全唐诗》都仅存应进士试的《玉声如乐》一首，恐怕不全是亡佚的缘故了。

#### 四

刘轲著述甚富，阮元《广东通志》、轲传世文章自述和《新唐书·艺文志》、郑樵《通志略》、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白居易《代书》诸家著录，列举《三传指要》15卷、《汉书右（一作左）史》10卷、《黄中通理》3卷、《翼孟》3卷、《隋鉴》1卷、《三禅五革》1卷、《十三代名臣议》10卷、《豢龙子》10卷、《帝王历数歌》1篇、《唐年历》1卷、《帝王镜略》1卷、《牛羊日历》1卷，凡12种；另有杂文百余篇。杂文篇数，未计入离庐山后之作。从这十多种著作的书名，可以约略窥见其取材前世历史，论述儒家政教之说的基本内容。可惜亡佚殆尽，仅《牛羊日历》1卷，见于缪荃孙所辑《藕香零拾》中。杂文则《全唐文》存录《上崔相公书》等14篇，其中4篇已见于宋初《文苑英华》，9篇见于《唐文粹》。清初屈大均为辑《刘御史集》，未刊行。其后阮福为刊《刘希仁文集》，曲江教谕梁炯等曾重刻。道光二十五年（1845）冬，南海伍崇曜以此书流布未

广，重为刊行，编入《岭南遗书》第2集。由谭莹覆校，可称精审。198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丛书集成初编》，其中《刘希仁文集》，即据《岭南遗书》本排印。

1978年10月，香港中文大学据吴道镛《广东文征》和《广东文征作者考》两书，整理成《广东文征》改编本，精装6册，大有功于岭南文献。是书第1册“凡例”云：“今次付印，虽曾点校一过，其中有明知其缺漏者，以无原本可稽，暂仍其旧。”这确是一件遗憾的事！笔者披阅改编本第1册卷2所收刘轲文15篇，颇见错讹。如《代荀卿与楚相春申君书》，开头便脱漏400字。此文并见《唐文粹》和《全唐文》，不知改编时何以不就两书参校？今《岭南丛书》点校《刘希仁文集》，从屈大均《广东文选》增辑《王氏广陵散记》一文，并收入《牛羊日历》。《资治通鉴》卷242穆宗长庆二年十二月，诏立景王湛为皇太子。《考异》引《牛羊日历》所记，按语云：“此出于朋党之言，不足信也。”但此篇刘轲所撰，为保存文献，故仍辑入，不以其言不足征而不取。

史有阙文，笔者对刘轲的生平思想及其著作的论述，仅得其大略。其它有关的问题，如韩愈有《答刘秀才论史书》，刘秀才是否即刘轲等，有待于作进一步的探索。

① 见《春明退朝录》卷下。

② 《四部丛刊》本文末署“三月十三日”，《岭南遗书》谭莹覆校本作“三月三日”。笔者于1985年12月在香港《大公报》副刊《艺林》新277期发表《问刘十九》小文，当时按《四部丛刊·白氏长庆集》编次，以五绝为元和十二年冬作，七律两首为十三年春作，看来皆误放后1年，就此改正。

③ 韶右，疑韶石之误。

④ 见轲《上座主书》自述，并《韶州府志》《曲江县志》。

⑤ 见轲《与马植书》。

⑥ 《唐诗纪事》称轲洛州刺史，《全唐文》作者小传作洛州，误。

⑦ 《大唐三藏大遍觉法师塔铭并序》：“访余柴门于行修里。”清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五谓“行修，即修行之讹。”

⑧ 《新唐书·刘禹锡传》：“自言系出中山”。刘蛻自号文泉子，有《文泉子集》。此处指刘禹锡、刘蛻两人。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刘斯翰



陈永正

## 《清诗纪事》小议

钱仲联先生主编的《清诗纪事》已由江苏古籍出版社陆续出版。本书搜存有清一代诗歌文献，完成唐宋以来诗歌纪事一体的配套工程，在总结清代诗学的经验成就上有重大的意义。全书20册，近日已出版7册（包括明遗民卷，顺治朝卷、康熙朝卷、雍正朝卷）。笔者略读一过，仅就清代广东诗人纪事材料方面提出一些意见，以供编者及读者参考。

一、据《清诗纪事·凡例》载，诗家收录原则：清初抗清志士为明朝尽忠献身者如陈子龙、夏完淳、张煌言、瞿式耜等人不收，明遗民入清之后生活时代较长者收，而本书“明遗民卷”147页收录了邝露。按，邝露字湛若，号海雪，广东南海人，生于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瞿式耜等人拥立桂王于肇庆，邝露应召入朝，为中书舍人，奉使还广州。永历四年（1650），清兵迫广州，邝露与诸将戮力死守，凡十阅月。城陷，为清兵所杀。邝露是死难的抗清诗人，不宜入明遗民之列。

二、“明遗民卷”645页有“李龙子”条。诗人简历称：“李龙子，字田叔。崇禎十二年己卯举人。僧名今莹，字具五。”并引陈融《颍园诗话》：“龙子尝从函呈讲学。以父长往，亦退隐山林。先其兄五年薙染，祝发时，作诗云云。”条中于李龙子籍贯及其父兄情况俱未载。按，据《广州府志》卷120

及陈伯陶《胜朝粤东遗民录》卷4，知李龙子之父李云龙，字烟客，广东番禺人。曾为袁崇焕幕客，后削发为僧，号二严和尚。明亡后，流浪不知所终。著有《啸楼前后集》、《雁水堂集》等。李云龙有《会冢行》诗，写永历四年清兵入广州屠杀惨状，尸积成山，义士王潜父筑大冢埋之。李云龙其诗其事当补入“明遗民卷”。云龙长子名云子，次子名龙子。皆祝发为僧。

三、“明遗民卷”1002页有“何栻”条，1015页有“何巩道”条。按，何栻为何吾骆之孙，何巩道之侄，后过继巩道为嗣子。故何栻应置于何巩道之后。

四、“康熙朝卷”3975页有“薛刚生”条。诗人简历称：“薛刚生，号二樵山人，一号剑公，广东顺德人。诸生。”按，薛氏名始亨，字刚生。少日与屈大均从陈邦彦学。邦彦抗清死难，始亨弃诸生，绝意仕进，伏处草莽（事迹具见《顺德县志》及黄士俊《南枝堂稿序》、李祈年《剑道人小传》、王鸣雷《哭薛剑公文》等）。著有《蒯缙馆十一草》、《南枝堂稿》。薛始亨入清不仕，为诗亦多故国之思，故当列入“明遗民卷”。“诸生”前当加“明”字。

五、方殿元二子方还、方朝，年岁相若，乔寓于吴，人称“广南二方”。本书列方还于“康熙朝卷”8870页，列方朝于“雍正朝卷”4549页，未知何据？

此外，尚略有不足者：纪事中每引徐珂《清稗类钞》及《国朝野史大观》等书，此等书引用的资料，不注出处，多为编者平日读书随手札记，大半是“櫛括其事，贯串而成斯篇，未能悉记其来历”，只能说是“信以传信，疑以传疑”，若有其他资料可据，则似不必引用此等书籍。又，本书卷帙浩繁，校点时或有疏误。如“明遗民卷”532页“陈子升”条谓陈“有《东洲草堂遗集》二十六卷”，“东洲”，当作“中洲”。“明遗民卷”945页“王邦畿”条引卓尔堪《明

遗民诗》：“岭南耆旧，子準亦有诗名。”“準”，当作“隼”。1075页“王鸣雷”条诗人简历称：“王鸣雷，字东村，一字震生。”当云：“王鸣雷，字震生，号东村。”如“康熙朝卷”2997页“梁佩兰”条诗人简历称：“梁佩兰，字芝五，一字药亭，号郁洲。”当云：“梁佩兰，字芝五，号药亭，别号柴翁，晚更号郁洲。”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古文献所  
责任编辑：刘斯翰

---

## 《科学与文化》论坛第一次会议

最近，由钱学森、钱三强等著名学者倡议，中国科协促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联盟委员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科学与文化》论坛的第一次会议，会上，钱三强、龚育之、高占祥、何作庥、于光远、朱丽兰、刘道玉、郑必坚、邱仁宗、钱学森等著名学者专家先后作了发言。

会议反映了改革的日益深化，使建设适应改革与开放的观念形态和文化心理，提高社会各界的文化意识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

前两年，“岭南文派”的争鸣热闹了一阵子，虽有不了了之之憾，但岭南文学的专门研究毕竟开了个头。开场不易，为继更难，为推进这一研究向纵深发展，本刊于今年4月召集了广东部分中青年研究者座谈，与会者围绕岭南文学的特征问题，从文化地理、文化传统、文化心态、语言工具以至岭南文学的发展趋势等不同角度发表了意见。本刊将陆续把这些见解介绍给读者。

黄伟宗

## 岭南文学形成的条件

一个文学流派的形成或提出，不外两种途径，一是如西方现代派那样，先有理论主张，接着在创作实践中体现其理论；而当创作没能充分发展时，便只能算是一种思想流派。二是在创作实践中自然形成，后来经概括总结才逐渐明确起来，如唐代的山水诗、边塞诗就是。地域型、风格型的文学流派多属于此。

在文学史上，岭南的文学向来没有自己足以称之为流派的理论主张，虽然出了不少文学大家，如近代以来的黄遵宪、丘逢甲、康有为、梁启超、欧阳山、秦牧都是很有份量的，但他们的文学主张却没有一条彼此贯穿一气的红线，依此而论，历史上的岭南文学只是有大“家”而未能形成流派的地域文学。不过，在这些文学大“家”与同时期的岭南中小“家”之间，却并不乏种种共通性，生活的地域性始终是影响岭南作家群体风格形成的潜在因素，为此，

我们不妨沿着文学流派形成的第二条途径，研究作家的气质、人物的形象、反映在作品中的共同的岭南风土人情、语言格调和审美情趣等等，把握岭南文学的地域型和风格型特点，使岭南文学的面孔逐渐清晰起来。

在岭南文化的诸多艺术门类中，岭南画派、岭南音乐、粤剧等都早已形成了特征较为明显的流派实体，唯独岭南风格难以显见。想来，这首先有一个艺术语言的问题。绘画语言和音乐语言的地方风格本身是在表现本地山水风光、生活情趣的创作需要中逐步形成的，有地方的传统性，它越少受全民性的影响和束缚，越有利于丰富艺术表现的语汇，扩大艺术的表现力。而且，欣赏者可以无需专门的训练和学习就可以感觉和欣赏到这艺术语言地方风格的艺术美。至于作为一种通俗的地方口头艺术的戏曲，则是以满足操本地方言的欣赏者的需要为基本目的发展起来的，自然以本地方言为艺术语言的基础，可以不受全民性的语言、文字的影响和束缚，而且这方言本身就是构成戏曲地方性的一个基本因素。

然而，岭南的文学却要面向全国，必须能被全国的读者所理解和接受，其语言就不得不受到全民共同语的影响和制约。

而且，由于事实上向来也没有一个岭南方言的较完善的文字传统，即使要用方言专门为本地读者创作，也不可能超越文字系统的障碍。这是有前车之鉴的。欧阳山1929年曾在广州倡导“粤语文学”运动，尝试用广州话写作。当时提出两条理由：一是作者用自己不熟悉的普通话写作，与要表现的生活隔了一层，难以充分表情达意；二是本地读者懂普通话的不多，即使读懂听懂也味道大减。这看来不无道理。但“粤语文学”终究发展不起来，而且欧阳山本人后来所选择的语言道路，还是以全民共同语为基础的文学语言道路。颇有启发意义的是欧阳山的《三家巷》和黄谷柳的《虾球传》，这两位作家尽管写了不少岭南下层人民的生活风情，其语言都有粤语的痕迹，但在欧阳山的《三家巷》里是广州方言和北方方言参半，熔铸了殊方土语；而黄谷柳的《虾球传》则是在洗炼的现代“官话”的基础上主要吸收了粤语和传统小说的语言因素，两者在语言风格上的区别是比较明显的。这些事实告诉我们，处于方言区的岭南文学，其语言的构成实际上呈现出多元的状态。岭南作家在以全民共同语创作总会或多或少地受到岭南方言的影响和制约，这会给创作带来一定的困难，却又可能成为一种语言风格因素。但由于各个作家会有不同的语言修养和自己独特的语言追求，岭南文学的方言特点恐怕只能算是岭南文学的一个次要标志，而不是岭南文学形成的决定条件。

从地域—风格型的意义上审视岭南文学，我们会发现，在南来北往的时代潮流和文学的总体发展态势中，岭南文学总是处在“北风海浪”的夹击之中，几乎从未出

现过“南风北吹”或“南风过海”的盛事。虽然一百多年来，曾有多次划时代的革命从岭南或南方“北伐”：太平天国、辛亥革命以至今天的改革开放。但从五四运动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左联时期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及文艺大众化、抗日战争文学、延安的文艺运动、新中国文学、以至近年的现代主义思潮等等，这些影响全国的文艺潮流，对于岭南文坛来说都是南来的北风，岭南文学只有应接呼应的份儿（只有起自岭南的“伤痕文学”热潮曾一度北延）。过去香港、南洋受国内文学影响，路经广东便加有广东味；而这些海外文学对国内的影响，却往往在五岭南麓止步，难以北延。只有近年来的琼瑶、三毛为代表的台湾文学热，由于渠道增多才不限于五岭界南。有趣的是，处在这种文化地域的条件下，尽管岭南对西方的物质文明和各种文化观念始终保持最开放的姿态，但对于西方的文艺思潮，却往往是在与北方文学传统认同的情况下予以接纳的，所以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反应总给人慢半拍的感觉。这“北风海浪”的夹击，使岭南文学长期飘摇动荡，而对“北风海浪”的吸取又常处于夹生的状态。这既是岭南文学的一个致命点，也是岭南文学据以形成自己特色的文化地理优势，这是我们不得不正视的现实。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陶原珂

李树政

## 岭南文学的 基本特征：融合

某一地域的文学，凭藉其独特的语言和风土人情（包括社会生活、经济生产），也就表现着独自的审美意识，必然形成地域文学的鲜明特征。

从岭南文学来看，当前急于高张流派的旗帜，着实余勇可贾，却又多少感到出力不在实处之憾。其实，眼下首要的不在于承不承认流派的存在，而在于认清岭南文学的基本特征。

那么，岭南文学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呢？

我以为，假若以最省俭的字眼来概括，那就莫过于“融合”二字了。从近代至当代，岭南文学是沿着“融合”这条路子走过来的，而且可以断言，今后还会继续走下去。这一基本特征的内涵有三，即：中外文学的融合；雅俗文学的融合；乡土文学与都市文学的融合。同时，这种融合是分化与组合的过程。

第一，中外文学的融合。

长期处于封闭式社会的中国传统文学，其作品所表现的社会生活中的人性或人格，往往陷于“神化”的囹圄。比如，六朝志怪、唐宋传奇、笔记体小说无不带有浓厚的神怪色彩，直至明清小说《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聊斋志异》、《红楼梦》等颇有影响的作品，仍摆脱不了“神化”的羁绊。这恰恰是血缘宗法制度（即王族与族权统一）在文学作品中的体现：

以神代替了人。

可是，14世纪至16世纪，欧洲出现的“人文主义”，核心是以人代替神，并随即开创了“文艺复兴”时期，而且其影响远远越过了欧洲。可以说，这就是开放式或半开放式社会的文学，与封闭式社会的文学相互之间存在的根本差异。

自明代以来，广州成为我国最重要的通商口岸，岭南（主要指广东）一带的经济发生了重大变化，从“以农为本”逐渐变为“以商为本”。结果，引起了一连串对思想文化领域的冲击，产生了中外文化的碰撞。于是，作为岭南文化的一部分，岭南文学在近代史上翻开了绚丽的一页——

诗歌方面：明末清初的“岭南三大家”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清末的黄遵宪、丘逢甲等，他们的诗作注重民生疾苦，喜用民谣俚语入诗。黄遵宪明言“我手写我口”，梁启超倡导“诗界革命”。

小说方面：吴沃尧的《九命奇冤》、《恨海》、《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黄小配的《洪秀全演义》、《廿载繁华梦》等；梁启超的对话体政论小说《新中国未来记》等等，有的作品撷取真人真事，有的作品正视社会人生。

另外，在此期间，“岭南画派”、“广东音乐”的出现，以及1913年郑正秋编导我国第一部故事片《难夫难妻》，这对当时的中国传统文化无异于原子弹爆炸，轰动一时。

这些作品在今天看来，也许并不那么成熟。但是，近代的岭南文学终究迈出了“融合”的步子。应当认识到中外文学的融合，并非简单的摹仿复制，也不仅是形式



技法的变化，而是经过不断分化和重新组合。尽管这些作品大多采用了民族的形式，可是审美理想却有重大的发展：挣脱了“神化”的枷锁，展现了人在文学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就是对于审美表现对象的人的发现（即人在文学作品所表现的社会生活中的人性、个性和自由的确立），以及对于作为审美创造主体的人的发现。这一点，正是中外文学融合的意义所在。直至今日，当代的岭南文学自觉或不自觉地显示了这一特征。只要对这一特征有所认识，也就不难发现当代岭南文学曾涌起“伤痕文学”大潮的奥秘了。

## 第二，雅俗文学的融合。

雅俗文学的区分，根本在于审美方式、审美情趣、审美习惯的差异。在封闭式的社会里，审美活动总是逃脱不了统治者的制约。这种制约与反制约的作用，推动着我国传统文学的发展。总而言之，诗赋一类的文学作品中，雅文学雄踞主导地位；而小说一类的文学作品，却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俗文学的天下。

在我国的传统文学中，雅文学的审美方式、审美情趣、审美习惯深受儒家美学思想的影响，崇尚“中和之美”，并奉此为审美范畴的正宗和典范。与此相反，我国的小说是从说唱、话本、宗教文学发展而来的，尽管也有经过文人（大多是功名事业不得志者）的加工整理，但世俗化的审美方式和市民化的审美情趣，始终成为俗文学的两大支柱。于是，长期以来，俗文学受到歧视与贬抑。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后，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语言文字的通俗化使这种现象有所改善。

值得注意的，是岭南文学出现的雅俗

文学逐渐走向联合的现象。

早在1898年（光绪廿四年），梁启超极力为小说在文化领域内争一席位，认为“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发表了《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等理论文章，冀求进行“小说界革命”。这些文学理论不无偏颇，但是，对近代的岭南文学影响较大，其可贵之处在于揭橥了反对封闭式社会的审美方式与审美情趣的旗帜；在小说创作中俗文学奋力摆脱雅文学的桎梏，高昂起首，阔步向前走去。这一点，在研究岭南文学的特征时，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这也是我国民族文学的发展进程中，岭南文学有别于其它地域文学的根本点之一。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出现雅俗文学的融合。当时，吴沃尧、黄小配等人的小说创作就是有力的明证。

在当代的岭南文学中，黄谷柳的《虾球传》、欧阳山的《三家巷》、《苦斗》、陈残云的《香飘四季》等小说、秦牧的散文……这些作品都表现了浓郁的地方特色，独特的语言文字和乡土人情。尤其是虾球、鳄鱼头、周炳、区桃等小说人物具有鲜明的个性，与岭南文化息息相关，充分展现了审美方式世俗化，审美情趣市民化。

同时，这些作品又有别于传统文学中的俗文学。比如，显而易见的一点：往往在雅文学中体现的古典主义审美规范——“含蓄”，却在岭南文学的作品中适当地表现出来。说是“适当”，即指含蓄在这里已经不是绝对性和排他性的形式。在小说创作中，不仅仅题旨含蓄，而且表现在生活场景的描写，人物神态与性格的描写之中。试看《虾球传》描写南方滨海的繁华大

都市，《三家巷》描写“南大门”广州的内街小巷，《香飘四季》描写蕉蔗成林的珠江三角洲乡村，选择的场景颇有讲究，往往从一个侧面蕴藉巧妙地衬托了人物性格和心理活动。至于《三家巷》中对周炳、区桃的神态与性格的描写，则处处可见含蓄之美了。因此，可以说岭南文学显示了雅俗文学融合走向。这种走向也体现了我国小说发展的源与流，即在审美创造中俗文学的分化和融合的进程。

### 第三，乡土文学与都市文学的融合。

自古以来，岭南文化一直受到中原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的影响。可是，从近代开始（甚至可以上溯清代），岭南一带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的商品化程度较高，促使乡村的墟市广泛发展起来。这些墟市和城市联成一个商业网，沟通了城乡物资交流。珠江三角洲一带的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结果，形成了近代岭南文学繁盛局面。“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岭南画派”、“广东音乐”……均以其独特审美方式、审美意识对其它地域的文学艺术产生影响。于是，各地域之间的文学交流出现了双向或多向的相互作用，取代了单向性的影响。这种文学交流的出现，并没有也不能改变乡土文学和都市文学的差异，然而，却为乡土文学和都市文学的融合提供了条件与环境。

当今，岭南一带（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又一次掀起了商品经济发展的高潮，使岭南一带的乡村发生天翻地覆的巨变。星罗棋布的乡镇不仅是农村的经济中心，而且成为乡村文化的集结点。其经济生产方式、社会文化生活已经出现了现代化和都市化的倾向。社会办文学的热潮方兴未艾，形形色色的“企业文学”——其中相当部分是乡镇企业——正式或非正式地登上了文学舞台，有力地促进了当代岭南文学的发展。

可以肯定，随着乡镇的商品经济不断发展，其社会生活的现代化和都市化的倾向也就日趋明显，城乡之间的差距也就日趋缩小。于是，不管乡镇企业以何种形式参与或影响文学事业的发展，其作用和意义将突出地表现在二方面：一是作为表现人以及反映生活的文学，必然相应地出现都市化的倾向；二是人的审美能力的不断提高，审美视野的不断扩大，审美方式的不断发展，审美情趣的不断丰富，必然引起乡土文学和都市文学之间的作者、读者相互沟通，从而出现当代岭南文学的特征之一——乡土文学与都市文学的融合。

作者单位：广州文化出版社

责任编辑：陶原珂

## 镇村企业发展的新形态： 集体与个体联营

——南海县调查

邹灿华  
丁锦和  
张硕城

### (一)

近两年来，南海县镇村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种新的经营方式，这就是镇、村集体企业与个体企业联营。这一新的经济层次是从1986年萌发的。到目前为止，全县这种联营企业共749间，从业人数19615人。资金投入总额7075.5万元，1987年这种联营企业的产值达2.8339亿元，利润2922.87万元，引起人们的重视。据目前看，南海县这类联营的企业经营方式主要呈现出四种形态：（1）共同投资，按投资金额比例分成的新办联营企业。联营企业双方共同派出领导组成决策机构（董事会），厂长由双方推荐，一般联营企业的厂长大多数由个体（私方）担任，镇村派干部担任副厂长。如大沥镇经济发展总公司与个体户邝锦华联营的“华联铝合金型材厂”，双方各投资100万元，共投资200万元。邝锦华任厂长，镇派一名干部任副厂长，个体方面负责产、供、销业务，镇方面负责选派人员担任企业会计、出纳、仓库保管。这间企业1987年6月建厂，9月投产试销，月平均产值169万元，月纯利润15万元。（2）以镇村原有企业为基础，承包给私人后再由承包者与有关单位共同投资扩建、改造旧企业等，盈亏共担，按投资比例分成的联营。例如盐步镇横江农民黄家杰1985年6月承包了村办企业宝丽灯饰厂后，再与省和县外贸工艺进出口公司联营（以后企业改为公司），省方投资135万元，县方投资15万元，黄家杰担任经理，联营的省、县方派人担任副经理。企业的供销、会计、出纳、仓管均由黄家杰委任。1987年该厂产值800万元，纯利75万元。（3）以个体企业为基础，镇村企业帮助解决原材料和疏通购销渠道的“松散联营”。如

西樵镇发动10个村的村级企业与个体纺织企业联营，由村企业负责组织原材料和沟通销售渠道，利润分成集体占二成，个体占八成。（4）由镇村集体企业负责贷款，向个体、联合体企业投资参股，贷款利息由联营企业负担，利润双方协商比例分成的联营。这种形式主要是帮助个体、联合体企业解决资金不足的困难，以扩大再生产。

## (二)

南海县镇村出现集体企业与个体企业联营的原因主要是：

(1) 随着个体经济的发展，一些先富起来的“能人”，已不满足当万元户、10万元户，而是向着100万元户的目标奋斗。他们有扩大投资的强烈欲望，但碰到资金、厂房、场地不足，需要寻找合作伙伴。国营企业体制僵化，条条框框和关卡多，难以合作，镇村集体企业比较灵活，是他们的最佳选择。

(2) 随着投资增大，风险也增大，个体企业一般希望有棵“大树”倚傍，于是，他们就积极争取与镇村企业联营，宁可利益分沾，以便共担风险。

(3) 个体企业与集体联营后，名气大，信誉高，开展业务方便。按规定，个体企业只能刻一个厂章，没有财务章，很难与国营、集体企业财务往来；同时，不能使用法人证明书与国营、集体企业签定合同；在银行贷款余额只能在一万元以下等，限制诸多。与集体联营后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同时还可以获取低息贷款的好处（私人贷款年利息9.6厘，集体贷款7.2厘）。

(4) 可以获得减免企业税收的好处。按有关规定，个体企业一般不能减免税收。而集体新办企业或横向联营企业，头三年有申请享受减免企业税收的优惠政策，减免部分金额全部归集体所得，而目前大多数联营企业的集体一方普遍采取了让利的办法，将减免的税收与个体共同占有（即打入联营企业生产基金），因而个体企业有同集体企业联营的积极性。

(5) 一些规模较大，雇工较多的私人企业仍然存有怕政策变的心理，怕被当成新的剥削阶级，怕将来有朝一日限制私人企业发展，因而想找“靠山”。

## (三)

对镇村集体企业与个体企业联营这种新的经济方式究竟如何看待？多数企业联营后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作出了回答：

(1) 有利于突破传统的全民所有、集体所有和个体所有的形式格局，探索新的所有制形式。私人资本渗入了集体企业，使企业的经营与经营者的利益息息相关，因而能够充分发挥经营者当家作主的精神，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例如官窑镇经济发展总公司与个体联营的“福利金属厂”，工人只有155人，1987年产值1000万元，利润34万元，人均创利2100多元，全员劳动生产率为6400元。而该镇规模较大，效益较好的中美玩具厂1987年人均创利600元，全员劳动生产率为3700元。二者相比，前者人均年创利高出3倍，全员劳动生产率高出78%。桂城镇北约村与个体户联营的建筑机械厂，1987年该厂总收入370万元，比联营前的1986年总收入200万元，增长85%，纯利润30万元，比1986年纯利润12万元，增长150%。

(2) 有利于引导个体经济向集体经济靠拢，使相当一部分规模较大、雇工较多的

个体企业逐步成为集体经济的延伸和补充。一方面，发展和壮大了集体经济，另一方面，也便于加强镇村一级政府对个体经济的管理。

(3) 集体与个体联营后，可以互为补充。镇村个体工业大户，大多数是经营方面的“能人”。他们有技术专长和业务门路，所缺的是场地、资金和企业的知名度。而集体的长处正好可以弥补个体的短处；而集体企业也因个体“能人”的融入，充实了经营管理力量。联营后双方的优势结合，扬长避短，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大沥镇有些群众形容个体与集体联营企业是“能人找靠山，集体找能人，两方一合作，生产上台阶”。目前镇村集体企业中，一般都十分缺乏经营和专业技术人才，个体“能人”与集体合作，并承担联营企业的主要经营责任，应该说是充分挖掘人才潜力的好办法之一。

(4) 集体与个体联营之后，充分发挥集体经济的引导作用，健全完善了管理，使一些参加联营的个体工业大户在守法经营方面普遍有所进步。

#### (四)

镇村集体企业与个体企业联营，是改革、开放、搞活带来的一种新事物，是发展镇村经济的新途径，具有较强的生命力。然而，由于它出现的时间还比较短，也存在一些不完善的地方和问题。特别是社会管理方面，对这一新事物还来不及制定相应的法规，无论在扶持和管理上均有待完善。我们认为，当前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需要研究解决。

(1) 要加强对这一新事物的调查研究，特别是对于目前联营企业中存在的一些新问题，如一些联营企业由于过分依赖个体，一方面产生联合双方在经营中地位不平等，未能达到集体经济成分的主导作用；个体经济通过联营，均沾了国家对集体企业的税收优惠（减免）部分的利益，等等。都是值得进一步研究并加以明确的。

(2) 在国家制订《私人企业法》之后，应加强宣传与贯彻，政府的基层组织也应相应制订一些符合当地实际的规定，以明确诸如集体企业同个体企业联营的政策；明确联营企业中私人资本以及再投入部分新增的固定资产所有权属于投资者个人，以解决个体投资者怕政策变的思想，以利于鼓励个体再投资扩大生产，促进联营企业的发展。

(3) 要加强对联营企业的领导。规模较大、雇工较多的联营企业，要逐步建立和健全董事会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联营双方应派出代表交叉任职（即集体方任董事长，私方任厂长；集体方任出纳，私方任会计等）。企业一切开支要经会计账，重大问题由董事会决定和审批，厂长执行董事会的决定。双方以平等互利的原则，共同管理好企业，以减少失误和漏洞，有利于联营企业的巩固和健康发展。

(4) 要加强对联营企业合同的指导和监督。不少联营企业签定的合同不够具体，且大多数未经公证部门监证，在执行过程中产生异议。建议乡镇企业管理部门会同司法部门，加强对这类横向联营企业的合同指导和监督，保护合同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作者单位：中共南海县委办、本社编辑部

责任编辑：石成



〔苏〕B·布洛夫

李尚德 编译

## 巨大的变化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进行的那次关于这个题目的座谈，至今记忆犹新。参加这次座谈会的有该所副所长杜肖（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李元立、李成勋、韩佳辰和其他研究人员。他们认为，在国外，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理解往往不正确，有人竟以为，这是对社会主义普遍原则的抛弃。他们说，在中国，谈论“特色”胜于谈论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规律。这是因为，中国乃至其他一些国家，过去在实施共同性原则时对一些特殊情况考虑甚少。然而，中国同事们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对他们来说是不可动摇的。

中国共产党从来就不拒绝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经验的研究，而这种研究的出发点，决不是机械地摹仿。中国学者注意总结过去的教训，并对经济、政治问题作出新的判断。在经济领域，他们抛弃行政干预，避免行政干预危及经济手段。现在，在中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提法很流行，它是指，在实践中全面发展商品货币关系，靠市场调节经济过程，完善分配制度，以“一些人先富起来”的口号代替平均主义，用邓小平的话讲，就是在20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到21世纪中叶，中国谋求接近世界发达国家现在的水平。

参加座谈会的人强调，离开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是不可思议的。当前，在政治体制方面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废除了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终身制，克服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实行了集体领导，改变了过分集中的管理；扩大了地方政权组织的权利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实行党政分开，保障公民的合法权

中断了漫长的26年交往之后，来到我曾经呆过的中国，不由自主地把注意力集中到这个国家所发生的变化上。中国在很多方面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城市的建筑装饰和人们的外貌，社会办事原则和国民经济的管理，居民的生活模式，政治制度和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教育体制和道德价值。

所有的多方面的变化，都是在农村和城市推行大规模改革的直接结果。这些改革，同探求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或者如中国的流行说法，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相联系着。在中国社会科学院

利。杜肖在座谈结束时说，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完善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观点还未形成，现在，只是对适合于社会主义建设现实条件的方法、形式的探讨。

在座谈过程中，不止一次地提及“毛泽东思想”问题。围绕这个题目，我们同北京大学哲学系毛泽东思想教研室主任许全兴谈得最多。如何评价毛泽东本人，正如中国同事们指出的，需要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一方面毛泽东在准备和领导革命的过程中有卓越的功勋，另一方面也存在严重的错误（1986年6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对此作出了权威结论）。许全兴认为，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看法有正确的思想，也有教条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的观点。许全兴强调，邓小平的功绩之一，在于既坚持了毛泽东思想，又批评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以及与崇拜相关的个人迷信。

国内的新情况产生新问题，需要对这些问题进行理论思维。最近几年，中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对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出现的新矛盾的社会属性，及其解决的道路和方法的研究，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制定了整个研究方向——“社会主义辩证法”，发表了不少论文和专著，召开了学术讨论会和座谈会，在一些大学里还增设了社会主义辩证法专题课。广东省是探讨这一问题的中心之一。在张江明教授（过去在党内任要职，现在是省哲学学会的负责人）的主持下，一些研究工作者组成了一个不大的团体，这个团体在1984年——1986年间出版了三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的论文集。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

史研究所的刘嵘、高齐云和其他广州哲学工作者也从事这个课题的研究。由他们发起，从1988年起，已经召开了三次全国性学术研讨会，专门讨论现阶段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最迫切的问题。同张江明、刘嵘、高齐云的座谈使我能够理出中国学者对“社会主义辩证法”问题的一些观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认为，对抗性矛盾并不带有普遍性特征，这类矛盾只涉及对社会主义敌人的关系上，而那些与国家资本主义、合资企业、个体经济的存在以及“一国两制”方针的实施相联系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刘嵘、高齐云强调了个体经济在现阶段中国存在的必要性：个体经济推动经济发展，促进劳动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他们指出，在中国学者中有这么一种意见，不能把社会主义条件下和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雇佣劳动划等号。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们有选择的权利，——作为被雇佣者可以提供也可以不提供服务。除此之外，他们还有改换工作地点的权利。最后，国家能够限制私营企业的雇工数目以及劳动的方式。如果企业主亲自参加生产，他就不是一个剥削者。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具有这样的观点。一部分学者指出，如果雇工数超出了规定数，那么，这种雇佣劳动就具有剥削的性质。

最近几年，中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可以广泛地接触国外的信息情报。对外关系上的“开放政策”，不仅引进了国外的商品，而且出现了对人生理解的各种观点。正象现在在中国的说法，透过打开的窗户，同清新的空气一起，也会混进乌烟瘴气。为此，中国共产党十二届六中全会（1986年9月召开），制定《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

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决议指出：“人们的思想意识、精神状态发生深刻的变化，同时也对精神文明建设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能不能适应这种要求，形成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面改革的舆论力量、价值观念、文化条件和社会环境，有力地抵制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腐朽思想，防止种种迷失方向的危险，振奋起全国各族人民的巨大热情和创造精神，用几代人的努力建设起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重大考验。”

当前，在中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已经恢复。与中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座谈，常常听他们讲：“我们在探索”，“我们在寻求”。在科学研究中，大家对社会主义建设、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等方面的迫切问题，可以进行广泛的、自由的、创新的讨论，举行了大量的学术讨论会、座谈会。过去沉痛的教训证明这种做法是有益的。

我特别想了解中国当代哲学思想的新倾向。在哲学范畴的丰富方面，在对当代自然科学的把握方面，在对西方哲学及其合理因素的评价方面，在对国内哲学遗产的科学整理方面，是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些远不是在中国哲学杂志上讨论的全部问题。

与大学哲学课教学改革的必要性和撰写新的教科书的需求相联系，一个研究变革“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问题提了出来。许多中国哲学工作者，对传统的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划分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大块并不满意，开始尝试撰写首先在结构上新颖的新的教科书。在这方面，以吉林大学哲学系系主任高清海教授为首

的一个学术集体起了开路先锋的作用。高清海教授的集体用了几年的时间撰写带有探索性的新的教科书，在这本教科书中那种传统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划分方法不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诸问题的研究贯穿于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之中。中国的许多哲学工作者并不赞同吉林省学者们的观点。在同高清海教授的漫谈中，他不止一次地谈到根据科技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认识进程所提出的新问题，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必要性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本身需要不断深化其原理，以至每一个哲学工作者对此都负有责任。

今天，在从事学术和艺术工作的中国知识分子中间，那些思想解放的作家和学者受到了很高的评价。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研究员李泽厚就是这类哲学学者中的一位。我同他交谈过两次，主要谈论在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中最受欢迎的题目——中西文化关系问题。当前，在中国，哲学的和文化学的比较学处在一种独特的喧闹中。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可避免地提出一系列问题，要求认真地进行理论思考：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是什么？有可能利用它的某些方面振兴国家吗？在两种文化之间有没有共同之点？（比如，在生活方式、行为规范、思维准则、个体构成等方面）或者它们之中存在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最后，中国文化在人类文明中处于什么地位？对所有这些问题的看法是多种多样的。确有这么一些学者尤其在青年之中，对一切传统文化取否定态度，认为在传统文化中找不到任何积极的东西。与这种观点相对立的是以“新儒学”为基础的一种现

代思潮，他们把孔子学说中的积极的東西与西方科学的成就相渗透。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最近几年，日本、新加坡、台湾、香港、南朝鲜迅猛的经济发展，无不与他们在社会生活中贯彻孔学有关。李泽厚持第三种观点：同意中西文化相互渗透。

在中西文化关系问题方面，人们对研究19世纪后半期和20世纪初的国内哲学和文化特别感兴趣，当时正出现了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相互影响和渗透。现在，对一批著名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诸多观点开始重新评价。我曾有幸与他们之中的两位年迈的中国哲学教授冯友兰、梁漱溟见面，他们都已超过90岁。在20年代，梁漱溟曾为中国传统文化辩护，对孔学尤其维护。他强调，东方文明优越于西方。人民革命胜利以后，他没有离开中国，这与另一批文化活动家大不相同（刚好，他应邀作为来宾列席中共不久前召开的十三次代表大会）。我同他谈了两个小时，话题是孔学和佛教。我是第一个拜访他的苏联哲学工作者。分手时，梁漱溟把他1984年出版的一部著作赠送给我，这是近35年他出版的第一部书。这部著作论述了人的心理和道德的相互关系，书中引用了普列汉诺夫的学说。

在中国，广泛开展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计划出版8卷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我曾不止一次地得以会见这部著作的主编黄楠森教授。黄楠森对列宁哲学遗产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著有《哲学笔记与辩证法》一书。黄楠森和他的同事庄福龄、陈志尚、余其铨、王东及其他人，确实花了很大的气力，在中国哲学科学中确立列宁辩证法研究的基本方向，强调实

事求是地反映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及其在发展过程中的复杂性、矛盾性的重要性。黄楠森说，不应该因为后期犯有理论错误以及政治上不坚定就否定某些哲学家在发展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贡献。

我还想起同武汉大学教授王荫庭的一次会面。他是中国研究普列汉诺夫著作的学者。当我开玩笑地对他讲，也许，在你的图书馆里不会有最近出版的B·П·奥西波夫的丛书《炽热的革命家》中的《雪莲花》一书吧（第一本使普列汉诺夫形象艺术具体化的书）？王荫庭立即从一个书架里拿出这本书的复印本。的确，中国学者对普列汉诺夫的形象是深爱着。不久，将出版一本王荫庭多年研究的成果——《俄罗斯马克思主义著作研究》。书中作者写出了与个别苏联学者不同的观点。他认为，苏联学者对普列汉诺夫在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历史作用评价不足，而从50年代中期的评价看来，苏联学者开始注意克服对普列汉诺夫著作研究的简单化的做法。

中国哲学工作者对苏联哲学科学的状况以及新的趋势、新出版的著作怀有兴趣。在同他们座谈中，我发觉，他们正确地介绍了苏联哲学界几次论战的内容，以及各位哲学家的观点。他们对苏联哲学的研究兴趣不只是“学院式”的，而是具有实践特征。比如，北京大学青年教师王东写道：“从正反两个方面全面研究苏联哲学的经验，有助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丰富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毫无疑问，这是对的。

编译者单位：中山大学哲学系  
责任编辑：范英

## 美国系统工程学者依·拉兹洛 谈中国改革与哲学

本刊记者 张硕城 陶原珂

今年五、六月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著名教授、系统工程世界研究组织领导人之一依·拉兹洛(E·Laszlo)先生来我国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学术访问，并就“系统哲学”、“感觉与认识的控制论”、“系统进化的自然辩证法”、“世界系统经济”等十几个课题发表了演讲，在我国学术界引起较大反响。我们借拉兹洛教授在中山大学演讲之暇，采访了他，请他谈了对目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哲学的印象。

记者：作为《学术研究》杂志的记者，我们很高兴有机会听到您的理论演讲。《学术研究》是面向世界的杂志，因此，除了刊登纯理论的研究成果之外，还需要面对国内国际上的许多现实问题。听说您除了研究系统工程之外，还研究国际经济尤其是区域经济分工问题，我们很想听到您对中国现时发展的看法。

拉：我是第一次访问贵国，只在中国访问了几个星期，所以只能够谈一个初步的印象。

我看到中国到处在建房修马路，这些都只是表面现象。如果只用这些外部的表象来说明中国的发展，那是一种幼稚的眼光。中国目前发生的一切，不仅仅是一般

意义上的发展和改变，而是一种内在形态结构的变革，是一种发自制度深层的巨大而迅速的突变。中国刚刚渡过了一个混乱的形态，由极端动荡转入了稳定，跨过了这一转折的转折点，用我们的术语来说，就是刚刚跨过了一个替代稳定项，进入了一个新的稳定状态。现在的一切好的变化，使我想起你们的民族的先驱者孙逸仙先生，孙逸仙先生生前所提出的一些构想今天由你们来实现了。中国人的创造力，在漫长的封建统治中，一直是受到压抑的，现在真正得到了自我发展的机会，包括你们的民族和每一个个体的中国人。

由于实行了开放改革，使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了同外来文化相结合的机会。在这个开放的时代，如果有谁仍用原来的旧的观念看待世界，那他一定是没有前途的。旧观念无法实现现代化。目前中国人的思想意识也在发生变革，这种改变也可以说是带本质性的，是一种世界观的改变。人的思想变革也属于中国这场重大的社会变革的一部分。

这些就是我所得到的最重要的印象。照这样下去，这种内在形态的结构性的变化，一定能把中国带到世界文明的前列。中国人口占了人类的五分之一，所以我对



中国的发展将会给予人类未来的巨大贡献，抱有很乐观的态度。外国人很应该帮助中国加快这场改革，这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人类都是有益的。

**记者：**您作为一个系统哲学家，是否关注到当前中国哲学界的发展？特别是处于开放改革中，用您的话说，就是一次内在形态改变过程中，您认为中国哲学将会如何发展呢？

**拉：**我感觉，中国社会科学家，尤其是哲学家，他们的任务是很重的，因为他们要帮助人民加速观念的改变。他们应该是这场改革的思想观念上的先驱者。

据我所知，一批在中国哲学界处于领先地位的学者已经开始认识到系统哲学的重要性。这是我对中国哲学的发展前景表示乐观的原因之一。系统哲学是属于现代的哲学，通过系统哲学，可以使人们认识中国改革的系统性。中国的同行常提到马克思，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承认一点，就是我们不仅要解释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按我的理解，现代系统哲学与马克思的哲学是相通的，系统哲学就是力图使马克思主义关于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关系的论断得以实现。如果马克思活到现在，他也一定会用系统哲学来思考问题，研究当代社会，并发展他的理论。所以我认为，系统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的一种新形态。马克思认为，哲学应该是根据全人类最新的科学成果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系统哲学正是突出地体现着这一点，它是科学发展到一定阶段即现当代的产物。

**记者：**再提一个问题。我们从自身所处的环境直觉地感到，中国哲学与西方哲

学，无论是在它们的传统上还是在今天，从来都存在着差异。但根据世界发展日益趋同的说法，世界经济生活不断走向趋同和一体化。您是否认为，这种趋势也将反映到人们的思维领域，中西哲学是否也将向趋同方向发展？

**拉：**应当承认，中国哲学同西方哲学从来就有较大差异，不，应该说不只是中国，而且还包括其它东方民族，与西方在哲学上都存在明显差异。西方向来是实证主义和分析哲学占统治地位，这是一个历史过程，现在，在西方，实证主义、分析哲学也已经走下坡路，接近尾声了。近20年来，西方的哲学思想出现了综合化和整体化的新趋势，系统哲学的兴起正是这种哲学发展趋势的体现。我刚才说过，系统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西方的当代形态，而中国目前的哲学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的，加上中国古典哲学的优秀传统中就表现出综合化和整体化特点，因此，中西方哲学应该而且很有可能在系统哲学中接近。这样，东西方哲学家将有可能用相同或相近似的概念系统和概念范式进行思维和对话。系统思维的范式，既产生于当代科学，又蕴藏于中国古老的传统哲学之中，都是要把世界当作整体来考虑，因此，中国在发展系统哲学方面是有独特的潜力和前景的。

我们的世界生活正在趋同，我们的世界生活将逐步走向和平与和谐的合作，我们很有必要把全世界当作一个整体来考虑。但是，我并不认为我们会变得完全一致，东西方的文化差异还将长期保留，它们各自的优点和长处也将长期保留。我们没有必要在 any 一点上都完全一样。但我

相信，我们可以达到用同样的思维方式——系统哲学来进行思维。有一个很典型的事例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一向以来，苏美两国在许多根本问题上有着最大的分歧和对立，但恰恰是这两个国家的哲学家却不约而同地兴起了系统哲学的革命。所以我认为，系统哲学是可以被世界所接受的一种普遍的思维方式，它可以在东西方哲学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我今天对中国的

改革和发展的一些看法，也是用系统思维去观察去认识的，我相信这就是我们之间对话和相互理解的哲学基础。

记者：但愿如此，谢谢！

拉：谢谢，请转达我对贵刊读者的美好祝愿！

（附：依·拉兹洛教授为本刊及读者的题辞）

To the Readers of "Academic Record"  
From Ervin Laszlo

题辞译文：

### 致《学术研究》的读者

中国最巨大的能源是她的人。对此巨大能源的开发有赖于中国的领导人和教育者。没有一个富于创造性的开放的和富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民，再好的现代化计划也是注定要失败的。经济的发展和人的创造性、开放性及社会责任感必须携手并进。

由于中国对人的发展的宏伟计划的实施，需要通过目前对教育制度的改革来实现，是活跃在大中小学以及城乡所有生活领域的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责任，因此我很荣幸有此机会在《学术研究》发表我的见解，为它的读者带来一些人类新思想的有益的信息。

E·拉兹洛

China's greatest resource is her people.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great resource is entrusted to China's leaders and educators. Without a creative, open, and socially responsible people, <sup>even</sup> the best plan of modernization is doomed to failur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creativity, openness,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must go hand in hand.

Because the implementation of China's great plans for human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ongoing reform of the education system is vested in philosophers and social scientists active in schools, universities, and in all spheres of life in cities and villages, I am honoured to have this opportunity of publishing my ideas in "Academic Record," and bringing to its readers some useful information on the New Goals for Mankind. Ervin Laszlo

被称为“军火大王”，又是瑞典诺贝尔奖金设立者的阿尔弗雷德·诺贝尔，是一个集各种矛盾于一身的人物，有些描绘他生平的文章，直截了当称之为“矛盾人物诺贝尔”。

这个人其貌不扬，面无生气，身材矮小，然而却又充满了自信，还喜欢调侃别人。

他研究炸药的时候，有一次实验室爆炸，炸死了五个人，包括他的胞弟鲁道维格，他的父亲老诺贝尔也受了重伤。但是诺贝尔却置自己的生死于不顾，继续研究，在又一次炸药大爆炸中，他被炸得鲜血淋漓，却在浓烟弥漫中狂跳呼喊道：“我成功了！我成功了！”

他因为发明和经营炸药发了大财，但是终其一生，却没有度过怎样豪奢的生活，并且一辈子也没有结婚。

他聪明透顶（不然就不会在炸药的研究和经营上，获得那样大的成功，并且想出设立诺贝尔奖金这样既造福后人，又使自己名垂久远的绝招了），但是对自己文学素养的拙劣却毫无自知之明，晚年竟致力于写诗歌和剧本，自然写出的并不是什么传世之作。有一次我见到一位瑞典学

者，问起这件事，那位学者老实不客气地说：“是的，但那是很幼稚的作品。”

而最大的矛盾，毋宁说，是他一方面当军火大王，一方面又设立和平奖金，声明要把奖金授予“为促进国家之间的友谊，确保取消或削减现役部队，以及建立和普及和平会议作出最有效工作的人。”诺贝尔1896年底死于书桌旁的时候，书桌上一大堆新式武器的设计方案底下，就放着他倾其财产设立和平和科学奖金的遗嘱。因此，我们不能认为那是闹着玩的，或者仅仅是装点门面，做做样子。

这就是我阅读有关诺贝尔的资料所获得的综合印象。

记得有一位英国人叫做安德鲁·伊瓦特写的有关诺贝尔的文章，还谈到了这么一件事：

诺贝尔晚年，见到早年曾经担任过自己的秘书，为他所深深倾慕，但已与他人结婚的伯萨小姐（伯萨这时成了热心的和平主义者，曾经写过一本风靡欧洲的反战的书，叫做《放下武器》）的时候，两个人常常探讨维护和平的问题。诺贝尔当时津津乐道的一项设想是：他要“发明一种具有大规模毁灭性的可怕的武器来杜绝战争”。他的这项设想受到伯萨的驳斥，甚至当时就被她推翻了。热心和平事业的伯萨，在诺贝尔死后，是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金的。

诺贝尔的设想：“具有大规模毁灭性的武器足以杜绝战争。”乍听起来，只是痴人说梦式的呓语。但是在诺贝尔逝世将近一百年的今天，在广岛和长崎曾被投掷过原子弹，核子武器越发展越厉害的今天，我

们回顾历史和面对现实，应该说：这种乍听起来，仿佛是梦呓似的理论，客观上可能并非全然荒谬，它也可能是科学的预见。出自那么一个集矛盾于一身的人物古怪脑子里的观念，可能是荒诞的，也可能是真知灼见。

诺贝尔生前自然并没有发明一种超过火药的“大规模毁灭性的武器”，他也无从知道原子弹、氢弹、核子战争是怎么一回事。但是核武器的发明却的确是在全人类面前出现了一种空前的“大规模毁灭性的武器”。这种武器使作战双方都有同归于尽的危险。就是“战争狂人”对此也不得多作点考虑。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现在，常规武器战争虽然是在各地连绵不断的，但是还没有哪个战争狂人敢于发动核战争。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间距离是23年；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现在，时间已经过去43年，应该说，现在尽管世界仍有不少地方火光熊熊和冒着浓烟，但是世界大战迫在眉睫的征兆并没有出现。尽管美苏关于裁减核武器的谈判所达成的协议成就非常有限，但有一种什么力量迫使他们非得时常坐下来谈判不可，这就说明他们双方都不是无所顾忌的。它从又一个侧面，说明诺贝尔当年的设想并非纯然荒诞无稽。

苏联的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出版了他的新著《改革与新思维》，很有趣，里面有些观点，竟是和当年诺贝尔的设想不谋而合的。请看书中的这么两小段言论：

“一旦爆发核战争，一切生灵都将从地球上消失。人类将被消灭多次，这一从逻辑上讲是不可能的事在技术上已是可能的了。现在的核武器库给地球储备了能够把

每个居民周围的大片土地烧为灰烬的弹药。目前一艘战略潜艇拥有的毁灭性力量相当于几个第二次世界大战。而这样的潜艇竟有许多艘！”

“在人口非常稠密和高度都市化的情况下，欧洲的武器——核武器和其它武器——过于饱和。今天，只说欧洲是‘火药库’已经不够了。用最现代化的，不断完善的技术装备武装起来的最强大的军事集团，在这里相互对峙着。这里集中了几千枚核弹头，虽然总共只要几十枚就足以使欧洲大地变成火的地狱……是为了分裂欧洲继续各搞各的一体化呢，还是为了东欧和西欧的幸福，以及为了世界其余部分的利益，把这两个一体化进程结合起来呢？”根据这样的观点，戈尔巴乔夫大声疾呼：“不要对抗，而要合作。”

引述这些对于核战争状况描写的言语，决不会被认为是渲染“核恐怖”吧！按照事物的本来面貌来认识事物，应该是一切辩证唯物主义者的本色。

戈尔巴乔夫和诺贝尔，在这件事上观点这样相同；共产主义者向资本主义世界呼吁“不要对抗，而要合作。”本着旧的观点是很难解释的，但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这倒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听到一个用旧的观点来衡量，觉得难以接受的理论就跳起来是大可不必的。时代在变，我们的观念也应当不断更新。

对事物的发展，认为有多种可能，比认为只有一种可能要科学一些。对于新的世界大战是否发生这一问题的看法，我想也应该这样。认为一定会发生是绝对化，认为一定不会发生也是绝对化。认为有两种可能，而努力去争取有利于人民的那种

可能，岂不更好？两种可能性都存在，但是诺贝尔的设想，戈尔巴乔夫的呼吁，我觉得：毋宁说要更加现实一些。

我国过去在绝对化观念的指引下走了许多冤枉路：沿海地区不敢致力经济建设，大量的钱财投入三线建设和“深挖洞”的活动中去。我们现在，就算必须警惕不要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话，正视大量事物都存在两种可能性，掌握辩证观点，从“绝对化”的死胡同中退出来，总是比较高明的。我们很高兴从当前政治活动家的言行中，看到了这类高明的言论和措施。

1988.6.广州

## “余热”小议

杨浩泉

自从普遍实行了干部、知识分子的退休、离休制度之后，在社会上便风行了一个新词，叫做“余热”，并美其事为“余热生辉”。

“余”者，剩也。常用的“落日余辉”，“不遗余力”，“留有余地”，“余波未平”，“余烬欲熄”，……。这等等的“余”字，都带有残存、遗留之意。不言而喻，“余热”者，指的就是这些离退休干部拥有的热力、热能、热劲，经过了多年的消耗，至今所剩的部分。这个新词一时传为“佳话”，似乎也是被认可了的。自然干部到了规定的年龄，从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退下来，让位给比自己年轻的人，这完全合乎新陈代

谢的规律，是实现干部四化的合理措施；对长期沿袭下来的颇有点封建味道的“干部终身制”来说，更不失为一种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改革。可谓合情合理。

但是，人们的“热”，一般是不以年龄为反比：年事越高，热能越低；更不以在不在位为标志：在位热高，离退热低。现代科学研究证明，人的热能，一般取决于脑细胞的功能。脑细胞的功能与脑细胞的代谢活动程度，大脑对周围事物的反映程度，有着密切关系。所以，有“脑子越用越灵”之说。那种笼统地认为老年人的脑细胞有退化现象的观念是陈旧的。有人用脑扫描直接鉴定大脑的代谢情况，研究年龄从21岁到83岁的人，发现健康老人的大脑，其活跃与效率，同健康青年一样。只有多病的老人才有大脑退化的现象。

认为一切离退休的干部所能发挥的只有“余热”，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世界上70岁以上的总理或国家领导人为数不少。就算是下台了，许多都继续从事社会活动。英国首相丘吉尔退位了，成为律师事务所的主持人，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落选后，当了美国著名大学的教授……我们经常接触的离退休干部中，也有不少肩上挑的担子，比他们原来挑的担子更重，所起的作用更大，他们身上释放的“热量”不能说是“余热”吧！

《中国老年》记者关于重庆退休工程师协会8年兴旺不衰的报道，是很有说服力的。“退协”是在重庆山城的“四朵金花”：（另外三朵金花是：高教老协、退休教师协会和退休医工协会）之一。参加“退协”的会员有787人，平均年龄65岁，最高龄为98岁。可以称得上是老龄机构。但是，从



这里吐出的“热能”是很令人吃惊的：它先后为900多个单位提供了1300多项科研咨询服务，签订了512项技术合同，为重庆的经济腾飞，为老、少、边、穷地区的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记者称他们“八百英雄个个都有用武之地”。这哪是什么“余热”，简直是一种“狂”热。这篇报道的标题就叫《老夫也发少年狂》。多有深意的标题！难怪一个日本代表团访问了“退协”之后，感叹说：“我们觉得你们为国家服务积累了很多经验，你们报效祖国的爱国心，给我们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我们要使‘四朵金花’在日本广为流传”。

美国《行列》周刊有一篇以《60岁以后成功的秘诀》的文章，介绍了许多60岁以后才获得了成功的企业家，其中就有个73岁的丑小鸭汽车租赁公司的总经理汤姆·达克。他63岁才开始建立这家公司，现在已经拥有资产8450万美元。文章认为：想干一番事业，是大多数60岁以上的企业家共有的特点。……事实上，全国范围的60岁以上企业经营网正在逐步形成。据这篇

文章报道：联邦政府也开始对老年企业经营家产生兴趣，最近还通过一项法案将放宽在社会保险金方面的收入限制，以鼓励更多的老人去工作。这些老年人放射的显然不是所谓的“余热”。

据预测，到本世纪末，我国老年人口（满60岁者）将达到1.3亿，约占总人口的10.5%，从而进入了老年型的国家。这是我国的科学、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社会进步的象征。存在的问题是：如何从实际出发，有效地组织这些从一定的岗位退出来的老年人，重新投入社会，使他们按照自己的健康、能力、专长和兴趣，各得其所地继续发挥作用，作出贡献。说老年人是全社会的财富，主要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不如此，怎么成财富呢？

我以为，“余热”的概念，在内涵上就带有消极因素，不论如何“生辉”，也不过“余热”而已！所以，这个新词还是不用为好。

“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著花”。这才是老年人的写照。

## · 学术动态 ·

# 关于所有制、产权与企业改革讨论会综述

王定坤 金 建

1988年5月18—21日在上海财经大学举行了全国第三届财经院校研究生经济理论讨论会。会议比较集中地讨论了所有制、产权与企业改革问题。

### 1. 所有制改革的方向和途径

与会代表比较一致的意见是，我国现阶段的所有制形式已到非改不可的地步，我国经济改革的支撑点在于所有制改革。但对改革的方向和途径却各抒己见。

有的同志认为，我国经济生活中存在着两对

尖锐的矛盾，即高层次的公有制经济形式与低层次的生产力水平的矛盾、供给不足和需求过旺的矛盾，并且前一对矛盾的妥善解决是解决后一对矛盾的前提。因而解决高层次的公有制经济形式与低层次的生产力水平的矛盾，可以从降低公有制经济形式入手，使之与低层次生产力水平相适应。其基本方向可以是：属于基础设施部门的企业单位仍实行国有制，但管理方式要改革，可实行国有民营制，而对那些非基础设施部门主要指制造业、商业等领域，则应彻底实行私有化。只有把一切直接与生产社会财富的有关部门私有化，才能充分调动一切有生产经营才能的社会成员的积极性。

有的同志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本身就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全面经济关系未形成，因而所有制结构也不可能以公有制为主体。大胆地承认社会主义的全面经济关系在初级阶段尚未形成，突破以“公有制为基础”这一人为限制，对解决理论上的矛盾，探索我国现阶段商品经济运行机制都是大有裨益的。其理论依据在于：商品经济运行以产权独立与产权转移为前提，而公有制本身与产权独立与产权转移是对立的。因而，在公有制基础上发展商品经济，无法在理论与实践上走出矛盾的困境。

有的同志则具体地指出，我国目前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改变公有制：①使部分公有部门私有化，如农村土地私有化，必能使土地合理地、有效地使用；②区域私有化，如海南可率先实行所谓的“资本主义”。

和上述观点相对立的意见是：传统的国有制模式虽然已丧失了生命力，但并不意味着公有制必须私有化。国家所有制可以转向企业所有制的模式，如股份制、合营制等，也可以采取承包、租赁、国有私营制等形式。而有的同志则认为，我国的所有制改革必须走两条路：一是大力发展私营经济，扩大私营企业所占比重；一是改造现有国营企业，使目前的“官僚所有制”成为名符其实的国有制。

## 2. 产权与产权转移问题

参加会议的很多同志认为，随着企业改革的深化，企业产权转让的问题已不可避免（如企业承包企业、租赁再租赁、企业买企业、企业兼并等），因而有必要明确产权的基本含义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的产权转移问题。

有的同志认为，所谓产权，有两个层次上的含义，一是财产所有权，即由法律规定的、有法定形式的、主体对客体的最高支配权。这是原本意义上的产权。二是财产的使用权。产权转移也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所有权的转移和使用权的转移。由于商品经济的内在要求，生产要素需要自我流动，资源配置需要优化组合，因而产权转移是商品经济的固有特征，是本来就存在的。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产权转移，既包括所有权的转移，也包括使用权的转移。但对我国现阶段的全民所有制企业相互之间的产权转移而言，则主要是属于第二个层次（即财产使用权的转移）含义方面的问题。

有的同志认为，我国现阶段企业产权转移的最大困难在于：企业财产关系模糊，产权边界不清。要使企业相互之间的产权转移得到顺利实现，其关键仍在于明确企业产权关系，划清企业产权边界，确定企业产权转移的数量界限。因而，有的同志提出了以契约形式来划清国家与企业之间的产权关系，有的同志则主张通过①转让制、②转卖制、③租赁承包制、④信贷制的形式来解决企业产权的转移问题；而有的同志则认为，发展法人所有制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是改革产权制度，实现产权转移的有效途径。

还有的同志认为，产权和政权是一对连体儿。政权的分立以产权的分散为基础，产权的分散以政权的分立为保证。非集中化是当今世界一大趋势，因而产权的分散化也是所有制形式变化的趋势之一。

## 3. 企业改革的方向和思路

对于承包制，有的同志认为，承包制是在利改税失败后出笼的，因而它带有某种牵强附会的性质，企图绕过最为敏感的价格体制。推行承包制可能使本来松弛的行政管理恢复，企业改革因此会走到老路上去。因而承包制仅仅是当前深化改革的过渡性措施。但若没有明确的改革目标模式，企业的改革就会失去目标和方向。

有的同志则认为，承包制不是权宜之计，承包制在农村早已存在，只不过是推广而已。1984—1986年3年的改革都局限于让利让税，没有触及企业的经营机制。实行承包制就是为了建立企业的经营机制。而建立企业经营机制的目的就是要使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从而具有自我改造、自我发展的能力。

——对于股份制，有的同志认为是可行的，只不过还要创造宏观条件。就目前而言，有三个方面的条件要具备：①利税改革一定要彻底；②条块分割的局面一定要打破；③劳动力分配制度一定要改革。也有的同志认为股份制的实行缺乏可行性；具体的问题是：①实行股份制的企业必须是盈利性的。而且盈利要较高，盈利不高，经营

不善的大中型企业怎么办？②股份制将股票分为国家股、企业股、个人股三部分，国家股往往占绝对优势，容易造成国家行政干预强化，经营权、所有权绑在一起的问题。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经济学院

责任编辑：黄振荣

·学术动态·

## 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林亚杰

“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于1988年5月26日至28日在广州中山大学举行。来自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武汉、兰州、西安、厦门、长春、郑州等地，香港地区和美国、日本的著名专家以及陈寅恪先生的亲属共七十余人出席了这次讨论会。与会代表向大会提交了四十多篇论文，内容包括陈寅恪的学术成就、治史方法及其所从事研究领域的学术成果，并有部分纪念性论文。

### （一）关于陈寅恪先生的学术成就

一、魏晋南北朝史。陈寅恪先生在研究魏晋南北朝历史时，刻意注重家族门第区域性的分析，为研究这段历史的宗法性开辟了一条道路。陈先生不仅在政治史的研究中取得了不少富有启迪意义的成果，而且在学术史、宗教史的研究中，注意到家族门第关系的影响，从而把这方面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二、隋唐史。陈寅恪先生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两部专著是在隋唐史研究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巨著。陈先生提出的关于“关陇集团”的概念的学术意义非常重大，这一概念的提出，为后学提示了一个宏观地把握西魏、北周、隋代至初唐历史发展基本线索的关键，是引导后学治唐史入门之蹊径，对中外隋唐史学者的研究起了富有启发性的指导作用。

三、蒙古学。陈寅恪先生对蒙古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对《蒙古源流》一书的研究。1930—1931年间，陈先生陆续发表了四篇论文，其中尤以《彭所知论与蒙古源流》（蒙古源流研究之三）一文对该书的源流作了确切的论证，澄清了蒙古史

学界中许多困惑不解的问题。此外，陈先生首先运用了西方汉学家的对音勘同的译名还原法，突破了这一领域中传统的证补和重修正史的老路，使我国蒙古史的研究从30年代开始进入到一个新阶段。

四、敦煌学。“敦煌学”这一名词，是陈寅恪先生于1930年首先提出的。自从敦煌文书发现之后，陈先生身体力行，钻研文书，在佛经、文学、史学方面均作出可贵的贡献，其方法有三：1. 以敦煌经卷证史，用敦煌资料释诗；2. 运用史书记载来解决敦煌资料中提出的问题，以史解经，以史考诗；3. 将佛经典籍与变文故事、变文故事与民俗小说结合起来进行比较研究，考察中国文学的源流变化。

五、突厥学。陈寅恪先生对中国突厥学的直接贡献，并不在于译释突厥碑，而是对突厥史的研究，尤其是对唐帝国与突厥汗国的政治关系史的研究。陈先生摒弃了把突厥史作为隋唐史附属品的陈旧观念，在鞭辟入里的分析中，肯定了“突厥在当时实为东亚之霸主”的地位。对唐与突厥间力量的迅速消长变化，霸权地位的急剧转化，陈先生以“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去解释，表现出卓越的史识。对唐帝国政治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地位的突厥籍和突厥化蕃将，陈先生既揭示其社会基础的演变，又论证了骑射技术和部落组织是蕃将特有的使用价值。

六、藏学。藏学作为一门学问研究，陈寅恪先生是开拓者。1927年，陈先生在《大乘稻芊经随听疏跋》一文中提出西藏人法成是唐代吐蕃沙

门，为吐蕃译经圣人，与唐代声名显赫的玄奘同是沟通东西学术之人，澄清了在唐代佛教史上颇有意义的一个历史人物的身份。陈先生对后来学者从事民族史、边疆史工作有三点启示：1. 重视语文材料；2. 重视当地史料；3. 重视对汉文史料的辨析。陈先生的《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代考》等学术论文成为历史语文学派在藏学研究中的范例，传颂至今。

七、佛学。陈寅恪先生对佛教史的研究主要有四个方面的成就：（1）文字校勘和考证。比勘异同、印证文句是陈先生从事佛教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他以极其丰富的语言学知识，解决了一些中古佛经的误译问题。并力图通过考证来说明社会文化现象。（2）佛教与中古文学。陈先生对中国小说的内容和结构都与佛经故事作比较研究，为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提供了富有启发的方向。（3）佛教与社会文化。陈先生不仅揭示了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的过程，也揭示了一般文化传播的规律。（4）佛教与政治。陈先生在这方面的论述十分精辟，为许多国内外学者所接受。

#### （二）关于陈寅恪先生的治学态度和治史方法

与会代表在发言中强调指出，陈寅恪先生的治学态度十分严谨，他既有开拓性的学术眼光与气魄，又有深邃敏锐的洞察力，他善于从极普通的史料中发现别人所未发现的问题，他对待外来文化的科学态度，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陈先生的治学方法，着眼于大处，用功于细微，善于“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常能以小见大，把微观与宏观两者结合起来。

与会者认为，陈寅恪先生受中国传统的乾嘉考据学的影响甚大，同时他又深受西方近代史学的薰陶，因而能继承中国传统的史学方法，通过考证来说明历史事实及其内在的联系，找出历史发展的全过程。汪荣祖教授认为，陈氏的著作，一如乾嘉诸老的著作，大都属于考证、疏证、笺证、考释之类，但他是中西互观，截长补短，因而能够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楼。陈先生能用一、二十种外语作为治史工具，其成效势必超越前人。

使用比较方法是陈寅恪先生治史方法的又一个特色。《元白诗笺证稿》是比较研究的典范。刘健明博士认为，陈先生掌握多种语言文字，使他在同源异译的比较能突破前人，这方面的对比亦可扩充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更难得的是他能探讨造成异译、比附以至误解的因由，对分析两种文化的接触所产生的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富有启发性的见解。陈先生治史，引用外来观念和方法的最显而易见的，是比较语言学的运用，

倡导诗文证史是陈寅恪先生对史学方法的一大贡献。以诗文证史，扩充了史料的范围，尤其是从两种不同观察的记载进行比较、分析的方法，是治史方法上的一大突破。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历史系**

**责任编辑：凌峰**





# 乐昌县鼓励和 优待外商投资

近年来，乐昌县在改革开放中迅速成为韶关市经济比较发达的县份之一。今日乐昌，林海连绵、风景秀丽、经济兴旺。工业已有纺织、制衣、水泥、机械、食品、饮料、建材、化工、矿冶、轻工、塑料及各种加工业，门类较齐，基础较好；商业、交通、邮电、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等各项事业都在不断发展，城乡建设日新月异，县城已开通自动电话，铁路、公路运输十分方便；有着得天独厚的投资环境和开发条件。

为了充分发挥本县的优势，加快振兴乐昌经济，我们将进一步敞开大门，对外开放，为国外和港澳地区投资者提供更好的投资环境，使外商、港商得到实惠。为此，我们专门制订了《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优惠办法》，主要内容是：

——凡在我县兴办的中外合资、合作企业，合营期在十年以上的，免征所得税两年，尔后再减半征收所得税三年，后五年继续减征所得税百分之三十。

——所需用地优先办理，五年内免收土地使用费；投资开发能源、交通、农、林、牧、采矿等项目，土地使用费也给予优惠。

——外商办企业分得的利润出境时，免缴汇出额的所得税；外商投资企业的产品可自行出口，或委托有出口权的外贸公司代销、经销，其出口收汇归外商投资企业。

——给外资企业优先提供水、电、煤、油、运输和通讯服务。

——外商或港商在乐昌投资办企业，其亲属在城镇入户、就业、建房或购商品房等，都给予优惠；并允许其亲友承包经营，由承包者与外商签订承包合同。

——对“三来一补”项目，其加工费可低于沿海地区；并为外商及其派来的企业管理人员提供交通、住宿、入户及生活服务等方面。

——外商投资企业享有充分的自主权，在生产经营、人事安排等方面，均由董事会讨论决定；在批准的协议范围内，可以自行筹措、运用资金，自行安排生产计划、原材料采购和产品销售；有权聘用和辞退职工，自行确定工资形式、标准及奖励制度，并免交奖金税。

——凡介绍外商为乐昌引进先进设备或投资办企业者，按实际引进总值由企业给予重奖；凡介绍“三来一补”项目者，按合同实收的工缴费总额由企业给予重奖。

乐昌县将张开双臂，在更广泛的范围内热忱欢迎国内外各界人士、各单位、海外侨胞、港澳台胞以及乐昌籍同乡，前来旅游、观光、考察、投资开发，合作经营，共同建设新乐昌，共同发财致富。

乐昌县县长



# 引进意大利高级保健饮料自动化生产线



即将投产的乐昌麻纺厂（正门）